

# 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幹部學習用

東北銀行總行

# 目次

## 第一講 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及政治制度……………一

### 第一節 緒論

第二節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中國經濟的變化

第三節 帝國主義怎樣統治中國經濟

第四節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民族工業

第五節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經濟

第六節 總論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與政治制度

第七節 中國各黨派的理論底批判

## 第二講 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及其特點……………六一

第一節 中國革命和它的任務

第二節 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

第三節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

第四節 論中國革命中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關係及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持久性以及武裝鬥爭形式爲中國革命主要形式問題



3 2169 8373 8

MG  
D683.08  
976  
2

### 第三講

## 中國革命的動力、領導、政權及其前途………一二六

第一節 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

第二節 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

第三節 中國革命的政權問題

第四節 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

# 第一講 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 及政治制度

## 第一節 緒論

馬列主義者認識中國社會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之一，是他不從中國民族精神民族特質上；不從中國社會環境地理條件上；不從中國民族其他的條件上作為出發點，來觀察探討研究中國的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並根據這些規律性來領導中國革命，改造中國社會。因為上述這些條件均不是也不能夠成爲中華民族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因此根據這些條件的研究探討，不能得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不能根據規律性去指導中國革命改造中國社會。

馬列主義者是歷史唯物論者，他是從社會的經濟基礎上面；從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形態的變化上面去觀察研究中國社會的發展的歷史，發現它的規律性，並根據這一規律性去領導中國革命。這種歷史唯物論的科學方法的正確性，早已被全世界發展的歷史，特別是最近兩百年來的歷史證實了的。現在不僅是馬列主義者自己確定的認爲歷史唯物論是唯一的歷史的科學的方法，而且許多的先進思想家

科學家歷史家也不能不承認這一真理。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理論（包括了歷史唯物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黨，它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以至於整個中國民族人民的利益的最徹底的代表者，體現者，它的政綱，（最低限度及最高限度的政綱）它的戰略策略它的全部政治上的活動，以及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不僅與中國國內外的環境，中國革命每一個歷史時機的特點條件相適應，而且是首先是對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中國社會經濟性質正確分析為根據的。因為只有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經濟基礎的全部有了正確的完滿的認識，然後才能清楚的判明中國社會的經濟機構，以及基於這一基礎上面的上層建築，首先是政治的建築；才能正確的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才能確切的把握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政權及其前途；才能適當的估計每個階段或具體的歷史時機的政治形式底特點；才能完滿的製定革命政黨的政綱以及實現這一政綱的鬥爭方法和形式——革命的戰略與策略。

例如中華民族中國社會近百年來的歷史，（從鴉片戰爭到現在）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表現在中國從封建主義的社會降到帝國主義統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又局部的淪亡為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殖民地，進入了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殖民地化的過程，同時中華民族近百年間經歷了無數的艱難苦鬥的過程，中國革命也繞過了許多發展的曲折的階段，例如近百年來中國革命歷史經過中英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暴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九二二年「二七」偉大工人鬥爭，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第一次中國大革命，八九年來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國內戰爭，三年來的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許多光輝的及艱苦卓絕的苦鬥，所有這些革命鬥爭，革命運動不是偶然的，它是根源於中國社會的

根本矛盾——中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並在這一矛盾基礎上展開了的民族的階級的矛盾，而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中國經濟結構及性質，却又是這些矛盾產生發展的基礎；是了解、認識、探討中國社會歷史，中國革命歷史的鑰鎖；是確定革命政黨的政綱及戰略與策略的根本出發點和根據。

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各黨各派在許多政治上的重要問題的分歧，其根源也就在於對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中國經濟結構及性質的不同的分析觀察上面，而這一分歧的根源當然也是由於他們不同的階級立場，不同的世界觀入生觀方法的緣故。

中國共產黨這一種科學歷史的方法，早已被中國過去現在的歷史發展事實所證實，無疑義的將來中國革命歷史將還要一天天的提供更多的例證。

## 第二節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中國經濟的變化

中國是在帝國主義統治宰割之下——這是中國近百年歷史最重要特點之一，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統治，使中國從封建社會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社會近百年來不論在那一方面都起了極重大的變化，因此每一個鄭重研究中國近代史及中國革命運動的人，尤其是想從上述的研究探討中得出中國社會發展規律，並根據這些規律性而指導中國革命，改造中國社會的人們都必須對於這一最重要特點給以足夠的估計和莊重的分析研究，因為不了解或不承認這一特點或事實和忽視它，也就無法了解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發展，也無法發現中國社會的規律，也無法認識今天中華民族對外的神聖的抗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中華民族近百

年歷史中一切無恥出賣民族叛賣祖國認賊作父爲虎作倀的漢奸蠱賊，從李鴻章曾國藩一直到今天的鄒孝胥汪精衛等，都在用盡一切卑鄙污穢的方法來否認或推翻這一特點和事實，（即帝國主義統治宰割中國的事實）並且公然發盡天良的鼓吹「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培植文明與幸福」「中華民族應該與帝國主義聯合才能得救」等漢奸理論。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及中華民族革命的先鋒隊，恰恰相反，它忠實的告訴中國人民以真理以事實，並從這裡製定出解放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澈底革命綱領。

所以正是因爲如此，我們研究中國的經濟結構與性質，必須首先從這一特點或事實開始，這就是說：我們要研究帝國主義如何統治中國的經濟，它如何摧殘中華民族的經濟力量，並在這種情形之下，引起了何種變化。

關於帝國主義怎樣統治中國經濟以及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經濟概況，我們將在下列各部分中說明，這裡我們只想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幾個時期及其侵略統治方式和它對中國的影響作一概括的敘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如果我們從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算起的話，已經有了將近百年，在這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統治，不管它有許多變化，然而基本上可以把它相對的劃分爲三個主要時期。帝國主義每一時期的侵略有它的特點，同時每一時期侵略結果，引起中國社會巨大的變化，給了中華民族極大的損害與破壞。現在我們把這幾個時期分別的來加以扼要的敘述。

一、第一一個時期  
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開始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  
這一期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的特點，是與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當時帝國主義是處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或在所謂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階段，還沒有發展到帝國主義。當時資本主義爲什麼要來侵略中國呢？這不是偶然的，當時資本主義國家迫切的需要殖民地的市場來推銷他們所謂「過剩的」商品，收買中國大批原料，來企圖解決當時已經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經濟底週期恐慌所造成的許多困難。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中葉便比前更積極的向地大物博的中國侵略，而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國便成爲侵略中國的急先鋒，這不是奇怪的。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究竟用什麼方法打開中國的門戶呢？當時是用武裝的力量和戰爭的手段來打開中國閉關自守「萬里長城」用武力來征服中國，逼迫當時封建君主政府向他投降，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用各種政治的手段，來束縛中國政府，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掠奪了許多政治上的特權及經濟上的財富。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國家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等武裝干涉，訂立了南京、天津、馬關諸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中國領事裁判權，經營商業自由權，海關協定，及五十一個通商口岸……這樣，就使資本主義國家大批的「價廉物美」的商品湧進中國來，而中國的許多原料却一批一批的被它收買出去，經過製造以後又重新運進中國來推銷……就這樣來進行它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資本主義國家這一時期對中國的侵略，給了我們中華民族以什麼影響呢？它的影響是很大的，它打破了中國的門戶；它獲得了許多政治上的特權，它掠奪了許多的財富，並通過所謂「自由貿易」搶去了我們大批的現金。它經過滿清政府賠款借款的形式，殘酷的榨取了中國的民衆，它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一方面打擊了並在某種程度上瓦解了中國過去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又一方面又



堅持着利用着這一封建勢力作爲它侵略奴役中國的工具，因此使中國社會逐漸地從封建主義的社會轉化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的經濟是封建主義的性質，它的特徵是地主階級壟斷了廣大的土地並經過這一土地私有制度來奴役剝削廣大的農民羣衆。當時農村經濟的性質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手工業雖然有了相當的發展，商業資本也有了悠久的歷史，但是一般的說是單純商品經濟的手工業生產佔優勢，同時商業資本與封建勢力密切的勾結，而帶着濃厚的封建勢力附屬物的性質，自從鴉片戰爭資本主義積極侵略以後，中國經濟政治起了巨大變化。這一變化，主要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在中國支配和統治勢力的加強，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逐漸結合，中國廣大農村經濟迅速沒落，手工業生產同時破產，廣大人民生活進一步的惡化，中國民族與社會危機日益顯明尖銳化，這一過程又名爲從封建主義的中國轉化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過程。

二、第二個時期：從一八九〇年以後開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從這一時期起，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混合，成了財政資本，資本輸出佔了比前特別重要的地位。因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便和以前工業資本主義時期不同了。從這一時期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主要的進一步的用軍事政治的力量繼續的征服中國。如經濟上大規模的投資到中國建築鐵路，操縱中國經濟命脈，支配中國的經濟生活與財政制度，把中國經濟變成爲財政資本的附屬。在政治上各個

帝國主義列強操縱支配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

從義和團事變以後，帝國主義經過辛丑條約，在政治上財政上已經完全統治中國。從這一時期起

，中國社會又起了比前更巨大的變化，中華民族比前受到了更多量的損失。可以說中國從這一時期起，已經基本上完全成爲了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了，中國雖然名義上表面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保守了一些獨立的權利。然而實際上還是在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的統治宰割之下，在各個勢力範圍中一切經濟政治上的支配權都操縱在帝國主義列強手中。

從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的過程是更加迅速更加成熟。中國民族及社會的危機（包括經濟危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更加嚴重的階段。

三、第三個時期：是從一九一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一直到現在還未停止。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資本主義總危機（這一總危機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便已經開始了）基礎上面新的危機（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尖銳了一切資本主義的一切內在矛盾，引起了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爲了緩和牠內部的危機，爲了鎮壓中國革命。爲了造成未來進攻蘇聯戰略的根據地，於是乎發動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武裝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四省，樹立了傀儡政權，企圖把中國變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面的殖民地，企圖完全滅亡

中國。一九三五年日寇更進一步向華北侵略，結果造成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後開始的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

這一時期基本的特點可以說是從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逐漸轉化爲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支配的殖民地。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到現在，是中華民族在日寇猛烈侵略之下從半殖民地地位淪爲殖民地化的過程。這八九年來中華民族的損失，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獨佔的政策此前更爲巨大，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進到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嚴重階段。中國民族

工業更加破壞與非民族化，中國農民經濟更加崩潰毀滅，中國的經濟生活遭受到極大的掠奪與摧殘。一直到現在這一過程還沒有停止，中華民族與日寇的鬥爭正到了極嚴重與尖銳的階段，中國能否停止這一殖民地的過程，是由國爭來決定，這一國爭的結果。或者是日寇被驅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實現；或者是中國淪亡爲日寇統治下全民的殖民地。

這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近百年來的幾個主要階段或時期——如果可以用這樣來劃分的話——。下面我們將更詳細一點來敘述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方法以及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經濟。我們所說明的，主要的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性質及其特點，至於「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寇獨佔政策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的變化，以及最近抗戰兩年以上中國經濟的情況，需要去單獨研究說明。

### 第三節 帝國主義怎樣統治中國經濟

一、要了解帝國主義怎樣統治中國的經濟，必須首先認識帝國主義的一般統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策的實質，關於這一問題一般的在共產國際六次大會上通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大綱」決議上面，已有了深刻與詳盡的分析，共產國際這一估計，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同樣是正確與恰切的，共產國際的估計主要的是下面的幾點。

「帝國主義竭力來維持並增加殖民地的依賴性，加深對殖民地的剝削，而且盡可能的阻滯殖民地的獨立的發展，這就決定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整個經濟政策」。

又說：「在帝國主義時期，財政資本奪取殖民地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獨佔作用特別重要，這特別的

由於資本輸出到殖民地所生的那些經濟上的結果，表現出來。輸出的資本主要的流入於商業界，做高利借貸的資本由國家借款等方法，盡力保持並加強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壓迫的工具，或者是要達到充分的支配殖民地國家中似乎是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握得完全的監督權。資本輸出到殖民地加速殖民地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雖然一部分為生產目的輸出到殖民地的資本也幫助加速工業的發展，但是無論如何不是向着殖民地獨立的方向，而是向着加強殖民地經濟附屬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資本的方向的」。

再次，「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的基礎，不僅在經濟上的壓迫，同時也在帝國主義國家在其附屬國家的非經濟的資產階級的強迫壟斷。這種壟斷有兩種基本作用：一方面是徵收各種形式的直接的間接的賦稅，銷售工業品，榨取廉價的原料品，供給本國的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而獲得額外利潤等，以達其對殖民地無情的剝削的目的，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壟斷，盡力奴化殖民地群眾的作用，以維持及發展其生存的條件」。

再其次又說：「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上的擁護，因此，首先和以前的社會構造的統治階層，地主、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結了聯盟，進攻大多數的民衆，帝國主義到處企圖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是在農村）用作反動聯盟的生存基礎，在這些國內的人民，被強迫的拿出大批款項來，供給統治殖民地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這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策，也就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經濟政治的主要方法。如果把這些意思概括起來說，便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國（其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變成它的財政資本的支配物。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把持中國經

濟命脈，把鐵路、海關、贛山、輪船……：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經過他在中國的銀行，來支配中國的財政借款，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吸收大批現金，使中國整個經濟適合於財政資本的需要，便利於大規模的經濟侵略。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在政治上與中國舊的封建勢力（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高利貸者）互相密切的結合，維持了資本主義以前的剝削形式（地租、高利貸苛捐雜捐等）這樣來把它的勢力深入到中國內部去，來維持和鞏固它在中國的統治，同時經過中國軍閥官僚用賠款、借款、高利貸、苛捐雜稅各種形式，非經濟的辦法，來獲得大批的利潤，榨取中國廣大人民的血汗。這就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經濟的主要方法，也就是它侵略中國整個政策的實質。

二、現在我們以事實來證實上述的論點的正確性。首先就說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問題。帝國主義投資到中國來，主要的目的，顯然的是為了控制中國的經濟的命脈，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同時經過各種政治經濟的借款，奪取中國許多特權，並監督中國的財政，關於這一點，只要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內容分析一下就可了然。為了避免引證大批的數目，我們只簡單引證雷麥氏所著的『外人在華的投資』一書的一些材料。雷麥氏在該書中把外人對華各種投資分為兩種，一種叫直接投資，即直接歸外人管理和經營的產業上的投資，一種叫間接投資或政治投資，這兩種投資的比較如下表（單位一百萬美金）：

年 度	直接商業投資	百分比	間接投資	百分比
一九〇二	五〇三、二	六三、九	二八四、七	三六、二
一九一四	一、〇八四、五	六七、三	五二五、八	三二、七
一九三一	二、五三一、九	七三、一	七二〇、六	二一、九

這裡所謂商業投資實際上不但關於商業的本身，而且包含了一部分經濟的實業投資在內。因此，如果把政治投資和那一部分經濟實業投資一起統計起來，就可以看到政治實業的借款在帝國主義在華的投資中佔了一大部分，這種借款的目的及作用，甚為明顯，它主要的爲了不僅把持中國經濟命脈，而且更要在取得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甚至控制該國的財政。帝國主義這一借款方式最標本的最有效的例證，便是辛亥革命以後，段祺瑞向日本所借的所謂「西原借款」（共四萬六千萬元，）日本帝國主義經過這一借款不僅獲得了超額的利息，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獲得了許多建築鐵路開闢礦山的權利。

帝國主義除了投資與借款以外，還有商業的一部分，但是主要的所謂商業的投資，也只偏於交通運輸工業及輕工業部門，如雷麥氏該書統計外國商業投資方面，運輸業佔百分之二二（運輸業在日本對華投資中則佔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製造業只佔百分之一一。帝國主義之所以大批的投資到中國來建築鐵路交通工業，是因爲鐵路及其它的交通的建設，一方面固然便利於他們商業上的活動，如出賣商品，收買原料，另一方面更便於他們鎮壓中國革命，在軍事上政治上統治中國。

當然，除了交通工業建設以外，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了一些工廠，開採了一些礦山，然而工廠的建設，也僅限於輕工業的部門（如紡織工業、烟草、化學工業等）礦山的開採也完全爲了供給本國在華的工廠需要，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開採的礦山，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出產都是運回日本國內用的。同時這些工業的投資，在帝國主義的整個投資中只佔比較微弱的地位，尤其是煤鐵礦開採方面，一般的外國資本家比較願意投資的地方，都是一些土地、旅館、房屋、信託、保險、遊戲場、橡皮等，如上海地產公司，英國便有十五家，法國有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資本已達一二〇、一三〇、二

八六元，這些企業都是爲了榨取更多的利潤，而對於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沒有什麼關係的，至若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真正有關的大機器製造工業，則簡直一個也找不到；並且帝國主義運輸到中國來的商品中，機器一項佔極小的數目字，這一點可以從每年商品進口統計材料中看出來。

所有這些完全證明了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決議上所作出下列一般估計完全正確。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生產的主要領域，僅只是那些適合極簡單的過程的製造（如紙烟工業，煉糖工業等），或者是在殖民地經過初期的製造，原料的運費可以減輕許多的，這類的生產才能在殖民地有些發展。無論如何，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設立的資本主義式的企業（除了爲軍事的需要而設立的少數的企業以外）差不多或完全是農業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且極其顯明的，是資本之低級的有機構成。真正的工業化，能使殖民地國家生產的發展有獨立的可能的，特別是興盛的機器工業的建立，宗主國沒有促其發展，相反的是阻滯其發展的，強迫着殖民地犧牲他的獨立發展的利益，還要付給外國資本主義一部分經濟的（農產原料的）副產物，這樣，外國的資本主義就利用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加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力量，維持其在殖民地的壟斷，擴張其勢力範圍，這是殖民地奴隸化作用的主要點。

三、關於帝國主義怎樣掠奪中國，剝削中國民衆血汗，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最好例子，便是帝國主義在華開辦的銀行事業，外國銀行是有其雄厚的資本勢力，外國資本家經過它支配中國工商業，操縱中國金融界，壟斷對外貿易，使中國經濟完全屈服於他的巨掌下面。

關於外國銀行在華的勢力，可以從下列簡單的事實，可以了解一般的輪廓。例如英國在華的一個滙豐銀行便有一千萬美元金的資本，此外還有麥加利銀行，有利銀行，大英銀行，資本合計也在一千

萬英鎊以上。日本在華的銀行，最大的爲橫濱正金銀行，僅這一銀行的資本額也在一千萬以上，美國在華銀行勢力也不小，僅僅花旗銀行的實收資本便有一億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之多。此外還有法、意、德、比各國在華的銀行勢力合起來也不小。

(1) 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因享有治外法權，可不受我國政府與法制的約束，而能任意的發法紙幣，一方面吸收我國現金，另一方面可以掌握中國金融經濟的全權。例如英國在華的一個滙豐銀行，到一九三二年十月止，便發行了將近四萬萬元以上的紙幣，日本台灣銀行有五千萬（日元）以上，美國的花旗銀行在兩萬萬美元以上。

(2) 外國銀行因爲有治外法權與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可以隨意操縱我國的金融財政。例如一九三五年外商銀行，大批運銀出口。終於造成了中國金融界深刻的金融恐慌。

(3) 外國銀行，由於它資本的雄厚及活動範圍的廣泛，使它在中國金融行政上佔着支配地位。如關於金融方面的改革刷新事業方面的重要問題，中國金融界與南京政府過去大多數都是事先徵求外國銀行的同意或與之共同協作。這對於中國是大的損失。

(4) 壟斷國際的滙兌外國銀行不懂爲他本國在華的僑商滙兌。而且主要任務是在經營中國國內之滙兌，及中國在外國的國際滙兌，甚至中國政府對外國的賠款，都因爲沒有自己國際滙兌的機關，所以一切賠款都經過外國銀行之手，它可以從中獲得大批的利潤。

(5) 壟斷中國對外貿易。中國貿易差不多完全操在外商之手，在華外商銀行又對進國商人作有力的操縱。因爲外國銀行壟斷了國際的滙兌，它有巨額的資本，有完滿的運輸組織，因此中國購貨或出售土貨，也妥經過外國銀行與洋行發生密切的關係。



(6) 操縱中國證券交易所的實權。經過這交易所的操縱來控制中國產業界及金融市場。

此外，外國銀行還統治中國銀行和舊式錢莊，經過它們來吸收中國民衆的血汗等，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關於外國銀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決議上正確的指出：

「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另一種基本形式，是財政資本的各種獨佔的組織，努力來壟斷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整個對外貿易，由此來支配調節殖民地經濟與世界市場之間的關係。在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少數的獨佔之貿易公司壟斷了殖民地的對外貿易，所發生的直接影響，就是殖民地內散漫無組織的商業，祇適合於輸出的需要，並且殖民地國內天然財富都被帝國主義寄生蟲吸收而去，所以殖民地的國內市場不能十分發達起來。這種殖民地商業畸形的發展其特殊的表現，又在殖民地內的帝國主義銀行的形式與性質。這種銀行把民族資產階級的儲蓄金用來支配殖民地的對外貿易等等。」

四、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統治勢力和他對中國民衆的榨取，在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年來的巨量的入超上也可以看出。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大規模的侵略，再加上它在中國所取得的許多特權，不平等條約，使它的商品像如潮水一般湧進中國來，用所謂不等價的交換來吸收中國的現金，剝削中國的民衆，假使我們把過去中國對外貿易交冊材料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國從一八七一年以後，便在對外貿易上永遠處在入超的地位，每年入超的數目已在一百萬萬元以上，並且入超數目字一年一年的增加，特別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帝國主義者企圖把恐慌的負擔轉嫁到中國民衆身上，採取通貨膨脹大規模傾銷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更加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與

整個國民經濟的加速崩潰。

這就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經濟的方法及其實質。無疑的帝國主義這種財政資本掠奪政策之下，中國民族工業也無法獨立發展，中國農村經濟也日益破產崩潰，整個國民經濟都走向總崩潰的道路。關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的中國民族工業和農村經濟的特點及狀況，我們現在在下列各部分分別加以說明。因為只有具體的分別研究中國民族工業及中國農村經濟，才能更深刻的更有根據的了解帝國主義怎樣統治，怎樣破壞中國經濟，怎樣阻滯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 第四節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民族工業

一、中國民族工業的初步的萌芽，遠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即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當時，部分的清政府的官僚爲了維持日趨崩潰的清政府的統治，爲了鎮壓當時日益發展的反對民族的壓迫及反滿的革命運動，感覺有發展軍事工業的必要，因此，在各地出現官辦的兵工廠、製造局，製造各種新式武器。如江南製船塢，天津、南京、福建的機器局，安慶的機械所等，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萌芽的時期。但這些軍事工業成績很壞，因爲管理和佔有這些軍事工業的都是那些腐敗的封建官僚，他們只是利用這些工業來貪污搜括從中取利。

到了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失敗以後，開始了一些「新興」的工業，主要的還是官辦的，或是官商合辦的，例如上海機器織布局、蘭州的織呢緞局、上海的原昌五金機器廠、廣州的縲絲局、漢陽的鐵政局、槍炮局、上海湖北紡紗局、湖北火柴公司等，主持者多是滿清的官僚紳士，如李鴻章、左宗

業、張之洞等，這些新興工業也與軍事工業一樣，沒有得到多大的成績。中日戰爭的慘敗，宣告這些官僚商辦工業及當時所謂洋務運動的破產。

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加緊的侵略，他們不僅在中國推銷商品，收買原料，而且因爲不平等條約的保障，可以在中國內地開設工廠、建築鐵路等。此時帝國主義在華開辦的，主要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漢口的紡織工廠、製粉工廠，英法帝國主義在上海哈爾濱的紡紗、紙烟、麵粉工廠等。義和團暴動以後，帝國主義投資到中國來建築鐵路，發展交通運輸工業，這樣使中國經濟命脈逐漸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使中國新興工業的萌芽，一開始就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嚴重壓迫。但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交通工業建設的發展，商品經濟的擴大，客觀上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生長。因此在義和團暴動以後，特別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中國的真正的民族工業開始發展，這時從事民族工業的不僅有部分的官僚、地主、商人，而且還有積累貨幣的買辦及旅居海外的華僑實業家。他們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也感到了有提倡實業的必要；就是滿清政府此時也不能不進行某些改革。（如設立商埠，定立商律，發獎金給商勳章程，新機器製造獎金章程，在各地成立陳列所，以鼓勵工商業的發展等。）以便利於民族工業的發展。此時產生的新興的民族工業，有煤礦公司三個（山東中興、英台峯、兗變）發器公司一個，紡織公司九個，麵粉公司三個，絲廠八個，烟草公司兩個等。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了。此時帝國主義正忙於應付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日本除外）因此，中國民族工業就趁着這一千載一時的良機，偷空的得到了部分的發展，這是歷史上所謂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到了帝國主義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民族工業還是繼

續向前發展（即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二年）因帝國主義此時精疲力倦，無暇兼顧中國，總計此時，中國所設立的紗廠有四十六家，平均資本每廠約八十萬元左右，麵粉工廠有五十三家。資本平均每家四十萬元，大部分新興工廠設立在上海、天津、武漢。此外絲廠也稍有發展。但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也利用列強忙於戰爭的時機，盡力發展它在華的工商業，單只紡織工廠除原有的不算，新設立在上海有紗廠二十個，青島十個，錠子都在三四萬以上。因此，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民族工業部分的發展，也受到了帝國主義企業的壓迫，國內市場受帝國主義操縱，使它的發展大大受到限制。

帝國主義大戰結束以後，帝國主義經過了幾年，把國內革命運動鎮壓下去，把原有的經濟組織整理恢復以後，又重新向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這樣使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又受到嚴重的限制與打擊，並且經過了一個時期中國民族工業又走上破產崩潰的道路，特別是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

二、綜合上面分析，我們對於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及其特點，可以得到下列幾點認識。

(1) 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是部分的片面的，它沒有重工業基礎，重工業都操縱在帝國主義的手中，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只限於輕工業的部門，主要的是紡織工業、麵粉工業，這一點決定了它的力量的輕弱與貧血性質。

(2) 中國民族工業從它產生到以後，一貫的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及阻礙之下。這一點，使它的發展帶着寒熱症式畸形的性質，它只能在帝國主義侵略比較放鬆的時機（如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及帝國主義經濟比較薄弱的部門（如輕工業方面某些企業為帝國主義所少注意的，或因某種原因少發展的）中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民族工業部分的發展與中國農村經濟整個的日趨崩潰是同

時並進的，並以它爲自己基礎的。這是因爲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統治之下，中國農村經濟生產力無法提高，反而日益趨於崩潰，這一點大大阻礙了民族工業順利的發展。所以這些說明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非獨立性不健全性及依賴性質。

(3) 中國民族工業在它的生長發展中，由於上述的特點，使它沒有國內市場作爲推銷商品的場所。因國內市場都早被帝國主義所獨佔，帝國主義經過海關的操縱及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權利，每年都以大規模的輸入商品或在中國內地各大城市製造商品出賣，造成每年對外貿易的龐大的入超及市場上充滿外國商品的現象，這一點是民族工業發展的致命打擊。因此缺乏國內市場，這是民族工業生長和發展極嚴重的困難及主要原因之一。

(4) 最後，中國民族工業從它生長和發展的歷史上看來，它很明顯的帶著濃厚的買辦性及半封建的性質。許多資本家是從帝國主義的買辦轉化過來的，他們給外國資本家當了一個時期的買辦，積累了一些資本，然後投資到工業中去，自己成爲企業家工廠主。同時許多資本家在農村中同樣進行着封建的剝削。(土地出租，高利貸等)此外，由於中國民族工業的貧血性軟弱性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使他在資本、技術上、原料動力的供給上，都不能不與帝國主義特別是它的銀行有密切的聯系，反對它的依賴性附屬性。記得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帝國主義爲威脅收買民族資產階級，曾停止對上海各中國工廠商店的電力與自來水的供給，同時通令各國銀行對中國企業停止一切金融上的資助，結果給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嚴重的打擊，使它不能不退出聯合戰線，向帝國主義者屈膝讓步，這是對中國民族工業這一弱點最好的寫照。

中國民族工業之所以不能繁榮發展，而且只有羸弱貧血並且日趨於崩潰破產的基本原因，不是由

於民族資本家的技術落後，管理方法及經驗不夠，（當然這也是原因之一）也不是因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原料缺乏（相反的中國的原料是很豐富的）而主要的是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和統治及它與封建勢力的結合，因為帝國主義一方面控制了中國經濟命脈，支配了中國的金融財政，壟斷了中國對外貿易，這樣來大規模造成對中國經濟侵略的基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為鞏固它在中國的統治，深入它的勢力到中國內部去，不得不盡力的利用及維持封建勢力和它的剝削形式，並經過它來更殘酷的剝削榨取中國民衆的血汗。因此，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僅由於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侵略與統治而受到極大的限制與嚴重的打擊；而且同時也還由於封建勢力的阻礙和破壞，例如軍閥割據與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及釐金制度的剝削，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農民殘酷的榨取造成農村經濟大破產——因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變重壓迫，就決定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運。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曾經在客觀上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帝國主義爲了在經濟上操縱中國的市場，爲了殘酷的榨取中國民衆的血汗，不能不造成相當的資本主義關係，例如沒有輪船、鐵路，它將不能順利的完成商品原料的運輸和其他的目的，而這些交通工業的建設，客觀上又不能不形成相當的資本主義的關係，擴大商品流通。然而帝國主義所以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幫助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相反的，正是爲了更順利的更容易的控制中國經濟，把它變爲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附屬。因爲問題很明顯的，假如中國民族工業飛躍發展，那就是中國工業化，就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經濟嚴重的失敗。因此帝國主義不僅不會幫助而且處處阻礙破壞削弱中國民族工業。這是三十年來中國歷史鐵一般證明了的。

關於這一點正如上述的共產國際決議上面所說的：

「資本輸出到殖民地，加速殖民地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雖然一部分爲生產目的而輸出到殖民地的資本也幫助加速工業的發展，但是無論如何不是向着殖民地獨立的方向的，都是向着加強殖民地經濟附屬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資本的方向的，一般說輸入殖民地的資本，差不多完全是爲擷取原料品，取得原料的供給，原料的初步的利用，輸出的資本也用在擴充交通上（鐵路輪船海港工程等）藉此以便利用原料的運輸，加緊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束縛，農業上投資的形式，是大規模的種植，其目的是在於糧食的廉價的生產和原料的主要來源的壟斷，從殖民地奴隸們的低廉的勞動力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大部分轉運到宗主國去，因此就非常可驚的阻滯了殖民地經濟的向上生長與生產力的向上發展，而形成爲殖民地經濟的政治的解放的一種障礙」，（請參照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大綱）

三、關於中國民族工業的薄弱貧血及其崩潰破產，可以拿許多確切的事實來加以證明和說明。

首先說到中國經濟幾個重要命脈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力量薄弱的情形。例如銀行方面，「九一八」事變以前，中國的銀行在數量上雖也有一百七十多家，然而實收資本不過二億六千六百萬。較之美國花旗銀行一家的實收資本一億二千七百五十五元美金，固然望塵莫及，就比日本的正金、三井、三菱和住友四家銀行的實收資本的二億九千五百元之鉅，也相形見拙，實際上中國銀行只能成爲外國銀行的附屬和錢莊的機關，完全受它的支配，沒有多大的獨立作用。鐵路輪船方面，也大部分屬於帝國主義的，中國鐵路分爲兩種：一種是帝國主義直接投資，如廣九漢越等；另外一種，名義上是中國向外國借款，由中國自己管理，但實際因借款及其他的關係，還是由帝國主義者操縱（如平漢路、滬甯路、浙滬路等）。因此，鐵路大權大部分實際上是由帝國主義管理，輪船方面極大部分也是帝國主義的（如英國的太古怡和以及美國日本的佔多數）。中國輪船公司如招商局早已破產，大革命失敗以

後曾歸爲官辦，但勢力很小。過去，不僅沿海一帶航業由帝國主義壟斷，就是中國內河如長江一帶也是帝國主義佔絕對優勢，至若航空、電報、電話、更不必說了。

在工業方面，我們上面已經指出：中國民族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例如煤鐵礦，因爲不平等條約的關係，大部分也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差不多壟斷了中國的東北及華北各省的煤鐵礦。許多中外合辦的煤鐵礦，也因借款的關係，大權還是屬於帝國主義者手中。中國人自己開辦的煤鐵礦，或者因爲軍閥的摧殘中途停業或生意不好；或者因借款關係，受帝國主義的操縱。例如中國最大的漢冶萍公司，因借款關係早已被日本操縱，山東的中興公司，在一九二九年據說因軍閥混戰，已差不多停止工作。

現在來看中國民族工業的輕工業方面的情形，這裡主要是指紡織工業——民族工業的「生命線」。我們不能否認紡織工業是中國民族工業比較發達的部門。有比較健全的組織。但是，也是因爲帝國主義在中國操縱了海關，壟斷了經濟命脈，同時帝國主義在中國各大城市開設大批紡織工廠（特別是日本，其次是英國）使中國民族紡織工業也受了嚴重的打擊。例如根據一九二七年華商紗廠聯合會的調查，中國境內中外紗廠勢力比較如下：

國別	紗廠數	錠子數	資本數（單位兩）
中國	六九	一、九四八、五七六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	四	二〇五、三二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四五	一、三八〇、〇二二	一〇、四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一一八	三、五三三、九一八	五八、四〇〇、〇〇〇

從上表已可以看出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紡織勢力已經不小。此外應該說明中國紡織工廠。還往往因為資本集中，經營不得法，常常受無故的損失。再其次，它的原料也為內地軍閥厘金的剝削不能得到本國廉價的原料的供給，而反要向外國商人購買，這更加使中國紡織工業不能與帝國主義作有力的競爭，中國民族紡織工業衰落，情形可以從棉紗輸入的日益增加，及許多天津上海的工廠被日本收買的事實上，得到無庸爭辯的證明。

民族工業除了紡織工業以外，要算是麵粉工業了。中國的麵粉工業，除在大戰期間有了相當的發展以外，後來只有一天比一天差，特別在一九三二年以後。這一點可以從麵粉輸出的減少；麵粉輸入大批的增加的事實中得到證明。例如一九二二年麵粉輸出只有五十九萬擔以上，而輸入則在四百萬擔以上；一九二四年麵粉輸出有十五萬擔以上，而輸入則有六百七十萬擔左右。

此外絲織業方面，因為日本及印度絲織業的競爭，也是每況愈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上海的絲織工廠，大部分不是關門就是減工。烟草工業方面，中國資本比較薄弱，僅僅與英國資本比較成二〇與一之比，中國紙烟工業的巨頭南洋烟草公司，有一個時期中也停頓了工作，其他可見一斑。在火柴業水泥工業方面，日本英國的資本也有很大的勢力。

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們不能例舉很多的統計數字來證明我們的論斷。然而上述的材料也就可以顯

示出中國民族工業薄弱及衰落的一般輪廓。至若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侵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大規模進行它的獨佔的政策。中國民族工業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走上總崩潰及非民族化的道路。

自然，民族工業整個薄弱與非獨立發展的性質，決不是否認任何民族工業部門都不能在某種程度上及某一個時期內有部分的畸形的發展。例如絲織業，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活躍（特別在大革命時期）在一九三〇年內樹膠業、化裝業、調味業、製帽業等，都有相當的發展。同時，應該着重的指出，一般的在大革命時代，當時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日益崩潰破產，革命力量日益增強的條件下，民族工業曾經有向上發展的趨勢，至少是在部分的地區是如此。（例如大革命時代長江以南的地區）這是合乎規律的現象。但是在反動統治時期，某些工業的活躍情形，決不能作為工業一般興旺的標幟。因為這些工業的發展，是有它的特別的原因。如製帽業所以能夠有相當的發展，只是因為這裡的一些利潤沒有引起帝國主義的注意；或者因為特別的原因，帝國主義所製造的，一時不合於中國人的口味。但是就是這些部門工業的發展，也只是短期性的、畸形的，它在它的發展中也將碰到其他工業部門所碰到的同樣的障礙。到了後來，這些工業部門的衰落也就證明這一真理。

## 第五節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經濟

一、關於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及殖民地農村經濟的特點，上述的共產國際六次世界大會的決議案上有說：

「因爲殖民地大多數人民是與土地和鄉村生活聯系着，所以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地主階級商業高利貸資本家）所採取的剝削農民的搶劫形式，就帶有特別的重大的意義。由於帝國主義干與的緣故（徵收賦稅、檢進宗主國工業等等）所以在農村被捲入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漩渦的時候，就發生農民經濟貧窮化的過程和農村手工業趨於消滅的過程等等，而且殖民地農村之捲入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漩渦，其進行的速度，要比舊時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猛烈得多，反之，工業發展的遲緩又非常限制着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範圍。」

又說：「殖民地農業極堪注意的部分，是爲輸出而工作。但是農民經濟却並不因此從資本主義前期形式的壓迫下面解放出來，一般的是農民經濟受迅速發展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壓迫，以及捐稅的增加等等，而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法，反因之加強。因爲財政資本的重要，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法成爲隸屬，因之農民經濟轉變爲「自由」的商品經濟，農民剝削增加了，而農民的生產方法却沒有進步。」

「爲擴大帝國主義的原料的根基起見，就在許多農作物被殖民地政策毀滅的地方產生一些新的農作物，同樣的在那些舊的灌溉設置已被破壞的地方建設起新的灌溉設置，成爲帝國主義增加農民剝削的工具。爲擴大國內市場，把一部分的殖民地政策產生的土地關係來適合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各種的種植業是供給宗主國財政資本的利益的。殖民地礦產的剝削，是適合宗主國工業的需要的，尤其是藉此停止依賴他國的原料來源。」

另外一個地方又說：

「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上的擁護，因此首先和以前的社會構造的統治階層，

地主、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結了聯盟，進攻佔大多數的民衆。帝國主義企圖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是在農村），用作反動聯盟的生存基礎。在這些國內的人民，被強迫着拿出大筆款項來，供給統治殖民地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見前頁）

這就是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半殖民地農村經濟的方法，也就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農村經濟的方法。這一方法歸納起來，就是帝國主義一方面侵略中國農村經濟，使它商品化，來推銷帝國主義的商品。同時，供給帝國主義大批的原料，爲帝國主義輸出而工作，使它受世界市場的監督；另一方面又不提高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改良農村生產的方法，而是相反的，維持和加強農村中封建的剝削，並經過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更殘酷的榨取中國民衆的血汗，使中國農村經濟走上總崩潰的道路；使廣大農民貧困化，這就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農村經濟的特點。

二、爲了證明上述的真理，我們可以拿許多的事實來證明。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初的開始，是商品的輸入成不等價交換的形式，使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吸收中國的大批現金。這可以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每年入超可以看出。這一點，上面當着我們論及帝國主義如何統治中國經濟的方法時已經指出了，並且引證數目字說明了的。帝國主義這種大批商品輸入的結果，使農村手工業完全破產消滅；另一方面使農民更加依靠市場，而且使農民逐漸放棄糧食的生產，而從事工業原料的生產（特別是茶絲棉等），但這種工業原料的生產，大部分是爲了輸出的需要，即爲了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需要。然而由於帝國主義經濟恐慌各種生產的過剩，帝國主義停止購買原料。結果使中國許多主要農業生產衰落停滯，更加促進了入超與農村經濟的崩潰。（當然生產品的減少衰落，還有其它的原因）

中國農村經濟幾種生產產品的衰落，可以從下面的材料看出，例如茶絲，原是中國農產品輸出的大宗，然而茶絲的輸出，早已表現日益衰落的趨勢，特別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以後。例如一九二八年有一萬八千萬兩以上的絲貨，一九二九年則只有三十一萬兩左右，比前真是一落千丈。植物油是中國出口重要的一種農產品，尤其是桐油，桐油輸出數量也是日益減少的。例如一九三〇年為七千萬兩，一九三二年則為一千五百萬兩。中國棉花也是主要農產品之一，但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掠奪及封建勢力的摧殘，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華北的棉花，及大批棉織品的輸進，因此棉花生產產品也衰落了。這可以從歷年棉花大量的進口中可以看出，例如一九二六年有二百七十萬擔，到了一九三一年，則有四百五十萬擔以上。

中國農村經濟衰落崩潰最明顯的標幟，便是大批的糧食進口。因為中國是個農業佔主要地位的國家，糧食生產應該是很充足，不僅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大量的輸出，可是由于帝國主義統治和封建勢力的破壞，糧食產量大大的減少，以致造成大批糧食入口的怪現象。例如一九二一年米的進口有六百四十萬擔以上，小麥在五十萬擔左右，麵粉在四十五萬擔以上，到一九二六年米的數量便有一千一百三十萬擔以上，小麥有五十萬擔以上，麵粉有二百八十九萬擔以上。一九三三年，米有一千三百萬擔左右，小麥有一千萬擔以上，麵粉有二百萬擔左右。可見每年輸入的糧食都一年比一年的激增。

帝國主義不僅從推銷大批商品，收買中國的原料，壟斷中國對外貿易，來剝削中國農民的血汗，破壞中國農村經濟，消滅手工業的生產；而且還利用它的非經濟的剝削方法，如借款賠款來掠奪中國的農民。關於賠款的數目是非常巨大的，一直到現在國民黨南京政府還在維持賠償，這一批款項是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之役為止，就有下列的幾種：

鴉片戰爭之役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英法聯軍之役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中俄伊犁之役	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甲午中日之役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庚子八國聯軍之役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這一大賠款數目，毫無疑義的更加强中國封建勢力對農民的剝削；更加促進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至若關於外債的數目，向來沒有精確的統計，過去滿清政府及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政府不必說，就是自從國民黨政府統治以來，外債的數目簡直不可勝數，國民黨南京政府爲了支付外債，不得不把海關交給帝國主義管理監督，把海關收入作爲外債的擔保。除此以外，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工廠、商業銀行，及其他投資的利潤都是從廣大農民手工業者身上剝削來的，這些利潤數目字非常浩大，簡直無法統計。

這就是帝國主義直接侵略中國農村經濟，掠奪中國農民血汗的具體事實，也就是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

三、但是上面所說的僅僅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經濟的一方面，僅僅是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一方面原因，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農村經濟不僅是依靠這方法，直接掠奪中國農民的血汗，而且還維持和加強封建勢力在農村中的剝削和統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和鞏固他們在中國經濟上政治上的統治，把它的勢力深入到中國農村中去。

關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經濟中，封建剝削的加強與農村經濟的剝削情形，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主要的方面表現出來：（1）土地集中地主高利貸商人殘酷的剝削。（2）軍閥苛捐雜稅的加重及軍閥混戰的破壞。（3）荒地的增加。（4）一大部分農民離開土地。（5）普遍的災荒。（6）現金的大批流出，現在分別的引證材料來說明這些問題。

關於土地集中的問題，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前，絕對大部分的土地壟斷在地主階級手中。封建地主經過土地和私有的制度，來束縛奴役廣大的農民，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這句話反映了過去地方剝削農民殘酷的事實。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除了帝國主義掠奪侵佔及漢奸政府出賣的以外，絕對大部分仍然操在中國大地主階級手中，不僅如此，由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封建剝削的加強，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數的地主官僚軍閥手中，這種土地集中的過程，可以從下列的材料看出來，一九二七年武漢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的調查，農民的分類及數量有如下表：

有地的農民（自一畝起以至大地主）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無地的僱農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遊民兵匪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佃	農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總	計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這一材料不很可靠，然而已經可以看出一個大概輪廓，即有地的農民佔農民百分之四十五，無地的僱農佃農游民兵匪等約佔百分之五十五。這裡所謂有土地的農民，是包含着地主、富農、貧農，而且是貧農佔多數。具體的數目字各種階層分配於下：

類	別	在全體農民中的百分比	佔有地的百分比
貧	農（一畝至十畝）	四	八
中	農（十畝至卅畝）	二	四
富	農（卅畝至五十畝）	一	四
小中地主	（五十畝至百畝）	九	一
大地主	（百畝以上）	五	四

這個統計很清楚的說明了土地集中的趨勢，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民是包含沒有土地或者極少的土地，而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四以下的少數大地主中小地主，却佔有了土地總數的幾乎三分之二。由於中國各地經濟發展及過程不同，因此土地集中的程度也不一致。然而基本上各個地區



是一樣的。即地主階級壟斷了大部分的土地集中的現象，是中國農民生活惡化的基本原因。

其次說到中國農村經濟中的剝削形式問題，中國農村經濟中主要的剝削方式，仍然是地主壟斷土地，經過這一土地出租給農民的方式，而掠奪全部農民的剩餘生產品，甚至必須的生產品的一部分。雖然這些剝削有的已經現代化了，然而剝削仍然沒有減輕，而且許多地方還更加加重了。至若地租的剝削，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的地方還是勞役地租的殘餘（經濟發展更加落後的一些區域，還存在着這形式）有的地方是物產地租；有的地方是貨幣地租，而且物產地租在全國比重上是佔主要的地位，貨幣地租只是一些沿海各省的部分地區存在着，（如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省）不是普遍的現象。至若地租的額數，一般的至少在百分之五〇以上，有的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據南京政府立法院在一九三〇年的統計，安徽省不論那一種用的質量，地租的額數都在產量百分之七〇以上，四川和福建都在百分之六〇以上，陝西也在百分之五五以上。貨幣地租最高的陝西、四川、雲南、福建、吉林等省，竟有超過地價百分之二〇以上的，有的地方地主與農民的契約中，還寫明了不論年成好壞，必須繳納規定的租額，這是更殘酷的剝削形式。此外，一般的因為農民失却土地破產貧困化，因此地租在許多地方竟是逐年增加的。

現在來說一說中國農村中高利貸的剝削。高利貸的剝削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下的中國農村中是特別殘酷的。因此，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剝削的加緊，廣大農民的貧困化，手工業者破產，使他們爲了維持生活及再生產，不得不向地主商人富農借錢。因此，高利貸得到顯著的發展。

中央農業實驗所，關於中國農民負債的材料，曾經有了一個調查表如下：

區域	所包括的省份	有報告的縣數	負債農民佔農戶百分比
西北區	察綏寧甘陝五省	三四	百分之六八

這一材料指出中國農村經濟有百分之六〇的農民，因生活困難而負債，並且負債農民中大多數是貧農、中農，至若富農也有一部分，這說明農民生活貧困化的一般情形，並且說明經濟恐慌，不僅打擊了農民基本群眾，而且也打擊了富農。

中國農村高利貸的本質上，完全是半封建的。他的目的不是爲了取得平均利潤，而是一種超經濟的剝削，這種借貸的利息是驚人的。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發表，全國二十二省五七一縣的借貸本利報告調查，年利二分到三分的佔百分之三〇，三分到四分佔百分之三〇・三，四分到五分佔百分之三一，二・五分以上的佔百分之二・九，二分以下佔百分之一四；全國總平均年利爲三分四厘；即年利百分之三四，借債的利息不僅是高，而且時間非常之短，因爲期限愈短，則農民愈無法償還。許多地方借貸還要抵押，（以一定的動產或不動產，）如沒有能力償還則沒收抵押品。農民因爲許多沒有能力償還，結果農民爲債主作苦工，如果永遠無法償還，則子孫永遠要作債主的奴隸。

北方區	晉 冀 豫 魯 四省	三〇五	百分之五七
中部區	鄂 豫 贛 三省	八〇	百分之六二
東部區	蘇 浙 皖 三省	一〇七	百分之六六
西南區	雲 貴 川 三省	九〇	百分之五九
東南區	閩 粵 二省	七一	百分之六〇
平均		七三一	百分之六二

農村中封建剝削的形式，除了上述的地租高利貸以外，商業資本家也有它的特殊的作用。在中國農村，商業資本的剝削，與地租高利貸的剝削是密切聯系着的，常常是三位一體的。中國地主一方面出租土地給農民，同時自己又開當舖或借債給農民，進行高利貸的剝削。此外，又利用農民困難的時候（大多數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以廉價預定農民的農產品或原料，進行商業投機的剝削。關於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的三位一體的情形，可以從下列江蘇省三百七十四個地主主要職業的調查材料中得到證實，一九三〇年江蘇民政廳調查，江蘇省三百七十四個地主中，兼高利貸者商人者，在北部佔百分之九一，南部佔百分之六五。

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結合，一方面說明了農村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的殘酷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中國農村經濟中，商業高利貸事業的半封建性質。關於這一問題，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大會的土地問題的決議上，曾有下列一段精彩的說明：

「中國農村經濟關係上的特點，尤其是地主階級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個人要做地主和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資本家。一個地主他一方面壓榨佃農的地租，另一方面便是債主，拚命的用高利貸盤剝農民。結果，地主簡直將自己的佃戶債戶，變成了債務上的奴隸，和牛馬似的對待他們。因此，豪紳可以用這種手段去奪取農民的土地。自耕農往往因為欠債，而將自己土地抵押典當，結果，變成佃農。喪失了自己的土地的農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土地，這種田地往往是自耕農民自己原有的土地。收租的辦法大半還是以農產品交租，借錢借米而不能還清的農民，亦往往出賣土地，而然後替債主（高利貸商人官僚污吏）耕種自己的土地。新的土地當然仍用放債的手段，繼續剝削農民。總之，有錢的（高利貸者）有地的（地主）有貨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們用三種方

法，同時並進地剝削農民。有錢的變成有地的，有地的變成有貨的，收取農民勞動的生產品的，甚至變成「佔有農民的暗中的奴隸制度。例如賣男賣女，出賣妻子，替地主作苦工當還債」。

現在來說軍閥的苛捐雜稅的加重及軍閥混戰的破壞對中國農村經濟的影響。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與封建勢力的結合，在政治上形成中國軍閥制度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大大的破壞中國民族工業與農村經濟。軍閥制度對中國農村經濟的破壞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首先表現在農業捐稅的剝削。所謂農業捐稅，主要的是指田賦。田賦在中國是逐年增加的，自民國六年到民國十七年田賦正稅的增加，到一·三九三倍，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增加也很快。單只所謂模範的無錫縣來說，在十六年正稅每兩還是〇·九三九元，到了二十二年變增加爲一·一八二元，七年內增加爲一·二六倍之多。

田賦除正稅以外還有附加稅；它們數目字也是驚人的。四川省許多地方的附加稅超過正稅六七倍之多。此外還有預徵稅，預徵的省份在四川、山東、陝西、廣東、河北、福建、湖南比較嚴重，特別是四川。例如四川的德陽縣一九三五年就預徵了民國五十四年的糧稅。有的地方還預徵到民國七十八年的糧稅，名義上是預徵，實際上是掠奪搶劫。

除了田賦以外，就是苛捐雜稅，中國苛捐雜稅非常繁重與複雜，到現在還沒有完整的統計，甚至過去的南京政府也無法統計，但全國約略統計起來有一千七百多種，每省有幾百種或八九十種以上，尤以四川貴州爲多。最基本的是人頭稅、門牌捐、灶頭捐、牲畜捐、婚姻捐等，此外各省有各省的花樣，如廣州、四川有「懶捐」（不種烟的）及鴉片捐十多種，山西有寡婦再嫁捐，廣東有馬桶捐，甚至還有所謂公豬與母猪的交媾捐，出糶捐，與進糶捐等五花八門，無所不有。這種苛捐雜稅不能使中國農業有任何的原始積蓄，不但不能擴大再生產，而且簡單再生產也難於繼續，甚至日趨崩潰。

其次，關於軍閥的混戰的破壞更是驚人。是辛亥革命以後到九一八事變前後，沒有一年沒有軍閥混戰的，而且一年殆似一年，戰區一次大似一次。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六年中間，軍閥混戰的戰區每年平均在十四個省份左右。軍閥混戰一方面大大的加重民衆的負擔（因爲每次戰爭一開始，軍閥都要加租加稅封牛封馬，拉夫抽丁，所謂特殊的兵役或兵差的剝削）；另一方面戰爭砲火，大大破壞了農村經濟（如砲火摧毀房屋耕地及有生力量等）。

再其次，我們來說到荒地大批的增加，在這種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豪紳高利貸者層層的壓迫剝削下面，大大的摧毀了中國農業的生產力，使中國農民簡單再生產的能力也很少。同時，必致使中國農村農民失却土地，或被迫離開土地增加了荒地的面積，關於荒地的增加是逐年增大的。中國農村荒地的增加，到現在缺乏完整的統計，下面是一個比較陳舊的統計，也可以看出荒地增加的一般趨勢。

年	份	荒地	畝數
一	九一四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
一	九一五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八
一	九一六		三九〇、三六一、〇二一
一	九一七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
一	九一八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

這只是一九一八年以前的統計。一九一八年以後，特別是近年，一九二七年以後，荒地的增加更是驚人。上述農村生產品的收或減少，及大批糧食的進口，也可以看出荒地增加的趨勢。

大批的農村人口離開農村是中國農村經濟崩潰以及荒地增加的一個重要的鐵證。關於農民離開土地及農村的現象，可以從下面的材料中看出一個輪廓。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中央內務部公佈的，全國二十二省農村調查材料統計，農民因農村經濟破產離開他往的，佔全部農民百分之二八，其中各個階層分配如下：

五畝以下土地佔百分之四十二，十畝以上的佔百分之二七，佃農佔百分之四二，自耕農佔百分之二二，其他職業的無業的佔百分之三七，農民到城市中工作者佔百分之五九，農民往外處工作者佔百分之三二。

這一統計材料當然不很可靠，然而已經可以看出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農僱農，因為農村經濟破產，因為軍閥制度的破壞，因為自己無法生存，不得不離開土地，拋棄自己可愛的故鄉，到別處去謀生活。說到中國農村經濟崩潰，必須提到災荒的問題。中國的災荒是很普遍的，如水災旱災等。這種現象的形成，決不是由於天災的關係，而主要的還是由於「人禍」，即由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商人、高利貸者的榨取的結果，例如過去南方蘇維埃區域，沒有發生任何災荒，而偏偏發生於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統治的區域，這也不是偶然的。

關於水災旱災的事實，遠的不論，剛是國民黨統治開始的那一年起，便有下面的材料。

年 份	省 區	災 區	災 民
一九二八	陝、甘、綏、晉、豫、魯、察、冀	五百三十五縣	三千萬人
一九二九	冀、陝	不詳	不詳
一九三一	江、淮、運河流域	十六省	五千萬人
一九三二	十一省	二百三十多縣	五六千萬人
一九三三	十五省	二百五十多縣	六千萬人

一九三四年又發生了大旱，受災旱的十一省，三百六十九縣。而一九三五年則水災旱災兩大潮流匯合，竟把過去一切災荒紀錄打破了。中國真可以說是一個「災荒之國」，每次災荒損失極大。例如僅僅一九三一年江淮運河流域水災，就損失了二十億元以上。

最後，中國農村崩潰，還可以從內地大批的現金流出方面看出。關於這一方面，很難找到完整統計數目字。一九三二年中國銀行營業報告上的下列一段，可以看到一般狀況。

「農村經濟衰落所表現的結果，最顯著的是內地現金的流出。農民或以田地荒蕪，或以農產品跌價以至收成減少，而其日用必需品，却不能完全放棄，仍然到市場去購買。鄉間富戶，或以匪患（？）遷往城市，或以農產衰敗，不能投資田畝之間，儲蓄遂逐漸向城市推移，結果農村對於市鎮，市鎮

對於都市，都市對於通商口岸，均立於入超的地位，現金紛紛流出。即以上海貿易看來，本來由各地流入於上海的現金，平均每月六百萬。往年四月爲內地需用現金最繁忙的時期，而本年竟流入上海二千二百萬元，實爲向來所未有的事。全年輸入上海的銀元計八千九百餘萬元，而輸出各地的數目除大連以外，不過兩千萬元。上海一地匯銀兩庫存達一萬四千六百七十餘萬兩，較二十年底增加一培以上，銀元庫存達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二萬元，較二十年底增加五千餘萬元」。

「照這種趨勢，農民僅有的資金已傾囊殆盡。既是衣食不能自給，那有餘力以改良生產；若購買力日益衰退，那有餘力從事致養，生產不能改良，即生產力無從恢復；購買力不能增進，即人民生活更無從改善，工商業無由發展，將與全世界的不景氣的現象一樣。這對於社會經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爲國人所不可忽視的。」

上面我們詳細的說明了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崩潰情形，說明了中國農村的貧困化，失業，流亡，餓死，凍死，浸死的原因。這些結果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的「恩賜」。同時，這一結果也正是過去十年蘇維埃運動發展的一個主要客觀原因。

## 第六節 總論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與政治制度

關於中國經濟的各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了。現在根據這些材料總結一下，並給以比較理論上的綜合的分析，以便對中國經濟性質有一般的概念。



一、中國經濟性質。照上面的材料，清楚的說明了是一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性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部分的轉化爲殖民地化的經濟。如果把這一部分經濟性質綜合起來說，對中國現在社會經濟性質應該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性質，關於殖民地經濟這一點需要加以單獨的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性質表現出一些什麼特點呢？

首先，這種經濟的性質的顯著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複雜性，中國社會存在着各種各色的社會形態與成分。例如有財政資本的最高形式的帝國主義經濟；有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有小農商品經濟；有更落後的氏族社會經濟的殘餘等，關於這一問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上會這樣說：

「中國經濟狀況的最主要的特點，是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着系統的複雜，從財政資本起到氏族社會性的經濟殘餘止。同時，在城市和農村中，商業資本的各種形式與小手工業及手工業佔有極大的『地位』，中國農村經濟，代表着半封建性的許多殘餘和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成分最密切的糾纏起來的一幅圖畫。」

但是中國經濟的複雜性，還不能說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性質的主要特質。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的特質，是各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的統治地位與中國經濟的非獨立性。這一特點，表現在中國經濟命脈十之八九操在各個帝國主義手中；表現在帝國主義利用它的不平等條約及特權，經過它在中國的銀行、工廠、交通、商品，去支配中國財政金融，去壟斷中國對外貿易，支配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的生活，變中國經濟爲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附庸。這一點決定了中國經濟性質的非獨立性，決定了中國經濟成爲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附庸性質。在這裡，中國與印度朝鮮的經濟底非獨立性僅是程

度上的差別而已。

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特點，不僅表現在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的統治地位，而且表現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本身封建勢力密切結合而統治，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軍閥、豪紳、地主、高利貸者）密切的勾結着，維持和加強封建的各種剝削形式，並經過這一結合而把均的政治經濟的勢力深入到中國農村中去。這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特點。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性質下面，決定了民族工業沒有獨立發展的前途，因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的統治，使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到處受到阻礙、打擊、破壞，尤其是帝國主義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以後，瘋狂的侵略，更加摧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生機，使它不能不日趨於崩潰沒落日益非民族化。這一點，上面已經加以詳細的說明了。

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底統治，同樣的也決定了中國農村經濟也必然日趨於崩潰破產。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崩潰，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直接掠奪中國農村經濟；另一方面由於封建勢力剝削與破壞的加強。這破壞的結果，造成廣大農民羣衆的失地、失業、餓死與凍死，大批的人口過剩。這種過剩人口，造成了中國軍閥龐大的軍隊，充滿了流氓土匪的隊伍。這種土匪與軍閥的隊伍，同時又加速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面當然也促進了農民革命鬥爭的發展。）

總之，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下的中國經濟，不論民族工業或農村經濟，都不能有順利的發展，只有益趨於崩潰破產。

二、應該說明，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是一個事物的兩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兩種不同的性質，而是整個中國經濟的兩方面不可分離的表現，是統一的整體。有些人以爲中國經濟的

半殖民地與半封建是兩種不同的性質；也有些人以爲中國農村經濟是半封建的而城市工業則是半殖民地性，或者對外是半殖民地性對內是半封建性。這種了解都是不正確的，不合乎事實的。

帝國主義不僅統治中國的城市，而且統治中國的農村；不僅統治中國的工業，而且統治中國的農村經濟，這種統治是經過與封建勢力的結合的方法去實現的。因此，在中國農村經濟方面，不僅是半封建的，而同時又是半殖民地的。這就是說，帝國主義不僅是加強農村經濟中的封建剝削，而同時直接掠奪農村經濟。例如帝國主義推銷大批商品到農村中去，同時收買大批的原料，用不等價的交換的方式，去掠奪中國農民的血汗，消滅中國的手工業生產。此外，還用超經濟的剝削方式，如賒款借款，來間接的剝削中國農民。然而，這種辦法又是經過中國封建勢力去實現的。因此，中國農村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了，然而封建生產方式剝削方式還是佔主要地位，中國農民要得到解放，因而不但要打倒封建勢力，而且要根本摧毀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

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也表現在中國城市工業方面，城市工業大部分操在帝國主義手中，中國民族工業，雖然有一部分勢力，然而民族工業都帶着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即一方面，中國民族工業與帝國主義經濟上財政上有密切的聯系，成爲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附庸；另一方面，民族工業又與封建勢力密切的聯系着，許多民族資本家，其本身也就是軍閥地主官僚出身，自己也在農村中進行封建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中國銀行對農村投資，創辦農民銀行，農民合作社的組織，進行高利貸的剝削，更是標本的例子）此外，並且在中國工業部門，許多工廠中，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也帶着半封建甚至半奴隸式的性質或色彩，（如養成工制，工頭制等）中國工業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統治下面必有的產物，因此，要發展中國民族工業，使它走到獨立發

展的道路，不僅要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而且要肅清封建勢力的桎梏。

這就是馬列主義者對中國經濟性質的認識和方針。

三、說明了中國社會經濟性質以後，我們進一步來指出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特點，大家都知道馬列主義者對於政治範疇的了解的出發點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是階級鬥爭」，「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在具體的條件之下，又表現為民族的統治工具。因此，社會經濟性質的特點，也就決定了政治制度的特點，在經濟制度內部的階級對比關係，也就決定了政治制度內部的階級對比關係，換句話說，誰要在經濟上佔統治的支配的地位，政治制度也必然帶着維持鞏固經濟上統治的工具的性質。這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性質，便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制度，這就是說，由於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獲得了統治的地位，並且它與封建勢力密切的結合起來而統治，因此中國在政治上也帶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因為這適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的政治制度，不能不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支配的所統治的政治制度，什麼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制度呢？這不是別的，正是自辛亥革命失敗以後，統治中國幾十年的中國軍閥制度（這裡僅僅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制度而說，至若「一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寇公開佔領的地方，在那裡政治制度已是殖民地的十足傀儡政治）軍閥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上層政治建築物，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的統治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集中表現。軍閥一方面是封建勢力（地主豪紳高利貸者）的政治代表，它代表着封建勢力的利益，與封建勢力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另一方面軍閥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表人，帝國主義經過軍閥制度來統治中國，來實現它的利益。但是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獨佔之下的殖民地，它是各個帝國主義列強共管的半殖

民地，各個帝國主義列強中，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能够以武力獨佔中國的，（「九一八」事變以後，形勢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採用了獨佔中國的政策）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方法，是採用勢力範圍的劃分，各帝國主義在它的勢力範圍中培植有力的軍閥出來，作爲它統治中國的工具。經過它，帝國主義可以獲得政治上的許多特權，在經濟上，可以採取許多方法掠奪剝削中國民衆。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是封建軍閥割據式的統治，各個帝國主義各自利用軍閥的統治。這種封建割據與過去封建時代諸侯的割據，在表面上看來，有它的共同之點，然而實質上，諸侯的統治是建築在封建的經濟基礎之上，而軍閥制度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諸侯在他本身統治的領域中是最高級的主人，而軍閥則一方面代表封建勢力，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各個勢力範圍中間，最高的主人翁還是帝國主義者。這是中國軍閥制度的特質。

中國社會這種政治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範圍的統治，和它與中國封建勢力的結合。此外，促成中國軍閥制度形成與發展的，還有其它的條件。例如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統治和剝削之下，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崩潰，大批的鄉村人口過剩，這些過剩人口爲軍閥供給了幾百萬的大兵，給軍閥去當炮灰，造成軍閥軍隊的性質基礎。同時，中國地域的閉塞，中國經濟的落後等，也是成爲客觀促成條件之一。然而，主要的還是根源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結合和統治。關於這一問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執委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上有說：

「中國軍閥的勢力，一方面藉外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另一方面則靠本地地主階級的隱援。軍閥的統治，建築在奴隸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軍閥官僚的政府機關地主豪紳商業重利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幾百萬的農民。發生這種制度的原因，是因爲那些無土地或缺乏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

盤剝的商人等的奴隸待遇，及爲城市和軍閥供給幾百萬苦力和士兵。」（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十一

頁）

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形成的社會根源及其特點。

中國社會這種政治制度，無疑義的完全是反動黑暗的政治制度。這一政治制度在民族關係及地位上說來，是不獨立的、不統一的。表面上看起來，中國名義上是個獨立的國家，中國人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實際上中國政治上的一切大權，都操在帝國主義手中，不過不是由某一個帝國主義獨佔，而是歸國際帝國主義列強共管罷了。中國的軍閥，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代理人，帝國主義經過中國軍閥，獲得許多政治上的特權，與中國訂立了無數的不平等條約，利用這些特權與不平等條約來束縛中國，政治上奴役中國。所以，帝國主義列強是中國政治上統治的最高主人翁，軍閥不過是執行它的意志的工具而已。

由於中國政治上是帝國主義列強支配下面軍閥割據的統治，因此，中國政治制度是不統一的。自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全國統一的集權的中央政府。每一個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內，都形成某一帝國主義列強與該地區封建勢力結合的軍閥割據的統治。北洋軍閥政府曾經掛過中央政府的牌子，可是實際上它的權利無法支配到全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的國民政府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由於沒有統一的政治制度，因此也無法建立統一的外交、財政、經濟政策，統一的軍隊編制，統一的司法制度，就是有也不過是形式上的統一罷了。不僅如此，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害的衝突，以及各個地區軍閥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不一，常常爆發軍閥混戰。從辛亥革命失敗

到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變，幾乎每年都有軍閥混戰。每一次軍閥戰爭，都加深了民族的分裂與社會經濟的危機。歸根結底加強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勢力。所以，由於中國軍閥制度的存在，中國政治上是不獨立的不統一的。

其次，中國政治制度是不民主的。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最落後反動保守的社會力量，因此它們的政治制度當然是極端專制黑暗的。在這種政治制度下面，不僅談不上什麼民主權利，就是連最低限度的人權自由也無法保證。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空掛了幾十年的「中華民國」招牌，然而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夢過民主政治的生活。大革命失敗以後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政，形式上雖然有了一些變動，然而基本上仍然是少數軍閥官僚專制政治。

最後，中國政治制度是摧殘民主的，在這種政治制度下面，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剝削一天天的加重，弄得民族工業非民族化，農村經濟破產，國民經濟總崩潰，老百姓不是凍死餓死，便是浸死打死。上面關於中國民族工業及農村經濟的敘述就是最好的例證。

總結起來，中國政治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軍閥制度——是不獨立的不統一的不民主的反民主的。這種政治制度的存在，也就是中國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及中國整個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的主要源泉。

關於中國社會經濟性質及政治制度，大體上就是如此。上面所說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部分，今天日本帝國主義尚未佔領的地區，基本上還是保留了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的特點，至若「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的東三省，以及今天日寇佔領的地區，則既已屬於殖民地性質，在這一殖民地中，日本帝國主義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完全擁有獨佔的地位。中華民族

既陷入於亡國滅種的災禍中，關於中國這一部分殖民地性質的經濟政治狀況的特點，需要另外找機會去單獨加以說明，這裡暫作罷論。

總結中國社會經濟性質及政治制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或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參照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

## 第七節 中國各黨派的理論底批判

一、上述的對於中國經濟性質及政治制度的觀點，是馬列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所主張的。這一觀點是根據着最先進的理論馬列主義及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經濟的政治的具體情況分析出來的結論，這一結論是早被中國幾十年來歷史鐵的事實所證實了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全部政治領導和活動的出發點——便是首先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及其民族特點底這種嚴正的科學的分析。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的觀點是和其它一切黨派不同的。中國各黨派由於它們的階級立場社會背景的不同，因此，他們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估計也不一樣。例如托洛斯基派（他早已不是派



別而是匪徒奸細偵探的集團）認爲中國的經濟性質，是資本主義性的；國民黨的大多數的人們，認爲中國經濟性質是封建主義的，其他黨派，各有各的觀點，然而大體上不出於上述兩種觀點之外。他們共同之點可以說是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故意曲解中國的經濟性質。關於這些黨派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曾經和它們作過許多理論上實踐上的鬭爭。中國全部實際鬭爭和生活，完全證明了它們的虛偽與中國共產黨估計的絕對正確性。

爲了使大家澈底認清中國各黨派關於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論的錯誤及害處，我們這裡想加以扼要的批判的檢討。爲節省篇幅起見，我們這裡只提出托洛斯基派及國民黨的觀點。因爲它可代表着中國除中共以外各黨派，關於經濟性質的兩種主要的見解，現在首先來檢討托派的「理論」。

二、中國托派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的估計，在它們內部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而且常是相矛盾的。有的說，中國經濟是「買辦的落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如劉鏡園）；有的說「中國已經發展到了財政資本主義」（如王任曙）有的說是「商業資本主義」（陳獨秀）等等，真是五花八門離奇古怪。然而，不管怎樣的不一致，基本上他們總是有了一個共同之點，即都是認爲中國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位，封建勢力已經消滅了，或者已經變成爲「殘餘的殘餘了」。

托派的這種估計，是根據下列的幾個主要的「理由」：

- 1、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幫助了中國工業化。
- 2、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絕對對立的，不能結合的。
- 3、帝國主義財政資本主義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都是資本主義，用不着加以區別。誰加區分誰

就是工人階級的叛賊。因此，財政資本勢力在中國的擴張，也就等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4、商品經濟的擴大，商業資本的發展，也就等於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中心問題之中心。

5、農村中土地集中，貨幣地租的存在，商品經濟的擴大，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經濟中也佔統治地位。

現在我們來分別地把托派底「理論」論據加以檢討駁斥，首先來說「帝國主義幫助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這種說法最露骨的便是托派嚴靈峰，他公開在動力第一期上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經濟資本主義化、工業化」。托派的錯誤，主要的是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真實目的和它的作用。什麼是帝國主義？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在這一階段上，獨佔代替了自由競爭，工業資本銀行資本的混合，形成了財政資本，資本輸出佔了特別重要的地位，所以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腐爛的資本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參照列寧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一書）因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我們已經上面詳細的說明了，正是要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變成他的財政資本的附庸，變成它投資的場所，推銷商品的市場，原料的出產地，剝削與榨取的對象。一切對於帝國主義這一侵略目的有利的它都採用；一切對於這一侵略目的有害的它都堅決的排斥。帝國主義這種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帝國主義本身的經濟發展的規律決定了的。

因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作用，不會是幫助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恰恰相反的是要變中

國爲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附庸，因爲民族資本主義獨立的發展，結果會削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力量，會妨害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這樣對於他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情，當然不會幫助而只有破壞。自然，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造成了相當的資本主義的關係。（例如交通工業的建設，商埠的開闢，商品經濟的擴大等）這種生產關係客觀上在某一時期中也會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生長，然而這只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過剩的派生的現象，而且這一現象的形成，完全是違反帝國主義主觀的願望的結果。而帝國主義主要的統治作用却在限制打擊摧殘民族資本主義的生命，使它同趨於崩潰沒落。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證許多事實說明了。托派的錯誤，就是不願意看見這些鐵的事實，而閉着眼睛歌頌帝國主義幫助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完全是給帝國主義作辯護士的理論，實際上重復了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所謂「超殖民地化」的理論的錯誤。這種理論就是認爲「帝國主義幫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的發展，給落後民族以興盛進步和文明」。托派這種理論，早已被一百年來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歷史全部鐵的事實打得粉碎。

其次說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絕對對立不能妥協的問題。托派認爲封建勢力是落後的，而帝國主義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因此，如果說帝國主義能够與封建勢力結合或勾結，那對於托派是十二萬分「荒謬怪事」，然而對於我們及稍有常識的中國人，則是十二萬分簡單明瞭的真理。因爲資本主義雖然曾經有一個時期有過進步的作用，（即當它在反對封建制度的具體情況之下）然而不久它的進步作用已經過去了，尤其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已經成爲腐爛的垂死的反動保守的力量。因此，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過程中，必然會和中國社會一切黑暗勢力反動勢力勾結，來阻礙中國

的進步，來達到它侵略中國的目的。這一點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決議上說：

「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上的擁護。因此，首先和以前的社會構造的統治階級地主，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結成了聯盟，進攻大多數民衆，帝國主義到處企圖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是鄉村）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

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不僅不是怪事，而且是帝國主義本身發展規律必有的現象，絲毫用不着驚奇的，托派以爲封建勢力屬於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則是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兩者的結合，是不可想像的，其實這樣「不可想像」的事情多得很。例如過去西歐的資產階級開始反對封建勢力，到了後來在民衆革命面前又與封建勢力妥協，結成聯盟進攻革命，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民族資產階級一開始也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並且曾經領導過當時的北伐的革命戰爭；但是到了後來，在帝國主義引誘和革命浪潮沖擊之下，也是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和他們結成了反動聯盟，共同進攻革命，就是托派自己過去到現在，也是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然而它在過去一個時期還是工人運動中派別之一，到了後來直接與日本德國法西斯帶強盜勾結，反對蘇聯及反對世界革命，成爲最可恥的卑污的「奸細偵探走狗殺人匪首」的集團。所有這些，都不是什麼「不能想像的」「怪事」，而完全是最具體最生動的事實。

再次，我們說到托派所謂「帝國主義財政資本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用不着加以區分，財政資本勢力在中國的擴張也等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底論據，這一「論據」比上述的兩個更加糊塗與荒謬。不錯，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也是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如果把兩者中間劃一等號，說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是一個東西，因爲橫

豎都是資本主義，橫豎都是資本家剝削工人，那便是根本沒有一點科學常識，因為帝國主義財政資本主義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個東西，兩者之間有重大的區別，帝國主義財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最後的階段，是腐爛的垂死的獨佔的資本主義，是世界上一切反動制度中最反動的最帶有侵略性的制度；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制度，則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資本主義，這一資本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是從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才發展起來，而遭受到帝國主義財政資本主義阻礙壓迫。這兩者之間是有顯明的區別，並且有着矛盾存在的。托派否認這兩者之間的區別，這是說明他們完全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反歷史的反辯證法的眼光去觀察事物。只要它是資本主義，那麼不管什麼樣的資本主義都是一樣，橫豎就是資本主義。「有奶便是娘」這便是他們判斷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對於托派是十分需要的，因為他們可以從這樣的提法之下，「很方便的」得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然而這種方法根本是違反事實，違反科學原則的。

托派說，誰要對帝國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加以區別，誰就是工人階級的叛賊，因為這兩者都是「一邱之貉」。托派根本不了解，承認這兩者的區別，不一定都是工人階級的叛賊。改良主義者承認這一區別是爲了替民族資本主義服務，爲了奴役中國工人階級；而馬列主義者承認這一區別是爲了正確地認清民族的及階級的敵人，並從這裡得出關於戰略策略必要的結論，換言之，也就是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及其解放的事業。

再其次，我們來看托派的又一「論據」，即商品經濟的擴大，商業資本的發展，也就等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論據」，也一樣缺乏科學的經濟學常識。這裡第一，托派不了解商品經濟有簡

單的與擴大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分。第二，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本質。第三，不了解中國商業資本的特點。

現在先說第一點。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以前早已存在，不僅在資本主義前的封建社會有過，而且在奴隸社會也是存在過的。這種商品經濟叫簡單的商品經濟，他與擴大的商品經濟即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區別。簡單的商品經濟要轉化為擴大的商品經濟，必須在勞動力成爲商品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即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才有可能。因爲，商品經濟的發展（指簡單的）不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說到第二點，關於商業資本的本質是與商品交換，商品經濟，密切地相聯系着。有了商品交換，商業資本便逐漸形成起來。因爲商業資本是商品交換中的媒介，它並不代表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或生產關係，相反的，商業資本的本身發展，還要用某種生產方式來決定。因此，商業資本在各個社會制度下面是在過去的，只要那裡存在着私有制度及商品交換。例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商業資本，這些不同的社會商業資本的不同的作用，正是由該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之。這些道理，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三卷有詳細的說明。所以，托派說「商業資本的發展便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完全沒有經濟學常識的胡說。

此外，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到中國商業資本的特點，那托派的錯誤更加明顯。中國商業資本的特點是什麼呢？它的特點就是買辦性及半封建的性質。因爲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統治之下，也不能不帶着這種特點。中國商業資本所流通的商品，大多數是帝國主義的商品和帝國主義所收買原料。這可以從中國巨量的入超數目，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的壟斷對外貿易的作用中可以看出。帝國主義爲了推銷它的商品，收買中國的原料，也須要這種買辦性的商業資本。固然，中國有些商人獨立的進行

出口的商業，然而因爲種種的關係（如外匯的關係），也不得不與外國銀行或洋行發生關係。因此，中國商業資本多半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廣大民眾間的商品交換的媒介。這與資本主義社會從工業資本中分出來的獨立部門——取得平均利潤的資本主義性的商業資本，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中國商業資本還帶有深厚的半封建性。這不僅因爲許多商業部門中，軍閥地主豪紳的資本佔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中國商業資本在農村中的剝削，也與封建的落後生產方式剝削方式密切聯系着。許多地方商業資本並且採用高利貸的剝削形式。關於中國商業資本這一特點，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代，曾有下列一段極精彩的說明：

「中國農村中，有沒有商業資本呢？是有的。不懂有的，而且它吸取了農民的血汗，並不比封建主們差些，但是這種原始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在中國農村中與封建地主的統治與地主的統治，特別地混合着，它與地主一樣用中世紀的剝削與壓迫的方法來對付農民。同志們，問題就在於這種，拉狄克的錯誤就是在於他不懂得這個特點，不懂得在中國農村中，封建殘餘統治與商業資本，在保存對農民的封建的中世紀的剝削壓迫方法中混合着這個特點」（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同志在答覆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問題之一）

斯大林同志這一段話是批評中國托派的老祖宗——托洛斯基及拉狄克的。然而拿着這一段話去批評中國托派，那是更適當沒有了。因爲中國托派也正如他們的老祖宗一樣，犯着這種沒有常識的錯誤。

因此，根據上面的敘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商業資本的膨脹，絕不是表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發展（如托派說的），而恰恰相反，正是表示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中國的加強，封建勢

力的存在與民族資本主義的崩潰與沒落。

托派認為商品經濟的擴大，商業資本的發展，就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他們認為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如任曙）。其實，中國經濟問題中心的中心，並不是對外貿易，而是帝國主義怎樣統治中國的問題。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不僅是對外貿易問題，而且主要的不是這一問題，而是它的財政資本在中國的統治。它的銀行，它們的勢力範圍的劃分，它與封建勢力結合剝削和壓迫廣大的勞苦群眾問題，托派之所以把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限制於對外貿易問題的原因，不過是企圖從對外貿易商品經濟的擴大的數目中，去證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罷了。其實，就是在對外貿易問題上，也只能說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統治作用的加強，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不發展。例如帝國主義每年大規模商品的輸入，歷年入超，中國出口商品完全是原料佔絕對大多數，並且出口一年一年的減少，外國銀行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壟斷等等各方面都說明了這一真理。

最後說到托派關於中國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化的問題。托派認為資本主義不僅是統治着城市，而且統治着農村。農村資本主義主要的表現，他們認為是土地集中與貨幣地租的存在等（如任曙等）。

現在我們首先來說土地集中的問題。中國農村土地集中本是事實，上面論及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農村經濟時，我們已根據統計數目字說明中國絕對大部分的土地（百分之六十五），是集中在少數人的地主階級手中，而最多數人口的貧農（百分之四十八）只佔百分之六的土地。因此土地集中，這是無容否認的事實，而且集中的趨勢一天天的增長。

但是土地集中，並不表示中國農村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恰恰相反，只是說明封建剝削的加強。因為第一，土地集中在封建的地主階級手中，而不是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第二，土地集中並沒有改



變農村中半封建的生產方式與剝削方式。因為地主不是利用這集中的土地，去採用新的生產技術僱傭勞動，從事農業資本主義的生產，而仍然是出租給農民，剝削農民全部的剩餘生產品，甚至必需的生產品的一部分。農村經濟的生產方式還是手工業式的落後的，剝削方式（地租高利貸）還是半封建的。第三，因此土地集中在中國農村中，只表示土地私有權的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而土地使用權則分散於千百萬農民貧苦群眾，這是說地主仍然是把土地零碎的租給農民耕種，而不是把土地集中起來，開辦大規模的農場，中國農村耕地分散是世界上第一等的。這種土地制度更加使農民貧困化，與障礙生產技術的改造。

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剝削的半封建性，也可以在地租的剝削性質上表現出來，中國的地租的本質上內容上是封建性的。它是建築在土地封建私有性的基礎上，建築在地主與農民的對立生產方式上。地主出租土地給農民，取得農民全部剩餘品甚至必需的生產品的一部分，托派關於地租的了解也是錯誤的。他認為中國農村中地租的剝削，不是封建性而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他們的主要根據是貨幣地租的存在。

但是我們應該指出，第一，區別地租的性質不一定在它的形式，而主要在它的內容，在它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的基礎。封建地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勞役地租、物產地租、貨幣地租，但這三種形式，內容上都是封建性的。因為它都是建築在封建的生產關係上面，所不同的就是貨幣地租比前兩種地租形式，代表着社會商品經濟發展更高的階段而已，至於資本主義的地租，一般的說當然是採取貨幣形式，如有時也有例外，例如在法國、意大利、美國資本主義國家中植棉區域的地租，也有用物產支付的，德國在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馬克跌價，租金不能確定，曾將貨幣地租改為物產

地租。而這形式上的改變，並不改變它的本質。因為這種地租的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性的，所以地租也是資本主義性的。

關於封建地租與資本主義地租的區別，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三卷中會有深刻的分析。他說「封建地租是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的唯一的標準形態，而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的利潤，是剩餘價值的支配形態。地主所榨取的一部分地租，僅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以上超過的部分，而封建地租則包括着全部的剩餘勞動，甚至必須勞動的一部分。」

資本主義地租的生產關係的前提，是以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三個階級存在當前提。因此，在資本主義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的生產物，是以工資利潤地租三種範疇而分配的情形；而在封建的生產方式中，只以剩餘勞動的全部作為地租歸諸地主，另外以必須要的勞動生產物歸諸農民的簡單形式表現着，所以封建地租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術語來說明，那他就包括着相當於利潤和地租的部分。因此他是剩餘價值的標準形態，而且假使真有某種利潤隨着這種地租發生，那末利潤並不是地租的限制；反之，地租倒是利潤的限制呢」。（馬克思）

一直到現在，中國農村生產關係的前提，主要的還是地主與農民兩個主要的階級的對立，地租是農民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的唯一標準形態。因此，他是封建性的，而不是資本主義性的，不管它採用物產的或貨幣的形式，內容都是封建性的。

第二，貨幣地租的形式，在中國雖然存在，然而主要的仍然是物產地租，貨幣地租只存於沿海的幾個省份。同時，就在那些省份中，物產地租仍然是佔主要的地位。

例如中國北部和東甯諸省的地租形式，據調查的情形如下（六省六百四十一農戶）：

省 縣	租佃農別	分租	穀租及折租	錢租
安徽宿縣	1. 佃農	五四	三	沒有
安徽宿縣	2. 自耕農兼佃農	三〇	三二	沒有
河南新鄉	自耕農兼佃農	二八	一六	沒有
河南開封	自耕農兼佃農	沒有	三三	沒有
山西五台	佃農	沒有	一三六	沒有
安徽巢縣	佃農	沒有	五一	沒有
浙江鎮海	佃農	一六	一八	一七
福建連江	佃農	沒有	二二	沒有
江蘇江寧(1)	佃農	沒有	一五	沒有
江蘇江寧(2)	佃農	四	六〇	三三
江蘇武進	佃農	沒有	四二	一

參照中國農村經濟論一書二五九——二六〇頁。

從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就是商品經濟比較發展的省份，物產地租還是佔絕對大多數，有許多地方甚至根本沒有貨幣地租的形式，此外還要指出一點，不僅貨幣地租很少，而且中國農村不少地方還存在着勞役地租的形式，有些地方地主在租佃的契約上，竟訂明要替地主做工若干日（如江蘇省的滙雲縣）。就是在江蘇南部工商業比較發展的區域，永佃的佃農逢到地主家中婚喪大事，必須全家對地主服役，雖然名義上得到一些低廉的工資，然而實質上僅是實錢的遺跡。有些地方地主還規定佃戶每逢過年過節，必須送些農產（鷄菓等）。最後，伴着物產地租的存在，還保留着這種身體的隸屬關係。所以這些說明了中國地租的封建性質，粉碎了托派的胡說。

總括起來說，托派這些「論據」。根本違反中國社會客觀的事實，根本違反馬列主義科學分析中國經濟的基本原則，他們只看見一些現象形式的變化，然而根本不了解這些現象的本質，形式中包含的內容。

托派由於對中國經濟性質這種荒謬理論出發，因此，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也無法去正確認識和把握，並且從這裡產生了他們過去取消反帝與土地革命的反革命取消主義，及後來墜落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奸細走卒，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們政治上理論上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必然歸宿。

三、但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經濟性質的見解不僅是與托洛斯基派相反，而且與國民黨也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國民黨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的見解，雖然他們內部也不完全一致，然而整個國民黨，大體上都是一致的認爲中國經濟是封建主義的性質，他們認爲中國社會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外

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則仍然是落後的封建社會；外國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國則沒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有的只是「大貧與小貧」（資產階級是小貧，無產階級是大貧）因此，中國社會不需要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不需要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的學說，而需要防止階級鬥爭的改良主義民生主義。例如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一書的民生主義第二講，有說「中國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的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中，分出大貧和小貧。其實中國頂大的資本家與外國的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窮窮人都是可以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已然不過是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統統都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之別。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兩千多年（？！？），但因為工商業沒有發展，今日的社會的情形，還是和兩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三民主義三三五）後來國民黨的頑固保守的理論家戴季陶把這一理論進一步的發揮起來，認為中國有特殊的「國情」是不需要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鬥爭，需要階級合作，不需要共產黨而需要代表「全民」的國民黨，不需要馬列主義而只需要三民主義。

國民黨這種「理論」顯然是完全與中國社會現實的事實相矛盾的。他們的錯誤，正是不能了解或者故意曲解（如國民黨中頑固保守派）中國經濟的性質，不了解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制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不但不能獨立地順暢的發展，並且日益趨於崩潰破產；然這不是說中國民族工業根本沒有一點發展，不是說中國根本沒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其實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管他有何弱點，但是他在某一個時期曾經有過相當的發展，這是客觀的無可爭辯的事實。例如我們在上述「帝國主

義統治下的中國民族工業」一節，詳細的說明了中國民族工業的歷史及其特點，我們明確的指明了中國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第一次大戰這一時期，及帝國主義大戰以後，一直到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以前（一九二二年以前）有了相當的發展，特別在輕工業方面，如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等。雖然這一發展是部分的有限的，然而應該承認中國民族工業總算是有了一定的發展，否認這一事實，便是曲解歷史。

中國共產黨是承認中國經濟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地位的，承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承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獨立順暢的發展，甚至最後仍然日趨於破產崩潰。但是中國共產黨同時却承認中國民族工業過去一個時期中曾經有相當的發展的事實，正是由於這一發展，才能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才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無產階級，才形成了近十多年來中共領導推動下的中國革命運動。

國民黨一些人們否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相當發展的事實，把中國現在的經濟性質與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以前，甚至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時代以前的中國經濟性質看成一樣，看成差不多的東西。這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是極嚴重的近視。這一錯誤實際上是否認了中國自帝國主義侵略以後一百年間的變化，否認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相當的發展，也就等於否認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因為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不只是表現在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統治作用，以及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而且還表現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相當的發展，和民族工業的買辦性和半封建的性質。最後，由於國民黨對中國經濟性質既沒有正確的了解，因此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當然也不會有恰

當的認識，這是不言而喻的。

總之，不論托派及國民黨，關於中國的經濟性質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托派的錯誤是不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的統治作用，不了解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下面中國民族工業不能夠獨立的順利的發展，只是閉着眼睛空喊民族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把帝國主義的商品看做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勢力的擴大看做中國民族工業的擴大，對外貿易作為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把土地集中及貨幣地租看作為中國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把中國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混為一談。而國民黨的錯誤則在於否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相當發展，否認中國經濟自從帝國主義侵略以來百年間的變化，閉着眼睛空喊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和他們兩者的對立，把半殖地半封建的經濟與百年前甚至兩千年前的封建經濟等量齊觀。兩者共同的錯誤，都是不了解中國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以及這一經濟基礎上面的政治制度本質和特點。因此，他們兩者都無法解決中國社會及中國革命所提出的問題。

# 第二講 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及其

## 特點

### 第一節 中國革命和它的任務

(一) 上面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對於中國經濟性質及政治制度作了一個詳盡的分析，這一分析清楚的告訴了我們，中國社會的經濟完全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這種經濟性質大大的妨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大大的剝削了中國民族的力量，惡化了中國大多數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的生活，使他們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鉗蹄之下餓死、凍死、打死、浸死、炸死、或者過着牛馬般的生活，這就是說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的生產關係，大大地妨礙了中國社會中新的生產力量的發展，（中國農村經濟及民族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舊的生產關係與新的生產力兩者之間發生了矛盾，前者已經成爲後者的發展的障礙。這一矛盾，成爲現代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要發展中國的經濟生產力，要改造中國的社會，要解決中華民族及中國廣大的被壓迫人民，就必須首先改造舊的生產關係，這種舊的生產關係與新的生產力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結果便形成革命。



由於中國生產關係的特點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結合的統治，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產生革命的鬥爭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民族的鬥爭；另一方面是階級的鬥爭，換句話說便是一方面是反帝國主義要求中國民族獨立解放；另一方面反對封建勢力，要求中國廣大的人民社會的解放。前者是民族的革命，反對民族的壓迫；後者是反對封建的革命，反對封建勢力的統治和剝削制度。這兩者就構成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的主要的內容和任務。

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就是要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勢力，在經濟上要求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經濟能夠獨立發展興盛，在政治上說來便要求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而統治的軍閥制度，掃除一切黑暗的政治勢力，建立嶄新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強的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之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是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大任務，這些任務從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開始，經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三年的二七工人的大鬥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的中國蘇維埃紅軍的戰爭，一直到現在三年來的抗戰，都未曾完成。因此，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仍然成爲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內容。

(二)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認識中國現階段的革命運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像某些人們所說的是「蘇聯造成」的或者是「中國共產黨鼓動起來的」。中國革命主要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統治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強佔我們中國的領土，壟斷了我們的經濟命脈，支配我們中國的經濟生活，剝削我們中國人民的血汗，同時還勾結封建勢力，維持和加強中國農村中的封建剝削，特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我們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大多數的人民不願意當亡國奴，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主解放

民族獨立，對封建勢力也是如此。至於蘇聯是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成功的國家，它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大本營，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最好朋友，它贊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它同情贊助中國革命。同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它的國防力量的加強，和平政策的勝利，對中國革命也是有利的。它可以更加提高中國人民對革命勝利的信心，並鼓舞着我們進行革命鬥爭。但是中國革命決不是蘇聯造成的，中國革命主要是中國人民自己受不了民族的壓迫和軍閥封建勢力的統治，起來謀獨立自由解放的神聖事業，是中國社會內在矛盾的產物。所以在蘇聯十月革命未曾勝利以前，中國革命就早已爆發起來了，例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起義、辛亥革命，便是中國人民自己起來反對國內國外敵人的鬥爭，與蘇聯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關係。至若「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鼓動起來的」，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先鋒隊。它十九年來一貫的爲中國民族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奮鬥。它是最堅決最徹底的領導革命的政黨，它爲中國革命事業盡了很大的力量，同時毫無疑義的，中國革命只有在它的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中國革命不是中國共產黨鼓動起來的，它主要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產物，是中國人民不願受壓迫而起來反抗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代表徹底革命的階級而參加和領導這一革命罷了。譬如在中國共產黨不曾成立以前，也曾經爆發了許多中國革命鬥爭，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起義、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些革命鬥爭均沒有中國共產黨參加，並且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也不能有任何的關係，因此凡是認爲「中國革命純粹是中國共產黨鼓動起來的」都是錯誤的。

## 第二節 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

(一) 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就必須知道什麼叫做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它的實質是什麼。關於這一問題，列寧在他的名著「兩個策略」中講到俄國一九〇五年民主革命的實質時，就會經下了下列的一個簡要的定義：

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確信現時俄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現時俄國所必需的那些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的改革與社會經濟的改革，其本身不但不會破壞資本主義的基礎，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且相反的這些改革恰恰能夠給資本主義肅清大道，使資本主義得以普遍迅速的按照歐洲式而非亞洲式地發展，使資產階級統治成爲可能。（參照列寧選集中譯本第五卷九二頁）

列寧這一馬列主義的古典式的定義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它的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的任務和目的，在政治制度要進行民主的改革，要創立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共和國；經濟上的改革是在破壞封建的經濟基礎，使資本主義經濟客觀上能夠生長和發展。所有這些改革，其本身不但不沒有破壞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且它客觀上創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優良條件。毫無疑義的，列寧這一定義，不僅適用於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就是對於中國現階段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原則上也是完全適用的。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它的性質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什麼呢？因爲這一革命的目的或任務，

照上面所分析的是在政治改革上，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在經濟改革上，是要摧毀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廣泛的發展民族的經濟及民族的生產力。而這些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內容都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經濟的範圍。相反的這些任務實現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客觀上更易於發展。因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之所以不能順暢及獨立發展的原因，根據上面的分析，主要地顯然是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假使革命勝利，推倒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那末民族資本主義客觀上當然有更加容易發展的可能。因此，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中國革命這一性質，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根本上的變化，雖然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二七鬪爭、第一次大革命、十年來蘇維埃運動，和三年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許多不同時期的變化。

有些人說中國共產黨過去在大革命以後，在南方各省建立蘇維埃政府，「實行共產主義」，這是不對的。大革命失敗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的十年來蘇維埃運動，在它的性質上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為它當時的任務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實行土地革命。它在經濟上的改革是肅清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廣大農民勞苦群眾，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取消封建的苛捐雜稅及高利貸的剝削，發展蘇維埃的經濟，改善工人農民的生活；在政治上建立蘇維埃制度的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實行最徹底的革命民權主義，掃除一切政治上黑暗勢力，做到真正的「還政於民」。所有這些經濟的政治上的改革都沒有超出於資產階級的經濟範圍之外；相反的，在土地革命實行之後，在苛捐雜稅高利貸取消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客觀上仍有向前發展趨勢。因此，蘇維埃運動祇不過是以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最徹底的革命工農民主專政的方法，去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

命的任務，並不是什麼「共產主義」。

至若今天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更是如此。今天我們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抗日民族革命的目的，在驅逐日寇出中國，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強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都沒有超出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範圍。相反的，客觀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抗戰以後，隨着抗戰的勝利會有向前發展的趨勢。三年來的抗日，許多事實和經驗都證明了這一真理。正是如此，所以工人農民與資產階級能够合作，國民黨與共產黨能够團結一起共同抗日，因為這一革命不僅對於工人農民有利，而且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對於一切真正抗日的人士也是有利的。

(二)不過這裡應該說明一個問題，即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雖然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然而我們決不能了解爲這一革命僅僅是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有利，而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及中國人民就沒有或沒有多大利益。關於這一問題，列寧在他的名著「兩個策略」一書中，曾有了極恰切的評論。列寧對這一問題的觀點，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也完全適用的。

列寧在該書中說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定義以後，接着他就發揮了一個極有價值的天才見解，這一見解在列寧下列的一段中表現出來：

「但是這個表現(即上述的定義)絕對不是說民主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就沒有多大的利益，這個定義絕對不是說民主革命不能有兩個可能的實現形式——或者以大半有利於大資本家財團「受過洗禮的」地主的形式中實現；或者以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來實現……在俄國這樣的國度裡面，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那裡所受的痛苦，倒是比不上它從資本主義發展不够那裡所受的痛苦那樣深刻。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的自自由和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所有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迅速

發展的舊制度殘餘，對於工人階級無條件的有利……因此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是十分有利的，以無產階級利益着想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無條件的必要。若資產階級革命來得愈堅決而愈徹底，則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鬭爭也愈有保證……而且這個結論中間，同時還有一個見解，就是在相當的意思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利益較大於資產階級。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這個見解是無疑義的呢？原來資產階級原是依托國內一些舊制度殘餘，如君主制和常備軍等等，以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要資產階級革命，不要把國內一切舊制度殘餘掃得乾淨，要稍許保留幾種，就是說不要使這一革命太徹底、太堅決、太無情，才有利於自己——資產階級本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地位，逼使它不得成爲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只是回願過去，害怕民主進步性，因此這個進步性有使無產階級強健起來的危險。至若無產階級則除了自己頸上一付鎖鏈外，什麼東西也不會失掉的；而有了民主主義他卻可以取得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底民主改革愈是徹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不利的範圍愈是狹小，資產階級革命愈是徹底，則它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改革中的利益（列寧選集五卷中文版九五——九六頁）。

列寧這一天才的見解，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適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也是如此）迫切的要求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爲這一革命能够造成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前提，能够給無產階級以民主自由以組織自己，團結自己，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並獲得對廣大農民羣衆領導權的經驗才幹和習慣。但是不懂如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於無產階級利益較大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底民主革命，因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正如我們在經濟性質一講中所分析的，許多從買辦轉變過來的，絕對大多數的資本家，同時也是在農村中進行封建的剝

削，因此它不願意也不能夠澈底肅清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相反的，它希望革命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使它的勢力有擴張的可能，民族工業能够生存發展；另一方面又不要給廣大民衆以民主自由，使他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以便於他自己獨吞革命的果實。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愈澈底，則它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愈小，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的利益更大和更有保證。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特別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來的歷史，也既經給這一論斷提供了足夠的事實根據。

### 第三節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

上面我們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性質，說明了這一革命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的關係，爲了澈底認識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的實質，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去研究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點，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或形態），例如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都有過各種不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些民主革命的性質、任務，雖然在基本上是一樣的（即按照列寧所發揮的那種定義包括的內容）。然而由於國際國內環境的不同，民族國家情況的特點，因此各個民主革命之間，也有很重要的區別。例如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以及俄國一九〇五年民主革命與一七八九年法國的民主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德國的民主革命。都有很重要的區別（關於這幾種民主革命的重大區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他們的著作中會不止一次的着重說明過，並由此得出戰略策略上不同的結論）。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與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有顯著的不同。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何特點呢？它與十八十九世紀的民主革命及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有何不同呢？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不能不回答的一個問題。現在首先來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際環境。

中國民主革命是在新的國際環境下面生長及發展起來的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新的國際環境之下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這是中國民主革命顯著的特點之一。關於這一點當着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開始生長發展時世界革命的牽領者——列寧就會經指出這一特點說：

「印度和中國沸騰着，這是七萬萬以上的人，這加上附近的完全與他們類似的亞洲國家是地球上人口的一大半。一九〇五年革命在那邊一往直前地並

且日漸迅速地進行着。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和巨大的區別，就是俄國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還是比較起碼在最初的時候）孤獨的進行，就是說還沒有立刻有別的国家牽入革命漩渦。但是印度和中國正在發展的革命，現在已經被牽入國際運動牽入世界革命」（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八卷七十四頁）。

列寧所指出的這一特點，就是說中國民主革命生長發展在另一個國際環境條件之下，與俄國一九〇五年民主革命不同，它一下子「被牽入革命運動，牽入革命運動，牽入世界革命」。列寧這一段估計還是在一九一一年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之後，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之前。至若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尤其是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際環境，那毫無疑義地要比當時新得多了。現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國際環境主要的特點，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我們說主要的有下列的幾個特點：

第一、中國革命生長在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不僅如



此，中國革命的發展以及近幾十年來的歷史完全是處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新的經濟危機時期。在這一時代帝國主義內部矛盾急劇生長，內部困難日益增長，甚至爲了解決他們內部的困難，已經爆發了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在這種情形之下，帝國主義的力量無疑的比諸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時代削弱了許多。另一方面是世界革命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增長，各國共產黨組織的鞏固擴大，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大大削弱；另一方面表現在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這一革命運動，又將因爲中國革命繼續發展而必然增強。

第二、中國革命的生長和發展是蘇聯——反國際帝國主義鬭爭的領導者——在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地域上存在着鞏固着發展着的時候，尤其是最近幾年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它向着共產主義邁進，它在國際上的影響，極大的增長，它的國際力量無限的提高，這一點對於中國革命有極大的意義。尤其是因爲中國與蘇聯地理上的最爲接近，中國北部及西北部與蘇聯連界幾千俄里之長，沒有一個國家能使中國革命和蘇聯隔絕起來。

第三、另外一個特點也不容忽視的，就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在這一點上，它與許多殖民地和附屬國不同，它不受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列強獨佔的統治束縛（如印度完全由英帝國主義掌握，東印度群島受荷蘭帝國主義束縛）。這一特點對於中國革命肯定方面的意義，就是在由於中國是各個列強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因之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不可避免矛盾衝突相互競爭，會削弱他們在華的地位，客觀上有利於中國革命。同時又使中國革命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各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看風使舵，甚至暫時和一國「妥協」以反對或排除別個帝國主義列強。

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際環境的特點，這一特點不僅使中國革命與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它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也有顯著的不同。一六四八年的英國革命是正當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一七八九年的法國民主革命及一八四八年的德國民主革命，又正處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旺盛的時代，處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逐漸統治世界的時代。（一八四八年）當時各國革命之間雖然有相互影響（如法國革命對德國革命的影響），然而當時各個國家的革命比較孤獨地進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處在帝國主義時代的開始，處在資本主義向下衰落的開始，在這一點它與一六四八年的英國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及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不同。但是當時帝國主義時代，僅僅在開始，帝國主義世界第一次大戰尚未爆發，資本主義總危機尚未形成。因此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正如列寧所指示的，還是比較孤獨的進行，沒有立刻將別的國家牽入革命的漩渦，它還沒有成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潮流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列寧才認爲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既是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直接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當時剛開始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總流中的一部分）。可是中國革命則不然，它一開始即被牽入世界革命並且自帝國主義大戰爆發，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它即成爲世界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世界革命史上極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無疑義的有異常重要的影響。

關於中國民主革命這一基本特點，共產國際遠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經指出了。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共產國際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上有說：

「中國國民革命發展於很特殊的環境，故其現狀較之十九世紀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一九〇五年

的俄國革命都不相同……；另一個特點，表示中國革命異於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即中國革命發展於世界革命的時期，而為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運動中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一要因是決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及參加革命之社會力量之結合的」。

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名著中也有說：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却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然而在革命的陣綫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至若現在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上許多的現象——特別是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它向共產主義前途邁進，世界革命進一步的發展，資本主義總危機更加劇烈化，使中國革命比諸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及中國革命以前的階段，也更加大不相同了。無疑義的，中國革命這一嶄新的國際環境，會給予它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這一點還是親自歷過中國革命最近幾年來的歷史行徑的人們，沒有不切身深刻感覺到的。

(二) 然而，中國革命的特點。不僅限於它的國際環境；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更重要的表現在它的國內政治經濟的環境，它的民族特點，它的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祇有清楚的認識中國革命這一點，才能全面的評價中國民主革命，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生長在發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關於殖民地部分因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才形成的，因此論及中國民主革命生長發展均只提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說及殖民地一部分）。這一社會特殊的環境，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有決定的影響。因為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列強統制之下的半殖民地，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被壓迫民族國家的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成爲這一民主革命的嚴重任務。同時，這一革命如果要得到成功，那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統治，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列強出中國去。正是因爲如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生長和發展，不能不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此，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之一。關於這一特點，世界革命領袖者之一——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黨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報告中會有說：

「反對派（即當時的托洛斯基派）忘記了下面一件事，即中國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中國是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革命不是單純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反帝國主義的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把中國的工業以及運輸上的重要機關都吞吃乾淨，受帝國主義重壓的不僅是勞苦群眾，就是資產階級某些階層也是同樣受帝國主義重壓的。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某些條件之下，或者在某種革命階段的一定時期，是會擁護中國革命的。中國的特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就在這裡」。

另外，一九二八年二月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決議上更明確的指出：「中國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對於中國革命這一特性的認識及把握，是非常必要的。托洛斯基派在第一次

大革命時代的主要錯誤，就是不了解或者是不願意了解中國革命這一特性，機械的把中國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壓迫民族的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混淆起來。結果得出在戰略策略上完全錯誤的結論。馬克思列寧主義鄭重地估計了中國革命這一特點，並從這一基礎出發，承認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有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的可能。同時共產黨可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在一定的階段上（即民族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和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主要的條件是保證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運動要在最原始的形式上也是如此）可以而且應該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實行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實行全民族的抗戰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又當他這種革命性消除的時候，又被迫地與之分裂。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壓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與……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中國革命這一基本特性，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已經十分明顯的表現出來。誰不承認或不了解這一特性，就無法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的特殊規律性，誰也就無法領導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是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兩大潮流的匯合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懂表現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以及它對於中國民族的壓迫，而且還表現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和封建殘餘是中國農村中主要的壓迫形式。因此，中國革命的任務，不僅要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的獨立，而且還要反對封建勢力，實行農民土地革命，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族的社會的解放。因此，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整個發展過程來說，農民問題，不能不是中國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農民土地革命不能不是中國民主革命往前發展的進一步的階段上的中心內容。如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中的第一階段上，

主要的是集中革命鋒芒，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到了第二個階段，革命向前發展農民土地革命成爲現階段的主要社會經濟內容。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的報告曾有下列一段極關重要的天才論斷：

「托洛斯基的根本錯誤，就是在於他不懂得中國革命底意義與性質，共產國際是根據封建殘餘爲現時引起農村革命的主要反動勢力這一點出發的，共產國際立場的出發點是中國農村中封建殘餘及其於這種殘餘的全部上層建築物，若將軍若省長若張作霖這類軍閥等——都是產生且擴大現在中國土地革命的基礎。若是在許多省區內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要繳納給地主和劣紳；若是在地主（武裝的或沒有武裝的）手裡不但剝奪有經濟權，而且有行政權和審判權；若是在許多省區內現在還保存着中世紀買賣婦女和小孩子的風俗——若是這樣，那不能不承認現在中國農村中基本的壓迫形式就是封建殘餘，唯其是封建殘餘及其全部封建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物是中國的基本壓迫形式，所以現在發展着偉大的土地革命。什麼叫土地革命呢？土地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底基礎和內容」（論「反對派」二八二——二八三頁）。

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而且是反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換句話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反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底兩大潮流的匯合。斯大林同志在講了上述的農民土地革命以後接着又說：

「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反對封建殘餘，同時也就是反對封建帝國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及其所以有財政和軍事力量在中國，就是擁護和推動那些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及至上層建築物，使它歐化，又使它保守的力量。所以要消滅中國封建殘餘，那非同時在中國與帝國主

義作革命鬭爭不可。因此，誰要消滅中國封建殘餘，也就應當起來反對在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集團。所以不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鬭爭是不能澈底打倒和消滅中國封建殘餘的。唯其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時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

「這樣就可以看出中國現在的革命是匯合革命運動兩大巨流而成的。反對封建殘餘的革命運動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是反對封建殘餘與反帝國主義兩個鬭爭的匯合。這就是共產國際（也就是聯共中央）對中國革命問題全部路線的出發點。」（同上）

根據上述的分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些特點，不僅使它與一六四八年的英國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及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有顯著的區別，而且與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也有重要的不同。俄國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何在呢？它與中國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何區別呢？關於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特點，列寧曾在它的著作中有詳盡的敘述，並且這是多數派與少數派爭論的根本問題之一。少數派的錯誤，就是在於不了解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民族特性，而機械的把它與歐美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量齊觀，相提而論。結果，得出少數派機會主義的政治戰略方針的結論。列寧的多數派的意見，就是認為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民族特性，是資產階級的農民主地革命，因為這一革命是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及農奴制度的，而農奴制度的根源，農奴制的經濟基礎，就是地主統治農民，地主經濟束縛農村。只有剷除這種根源，才能澈底消滅沙皇制度，因此消滅農村中地主式的壓迫，或者換言之用革命的手段去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成爲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基本內容和民族特性。

同時，這一革命又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獲得勝利，而這一勝利將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推

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階段上去。例如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中有下列精彩的說明：

「在整個社會經濟帶着社會主義性質時，一切反對中世紀制度的農民革命，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不是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都是農民革命。例如在某一個國家裡，農民完全是照着資本主義方法來經營的，農業資本家在僱傭勞動者幫助之下，已經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說已經消滅了土地私有制。那麼這個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完全不是農民革命，例如在某一個國度裡土地制度已經與資本主義經濟交叉混合。不推倒資本主義已經不能推倒這個制度，例如這裡發生一次革命把專制政權推翻了，而使工業資產階級得着政權，那末這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絕不是農民革命，換句話說，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的國度是可能的，在這些國度裡而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可能的，在農民數目字很多的國度裡，可以產生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假若這種革命沒有涉及農民的關係革命化，沒有使農民變成創造革命的積極的社會力量之一，則這種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農民革命……普列漢諾夫及其隨從的孟塞維克，在俄國革命的第一個時代（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中的一切策略路線的錯誤的主要根源，就是他們完全沒有懂得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間相互的關係。孟塞維克的書報往往大喊大叫，說多數派不懂得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性，這是他們自己未加思索而想藉此蒙蔽罷了。其實在革命前及革命時，關於革命的資產階級性問題，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員脫離過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祇有黨派分歧的庸人俗子——「間陋家」才可以說出相反的東西。但是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恰巧就是右派（即少數派），向來就是持着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普遍抽象依樣葫蘆的觀念，而不能了解到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革命這種特質」（參照列寧選集第五卷中文版二七七—



在另外一個地方，列寧又說：「土地問題成爲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並決定這個革命的民族特點」(參照列寧全集十一卷四九二頁——第三版)。

這就是俄國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點，如果把這一革命的特點，作一比較研究，那很明顯的這兩種革命雖然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却有很重要的區別。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民族特點，是爲民土地革命，而中國現階段的革命的民族特點則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及反對封建勢力殘餘的土地革命，這兩個任務的相互結合，而且它的最大特性是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

中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澈底的勝利而這一勝利必然會使中國民主革命生長轉變到社會主義階級上去。

(三) 這樣我們檢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際環境及它的民族特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在上述許多特點上不懂和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甚至於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內容有重要的區別。但是我們如果更進一步來分析到中國革命底階級力量對比，那這種區別就更明顯，這是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點，不僅表現在它的新的國際環境，它的民族特點，而且表現在它國內的階級相互關係，這一問題主要是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相關係上表現出來。中國

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無法獨立與順暢的發展它的民族工業，相反它的民族工業只有日益趨於破產崩潰，因此，爲了發展民族工業，爲了增高它的政治勢力，爲了建立適應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民族統一的國家，因此它在某種具體的歷史條件之下，有參加反帝國主義甚至反

對封建勢力的可能和必要，如第一次大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了的，並且會組成爲當時革命動力之一，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性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進步性不能過分的估計，相反的我們還應着重的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特點，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異常貧弱（由於帝國主義的壓制及封建軍閥的摧殘），同時具有買辦性及半封建殘餘的性質。因此，使它又具有不徹底性妥協性的特點；另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不僅產生於帝國主義工廠企業，而且產生於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工廠企業，同時也受着三種剝削與壓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民族資本主義——使它帶着高度的革命鬪爭性頑強性。此外，中國無產階級運動一開始便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走向正確的軌道，所以使「中國無產階級較之本國資產階級比其他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較之本國資產階級是要強有力些」。（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六次大會「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決議」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够在中國民主革命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國革命上述的特點——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兩大潮流匯合——也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運動發展開始深入到土地革命時，它必然會由動搖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事實上自第一次大革命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以後，中國民主革命的動力，只有工人農民；領導者是無產階級。中國十年來的蘇維埃運動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一九三七年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對華侵略，由於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矛盾的尖銳化，由於共產黨及全國人民的推動，民族資產階級又重新參加到中國革命戰綫上來，然而它同時又表現出動搖妥協的傾向，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就不勝利，如果要徹底勝利，就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才有可能。同時，中國民主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徹底的勝利，又將不能不開闢中國革命

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換句話說將必然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去，這是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特點，這一特點與上述的特點有機的聯系着。

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上關於中國革命這一特點，曾經這樣的說：「中國革命的動力，已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而且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又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就建立起來。（無產階級能夠幫助及指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領導土地革命鬥爭）所以就可以開闢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亦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途，世界資本主義現在正在恐慌時代，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有了十年，它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威力是在增長，這就足以幫助中國無產階級去力爭革命底社會主義的前途並保證勝利的可能」。

中國民主革命這一特點，是過去十九世紀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沒有的，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動力只有工人與農民，領導者是無產階級。因此列寧曾在「兩個策略」及其他著作中指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然而這一轉變在當時僅僅是可能的前途，還要有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可是中國民主革命要不勝利，如勝利（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則必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去。

（四）這一特點也是由中國社會的特殊環境決定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勾結而統治中國。因此中國在政治上是不統一的，不獨立的，不民主的，而且中國在政治上是最野蠻的最黑暗的國家之一，帝國主義爲了維持他在中國的統治，一方面直接調動大批的武裝到牙齒的軍隊——海陸空軍到中國來，駐紮在各大城市各交通要道，準備時刻出動

武裝鬥爭是中國  
革命的主要鬥爭  
形式——是中國  
革命基本特點之  
一。

，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它又幫助中國的軍閥供給以大批的武器，來武裝軍隊，隨時指使中國軍閥以武裝力量來鎮壓中國革命。所以中國革命尖銳的要求它的每進一步的發展，都不能不與中國軍閥的武裝發生衝突，最後中國革命必須與帝國主義進行民族革命戰爭，才能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强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此外，由於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而產生的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中國大地博城市與鄉村特殊的關係，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與農村中大多數人口——農民相結合等等，所有這些都決定了武裝鬪爭的形式是中國革命鬪爭主要形式。世界革命領導者——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北伐時期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特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毛澤東同志也說過：「中國革命鬪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鬪爭，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鬪爭的歷史」。過去中國革命的全部的發展的歷史，顯明地證明了中國革命，這一基本特點（關於這一問題下面還要說到的）。

以上所說的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基本特點的全部內容。如果概括的用幾句話來說，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新的國際環境之下生長和發展起來的，它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的兩大潮流的滙合，尤其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是它的最大特性。它是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澈底的勝利；而民主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澈底的勝利，就必然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上去。最後，武裝鬪爭是中國革命鬪爭的主要形式，武裝鬪爭對於中國革命有決定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遠在一九二七年起黨的給聯邦共產黨底宣傳員用中國革命問題的提綱中論及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發展的特點時，曾說了下列的一段話。這一段話，可以作為對中國資產階級性質及其基本特點概括地天才的敘述。這一段話是：

「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主要事實是：（一）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及帝國主義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統治。（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制度而加深。（三）無數萬萬工農群眾反對封建官僚的壓迫，反對建制度反對帝國主義鬥爭日益增長。（四）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薄弱，它對帝國主義的依賴，它畏懼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革命積極性及其在廣大勞苦群眾中間的威信日益增長。（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相鄰近。」

「因此中國事件有兩條發展的道路，或者民族資產階級打敗無產階級，而與帝國主義聯合共同反對革命，撲滅革命，建設資本主義的統治；或者無產階級拋棄民族資產階級，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統率城市及鄉村中無數百萬勞苦群眾以戰勝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達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然後將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去，以獲得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結果，二者必取其一。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它的經驗可以由中國無產階級去順利的利用）的存在，使中國革命可以更容易地實現第二個道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一般地是以統一戰線進攻中國革命。現在帝國主義之間並沒有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那種削弱帝國主義勢力的破裂和戰爭，這些事實都告訴我們，中國革命在勝利的道路上，要比俄國遇到更大的困難。在這一革命的過程中，要比蘇聯在國內戰爭時還要遇到更多的逃亡和叛變者。因此，兩條發展的道路互相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正是因為如此，共產黨員的任務是要為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勝利而鬥爭」。（論反對派，二五三——二五四頁）

這一段生動的描寫，不僅表現了這位世界革命的牽領者如何天才的把握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內外環境及其諸特點，而且以他的天才的深刻的歷史遠見，指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昭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及全國人民的奮鬥道路。無疑的中國革命全部的行程將給與這一天才遠見最有力的證

明。

在上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點的認識問題上，馬克斯列寧主義者曾經和各種不正確的觀點作過許多的鬭爭。例如，在中國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時代托洛斯基派及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代表着兩種對這一問題的錯誤觀點。托洛斯基派的全盤政治錯誤的根源，便是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上述特點不了解，他們「主要的錯誤便是把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與在各帝國主義壓迫下非起來鬭爭不可的被壓迫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同一的看待」（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聯共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上的報告）。他們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異於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民族特性——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因此他們把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妥協的資產階級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等量齊觀，否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某一發展的階段上有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可能。因此，反對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的國共兩黨合作底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主張武漢政府還起革命的作用的時期，建立蘇維埃政權，不理解先鋒隊與後備軍關係問題。陳獨秀主義者（陳獨秀彭述之等）代表着另外一種也是極端有害的錯誤觀點，這種觀點，主要的特點就是在於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底民族革命，而且是反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兩大潮流的蘊合，並基於這一特點而產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薄弱，它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依賴，它畏懼革命運動，特別是農民土地革命的發展，及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積極性，和它在廣大勞苦群眾中間的威信日益增長。不了解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於它的國內外環境，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徹底的完成，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勝利將必然地轉變

爲社會主義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主要鬭爭形式是武裝鬭爭。正因爲如此，所以陳獨秀主義者，在第一次大革命時代只看見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性革命性，而忽視了或根本宰割了它的徹底性妥協性，對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和領導作用估計不足。因此把國民革命與階級鬭爭對立起來，把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對立起來，在民族革命口實之下反對階級鬭爭，反對土地革命，放棄武裝民衆，爭取軍隊的工作，形成了整個的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的路線。不論托洛斯基派也好，陳獨秀主義者也好，他們兩者都同樣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點和它的規律性，雖然他們兩者一個從「左」的方面；另一個從「右」的方面來歪曲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質。然而，結果同樣葬送了第一次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所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是也。

#### 第四節 論中國革命中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關係

#### 及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持久性以及武裝鬭

#### 爭形式爲中國革命主要形式問題

上面我們詳盡的概括的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闡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他各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區別，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根本的特點，是每一個中國革命家所必須首先認識及掌握的，但是這僅僅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爭點內一部分，雖然它是它的最主要的一部分，中國革命尚有它的不容忽視的其它特點，這些特點在中

國革命過程中曾有過及有着不少的作用。也是爲每一個中國革命家所必須認識的。現在分別的來把這些特點加以說明，最後關於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問題，在上面論及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時會有簡單的提及，現在這裡再把這一問題補充的作一些必要的說明。

中國革命與土地革命的相互關係。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重要特點之一，是它的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者之相互關係帶着異常複雜的性質，對於這一特點，正確的認識是異常必要的，過去第一次大革命時代的陳獨秀主義者錯誤之一，便是對於這一問題缺乏一種辯證的了解，機械的把兩者互相對立起來分割起來。

對於這一問題正確的認識應該把握下面的幾點：

(甲) 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個東西是不同的，不能夠把這兩者混淆起來，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區別，可以在它們兩者的對象任務和動力以及其他方面表現出來。例如在對象方面來說，民族革命是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是反對封建勢力。在任務方面來說，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在於打倒帝國主義者，沒收帝國主義者在華的一切財產，驅逐他們出中國去，使中國全體人民得到民族的解放；而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務，却在於打倒封建勢力，推翻軍閥官僚的統治，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分給廣大的貧農中農，使中國人民獲得社會的解放，在動力方面來說，民族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民族壓迫，因此不僅工人農民及廣大知識青年能夠積極參加，並且民族資產階級在某種具體條件之下也有可能加入這一革命陣綫，在今天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條件之下，甚至還有部分地主階層有參加抗日的可能；而土地革命則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才能參加，因此，民族革命的動力一般的根據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是要比土地革命的動力更爲廣泛些。此外在鬥爭方式上政權組織形式上，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都不



相同，如民族革命要求我們採取民族革命統一戰綫民族革命戰爭的鬥爭方式戰略方針，要求我們在政權組織形式上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制度作為奮鬥的目標，而土地革命則要求我們採取工人與農民革命聯盟的政策，國內革命戰爭的鬥爭形式，在政權組織形式上要求我們採取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制度。如過去十年來蘇維埃土地革命時期，與今天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及抗戰時期，不論鬥爭的對象任務、動力、鬥爭方式和組織形式都是不同的。如果把這兩者混淆起來將會得出嚴重的機會主義結論。

(乙) 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個東西雖然是不同的，然而是一統一的，不能夠把這兩者機械的對立起來分割起來。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之所以是統一的，是因爲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這兩個對象，雖然是不同的東西，然而它又是統一的結合着而統治宰割中國的民眾，正是因爲如此，所以民族革命徹底完成它徹底打倒帝國主義解放中華民族的任務，就不懂要反對帝國主義而且還要反對封建勢力，因爲封建勢力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支柱社會屏障。只有消滅封建勢力，才能保障民族革命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去。另一方面，土地革命要徹底完成它消滅封建勢力，推翻軍閥官僚的統治，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一定要反對帝國主義，因爲帝國主義是封建勢力的支持者、保護者，它必然會幫助封建勢力，鎮壓土地革命（如過去十年來蘇維埃運動是最好的例證）。只有徹底的打倒帝國主義的統治，土地革命才有最後的保障。所以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分離密切的聯系着的兩個任務，這兩個任務如果孤立的毫無聯系的來進行，則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單獨的完成。所以這兩個統一任務，不能把它們相互對立起來分割起來。

(丙) 然而不僅如此，我們還要進一步了解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者中間在某種具體情況之下有一個主導的東西。換句話說，我們說明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是兩個不可分離的統一的任務，然而這

不是說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之下，我們對於這兩者的任務都應該同時並進的，等量齊觀地進行，相反的這兩者中間，有一主導的東西。我們必須善於抓住這主導的一環，來推動其他方面任務澈底的解決，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者何者是主導的東西呢？這不能籠統的回答，是要由當時當地具體的國內環境和條件決定的。領導中國革命的先進黨應該表示他有這樣的能力，在具體的情況之下，決定那一個是主導的東西，並集中其全力去抓緊這一環去澈底的解決。

例如在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上，即從五卅運動起到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暴動止，當時的國內外的環境是把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推到了第一位。回爲當時各個帝國主義列強採取統一戰綫的方式來共同進攻中國生長着的大革命，特別是英日帝國主義。五卅運動就是在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怒潮中生長着發展起來的。由於日本紗廠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及屠殺，引起上海工廠工人大罷工，再加上英帝國主義的屠殺，於是乎造成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五卅運動開始了第一次大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當時革命的主要鋒芒是反對民族的敵人——帝國主義。正是因爲這一點，所以共產國際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應採取國共合作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戰略方針，去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軍閥，同時積極領導廣大的人民特別是農民，把他們團結組織在共產黨的周圍，換句話說民族革命成爲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下面主導的一環。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政策及其活動應該適應着這一形勢的特點，積極參加和領導擴大這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共產國際也預先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和農村革命（即土地革命）合而爲一，則廣東國民政府將來不能保持政權，革命將來不能進展到推翻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鄉村階級分化的增長，加緊了農民羣衆與剝削階級之間的鬭爭，共產黨必須十分注意鄉村的階級分化及從此而起的劇烈鬭爭。共產黨

應當成爲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並提出相當的政治經濟口號，以助農民的運動發展。（參照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議決議）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暴動的成功，武漢政府統治下兩湖農民運動的發展，幾千萬農民群眾參加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來，把大革命推到第二個發展的階段——土地革命佔主導地位的階段。這一階段是民族革命的新階段是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合流而以土地革命爲主流的階段。共產國際一九二七年五月關於這一階段的特點曾說：「農民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及國有土地包括在內）這是革命中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的內容」，使千百萬農民從下面以「平農式」的，直接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共產黨站在前線指導這一運動最爲重要。同時共產黨必須要在政府內努力使政府促進土地革命之爆發擴大，只有這樣方能使政府在日益發展的階段中成爲實際上工農革命的組織政治中心，成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權獨裁的機關」（中國問題指南上冊三二頁）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在大革命失敗以後，仍然成爲中國革命的中心與主要的潮流。十年來的蘇維埃運動，基本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以土地革命爲中心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階段。因爲當時如果要繼續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以及反對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只有以土地革命來發動千百萬農民群眾，組織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武裝力量——紅軍，進行國內革命戰爭，才能造成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前提和基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的侵略，變中國爲它的獨佔殖民地，把民族矛盾推到第一位。因此引起國內階級力量的變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部分地主也加入抗日民族革命運動，民族革命又提高到第一位，成爲主導的要素。因此，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即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號召國民黨和各黨各派各界各軍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當前主要的民族敵人，並且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給國民黨

三中全會的通電上，公開的提出並申明「停止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主張，就是根據這一新形勢而提出的新的戰略方針。

因此，根據以上的分析，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個東西雖然是統一的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系着的，然而這兩者之中有一個主要的方面。革命的政黨的任務，要善於分析政治形勢。決定那一個主要方面，集中全力加以解決，才能保證其他方面及整個革命任務的完成。

(丁)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不僅是統一的，有時有主導方面的；而且兩者是互相貫通互相滲透的東西，這是說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能僅僅了解為兩者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及兩者之間某一個時期中，有一個主要的方面；而且應該了解在他的發展過程中，是互相貫通互相滲透的。例如大革命第一個階段，民族革命佔了主要的地位。但它是否完成了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任務呢？沒有，它只是給了中國革命第一次的推動力，教育了群眾，組織了群眾，並造成未來第二階段的基礎及前提。大革命失敗以後的蘇維埃土地革命是否推翻了帝國主義消滅了封建勢力呢？也沒有，它只是吸收了更多的群眾參加到革命中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它更進一步地教育了組織了群眾，提高了群眾覺悟程度，創造了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及工農紅軍的武裝力量，形成了今天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強有力的基礎，它們在發展中間是互相貫通互相滲透着，前者到了一定階段結束自己的運動，寫後者造成基礎，並把這件專業移交於將來下一個階段。關於這一點，世界革命的率領者——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大革命的第二个階段已經開始時，曾經作了下列一段天才的說明：

「如果第一個階段的特點在於革命的鋒芒主要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階段的特點却是這麼的一個事實：就是革命用自己的鋒芒主要的去反對國內敵人，首先是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制度。

第一個階段是否解決了推翻帝國主義這個任務呢？沒有，沒有解決，他把這個任務移交於中國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去實行，它對於革命群眾只給了第一次的推動力，推動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以便結束自己的運動，並把這件事業移交於將來。應當設想，就是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不能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者出中國去的任務。它對於中國工農廣大群眾給予更進一步的推動力，推動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但是若進行這件偉大事業的是要把這件事業的完成，移交於中國革命以下的一個階段，移交於蘇維埃的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難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們的革命歷史上雖然在另一環境裡在另些條件之下，也發生過類似的事實嗎？難道人家不知道，我們革命的第一階段沒有完全解決自己的土地革命的任務，而且把這個任務移交於革命底下一個階段，移交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就完全全地解決了剷除封建殘餘的任務。因此，如果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不能完全全地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二階段推動千百萬農民群眾，喚起他們去反對封建殘餘，而終於把這件事業的完成或移交於革命的下一階段，移交於蘇維埃的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對於將來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只有好處」（參照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聯共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這就是世界牽領者對於中國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相互貫通互相滲透的辯證法發展過程最好的說明。

中國革命的  
不平衡。

中國革命另外一個特點是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在地域上的發展不平衡，如過去南方與北方不同，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同，北方某一個地區與另外一個地區之間的不同，南方某一地區與另外一個地區的不同，及工農運動之間的不平衡等等。中國革命這一發展的特點，已經被

過去中國革命的全部發展行程證實了的。這一特點的產生，一點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必然的結果，為什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會產生中國革命這一發展的特點呢？關於這個問題，共產國際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給中共的指示信中有下列的說明：

「國內各地革命的不平衡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割據的狀態，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於中國各地的勢力和政權，是因為中國各省各部分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參照中國問題指南上冊一二五——一二六頁）

如果更詳細一點說，就是因為：

（甲）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之一，它不是由某一帝國主義強佔獨佔，而由各個帝國主義列強如英美日法等以勢力範圍的瓜分的方法來統治中國，把中國分成爲幾個部分，即一定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經濟上政治上都有相當的獨立性，同時有些地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有的大的小的，（如在大的城市中帝國主義的勢力比較大，在小的城市中尤其是農村中則比較小）這些條件無疑的會影響到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

（乙）帝國主義統治中國是與封建勢力密切地結合着。這是說帝國主義各在他統治的勢力範圍內，培植扶持封建軍閥來作爲他統治中國的代理人。由於這種軍閥制度的割據和統治的結果，使中國在經濟生活上不能形成統一的經濟生活財政制度，在政治上不統一不民主。因此，中國各個地區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同時，由於軍閥的割據，形成了有的地區軍閥統治的較強，有的地區則較弱，所以這些條件不能不影響到革命發展的不平衡。

（丙）在中國內部各個不同的地區中，階級的組成與力量對比關係不能整齊一致。同時革命政黨

的領導力量，工農群眾鬪爭的經驗及決心，革命傳統的影響等也是有着各種不同的水平。這對革命發展的速度及深度，也不能不給予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一) 因此根據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認識到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客觀經濟政治的條件預定的必然結果。雖然依靠先進政黨的領導及廣大群眾的努力，至少可以減少這不平衡的現象，並且使它從不平衡走上平衡，可是根據過去與現在的革命經驗，這種不平衡現象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是不可避免的。

(二) 關於中國革命這一特點，在中國革命過去歷史上，差不多從它的開始發展一直到它的每一個時期中，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的。例如我們從第一次中國大革命說起，便可看到這一特點。一九二五年夏天，偉大的上海五十萬工人大罷工。造成了轟動全國的五卅運動，給整個革命運動以巨大的影響。然而就是在這一時期，上海的工人總罷工也沒有得到其他工業中心城市更有力的援助。至若農民方面，更沒得到農民任何的回聲。一九二七年夏天群眾運動發展到了高峰，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三次暴動時，其它區域的工人又還沒有成熟到舉行這種最高鬪爭形式的鬪爭，而大多數的農民却剛剛才從政治的酣睡中覺醒過來。最後，一九二六年夏天湖南的農民已經發展到了奪取土地分配土地的土地革命階段的形式，而同它附近各省的農民則甚至還沒有堅決提出減租的口号；另一片鄂北城市的工人運動已經受到嚴重的鎮壓。

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不平衡的特點，仍然是存在着。如一九二八年革命運動的特徵，是農民運動比較發展，而工人運動則相當消沉。因為工人階級單獨踏上政治鬪爭的舞台，沒有得到農民方面及時的幫助，孤軍地作了許多的鬪爭。因此工人不能忍受着反革命的許多嚴重打擊，反動勢力用空前

的白色恐怖鎮壓了工人運動；另一方面，中國城市與鄉村的關係的特點，帝國主義在城市中的勢力比較大，在農村中勢力比較小，農民運動在無產階級政黨正確領導之下，可以利用一切可能來發展。因此，這一時期中表現着工人浪潮與農民浪潮之間發展的不平衡。

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重新高漲起來了。可是這一次革命新高潮最重要特點之一，也正是革命底發展的平衡。當時「中國南部的許多區域是蘇維埃區域，紅軍正在生長，游擊戰爭正在發展，農民反對地主的戰爭正在擴大，別方面其他地方的農民都只是剛剛開始加入鬪爭，甚至於在廣東的南方，那地方是前次革命過程所開闢過的地區，革命也開展得很慢。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已在進行着農民戰爭，而浙江、四川、安徽、江蘇農民鬪爭則剛剛開始，甚至於雲南、貴州農民戰爭都還沒有開展，中國北部和滿洲，我們對於農民的影響非常之薄弱等等。另外一方面，工人運動的高漲一般地講起來甚至於決定勝負的工業中心城市（長江流域的武漢上海更用不着說廣州香港大連），比農民運動還要落後。事實的本身指出來，革命運動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區域得到勝利；而在其他地方，在國內決定勝負的部分却極端的反革命以致於屠殺的反革命者拿着政權）以上參照共產國際一九三〇年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指示信）。

中國革命這一特點，在中國革命往後發展的階段上仍然是存在着，就是在蘇維埃運動大大發展的那幾個年頭（一九三一年以後九年內），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地區，廣大的工農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推翻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蘇維埃制度與工農民主專政，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給廣大的貧農，農民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區域中則相反地廣行着空前的白色恐怖，來鎮壓革命鬪爭，屠殺廣大革命群眾，工人農民仍然過着牛



馬般的生活。中國政治生活上長期內國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這兩個制度兩個政權尖銳的對立和殘酷的鬥爭，清楚地說明了當時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一特點。一九三七年全中國對日寇的民族抗戰發動以後，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還是存在着不平衡的特點。例如敵後方各個抗日根據地，一般地說來是最進步，在那裡已經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府，實行了各種民主權利，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了初步改善，民衆組織和武裝有了相當的進步；然而另外一部地區（如大後方及一部分戰區）則遠落在敵後方的後面，在那裡頑固保守的黑暗勢力還存在統治着。

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過程，清楚地顯示了中國革命這一特點。

（三）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是中國革命特點之一，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中國革命的弱點和困難之一。因爲在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之下，革命成熟的程度不一致，戰鬥力也不一致。因此，使革命對反革命的進攻不能採取全國一致行動的步驟，城市與農村、城市與城市、先鋒隊與後備軍，不能作更有力的配合，使革命不能具有更廣泛的範圍及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使反革命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來鎮壓革命，消滅革命。因此列寧總結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原因和教訓時曾指出過，工農革命發展不平衡是革命失敗原因之一。他說「農民行動過於散漫無組織和沒有充分採用攻勢，革命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在此。」（列寧全集十九卷三五四頁），因爲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工人與農民運動之間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時，工人運動高漲；而農民運動尚未開始。到了一九〇六年農民運動大大高漲起來了；而這時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却已被反革命力量嚴重的打擊而削弱了。中國革命這一特點表現得更明顯，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之一，便是中國革命這種不平衡的特點（參照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案）。因爲

革命發展不平衡（地域上及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之間的不平衡），減弱了革命的力量，並使帝國主義及軍閥易于鎮壓革命運動。因此，革命發展不平衡無疑義的增加了中國革命的困難，並且這也是造成中國革命與反革命鬭爭比較長期性底因素之一，誰不承認及了解這一特點，誰就無法了解及無能指導中國革命。

但是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這一特點，不僅是中國革命困難與弱點之一，然而同時這一特點在某種意義上在一定的發展的階段上，對於中國革命也不能不承認它的確有相當的好處。怎樣講呢？這是因為在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之下，革命形勢可能而且難免首先在革命條件最具備的地方（這些條件，如統治階級崩潰破產的程度和速度特別劇烈，被統治階級的革命的決心勇氣和力量特別的雄厚共產黨的力量強大等等）成熟起來，而革命政黨就可以在那些革命形勢成熟的地區奪取政權，建立起革命軍隊及政權，建立起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並且利用這一環境及條件底最大可能性，去團聚和組織訓練革命的力量，特別是革命的武裝力量，去爭取和實現革命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推廣到爭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同時這種環境使革命得到更大的可能，去避免與強大的敵人底力量，發生過早的沒有準備的對於革命不利的武裝衝突。大家還記得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六次全國大會，就根據中國革命這一特點的分析，發揮了這一極重要的天才遠見。例如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上寫着：「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的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勝利，目前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實現，然而這種前途是可能的。」（參照中國問題指南下冊）因此中共在六次大會以後，便爲這一方針而奮鬥，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新高潮到來下面，共產國際在他對中國共產黨屢次的指示信中，強調的指出在革命危機成熟的某些地區省

份建立革命的根據地，以便逐漸實現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共產國際這一天才的指示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全黨擁護和努力實現，十年的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基本已經實現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天才遠見。中國蘇維埃曾經在數省的領土內（湘鄂贛各省）取得首先的勝利，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及革命政權——蘇維埃及革命的軍隊——紅軍，雖然由於革命發展的許多特點，蘇維埃在當時沒有能在這些省區奪得任何一個省城，可是中國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這一天才遠見已經實現過了，這是無庸爭辯的事實。

中國革命這一特點在俄國以及其他的國家中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國以及其他各國（如英美法比德等）沒有具備中國這種特殊的條件，他們的國家是統一的獨立的，沒有像我們中國那樣的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劃分與封建軍閥的割據，他們的經濟政治的發展比較平衡（雖然不平衡的弱點仍然存在然而沒有像中國那樣的平衡的特色），交通方便……等，因此，他們在革命過程中沒有也不可能提出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問題，（例如俄國德國因為革命如果在一省幾省勝利就非推翻中央政權的勢力不可，不然這一省幾省的勝利就無法維持下去，）俄國革命就是首先在大城市——莫斯科彼得堡——首先勝利，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然後，才逐漸以這勝利為基礎逐漸征服全國，它在很短的期間內，取得全國的勝利，中間至多只有幾個月的間隔。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則不同，中國可能而且應該在一省或幾省的地區爭取實現革命的首先勝利，然而根據這一革命根據地逐漸團聚組織訓練自己革命的力量，取得全國的勝利。因此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方向是從比較落後的鄉村逐漸向城市推移，因為中國有廣大的鄉村，在這鄉村帶着相對獨立性，共產黨可以在某些革命形勢成熟的省份地區農村中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動的廣大的農民群眾深入土地革命，並利用軍閥地主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和衝突，

來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建立、鞏固和擴大大革命根據地。中國過去南方各省建立的蘇維埃革命的根據地，絕大多數的地區都是在各省交界之間，例如湘鄂贛、鄂豫皖、閩浙贛等，因為這些地區軍閥勢力的統治比較薄弱。同時，又可以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和衝突，來發展自己的力量。而俄國革命中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則首先在大城市，然後從城市擴展到鄉村與中國革命不同，就是這個緣故。

(四)關於對於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底認識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曾經與各種各色的不正確傾向作過鬥爭，例如一九三〇年革命新高漲時期中國共產黨內以李立三爲代表形成的反馬列主義的盲動主義半托洛斯基主義路線，其錯誤實質之一便是不了解中國革命這一特點，否認中國革命這一特點和困難，而且還躲在「左」的詞句之下來實際的否認全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漲已經存在的事實；且從這裡得出祇有爭取全國範圍的革命勝利的任務，沒有爭取和鞏固一省幾省革命首先勝利的任務底策略結論，誰要主張並提出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觀點，那末在李立三看來就是極端嚴重的右傾錯誤、和平割據、保守觀念。李立三實際上是把爭取全國的勝利與爭取鞏固一省幾省革命首先勝利的問題分割和對立起來，不了解既得勝利的一省幾省區域的革命根據地，正是全國勝利的基點與支柱，正以爭取和實現全國範圍內革命最重要的步驟和手段之一。因此他不能不得出「或者全國暴動全國勝利；或者一處也不暴動，一處也不勝利」的左裝右褪的結論。所以，李立三不了解甚至否認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及其真實的意義，因此只能得出損害革命的反馬列主義的盲動主義半托洛斯基主義的政治路線。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四中全會以後又曾經反對了對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另外一種錯誤的瞭解，這種錯誤的瞭解的實質，是在以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口實下面否認北方的某些地區有創造革命根據

地的可能。這些人認爲北方革命運動落後於南方，因此在南方可以創造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在北方則不可能。這些人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革命發展雖然不平衡，然而革命危機在全國範圍內却日益成熟着，在北方的某些地區同樣的具備着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只要我們的同志能够正確的領導，艱苦的鬥爭，團結廣大的群眾在我們黨的周圍，那這一種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創造，不僅是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方面，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一現象不僅根據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政治的特點，而且還根據於我們主觀革命的力量的大小，黨的影響，革命傳統影響的強弱，這就是說：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是有它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我們不是主觀主義者，以爲我們可以依靠主觀上的願望及努力，一下子改變這種弱點，克服這種困難；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是客觀主義者，只限於承認中國革命這一弱點和困難，甚至於屈服這一困難面前，而應該用我們主觀的力量經過政黨的正確的領導及廣大群眾的努力，去影響客觀形式的發展，使革命運動從不平衡走上平衡，從低級的形式走上高級的形式，走上革命根據地的創造。因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僅限於解釋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在於改造世界，一九三四年以後，陝甘寧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創造以及今天敵後方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成立、鞏固、發展，完全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上述的論點底天才與正確性。

(五) 關於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主要鬥爭形式底補充說明。

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主要的鬥爭形式，這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之一。這一原理上面既有提及，這一原理說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由於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強大，由於他們在中國各大城市與中心地點强有力的統治，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產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因此中國革命由於中國地大物博及中國城市與鄉村特殊關係，可以首先在一個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

，組織革命的軍隊，而這一地區多半是比較落後的農村。革命政黨依靠這一比較落後的農村，依靠與廣大農民的結合，建立革命軍隊，建立和鞏固發展革命的根據地，依靠農村與盤踞中心城市的反革命勢力作持久的艱苦的鬥爭，在這種中國特殊條件之下，武裝鬥爭形式有特殊重大的作用，可以說武裝鬥爭的形式成爲中國革命主要的形式，成爲決定革命勝敗的鬥爭形式。

當然在這樣的提法之下並不否認中國革命其他鬥爭形式的意義，例如辯論工作、政權工作、經濟建設、文化運動、地方黨的工作等，在中國革命中無疑義的有重大的作用，沒有這些鬥爭形式，武裝鬥爭不僅無法順利的進行，而且甚至無法存在。因此武裝鬥爭必須與其他的革命鬥爭形式適當的配合起來，方能達到革命的目的。正是問題的實質是在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上述特殊條件之下，武裝鬥爭是起着主導作用的一環，是革命主要的鬥爭形式，其他一切鬥爭形式和方法都應當圍繞着武裝鬥爭，這樣中國革命任務才能够順利的完成。

過去和現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都是異常顯明的證明了中國革命這一基本特點和規律性，例如在第一次中國大革命的時代，當着五卅運動以後全國革命高潮發展到了頂點，在這個時候由帝國主義爲首的反革命勢力正準備集中力量以武裝鎮壓革命運動，在這種形式之下，中國革命爲了保持鞏固發展自己的力量，爲了展開全國運動的局面，就不能不走上以武裝鬥爭的革命戰爭形式的行動，來進行推翻反動軍閥的統治，當時廣東革命軍的北伐，便是這種轉變的表現，斯大林同志當時所謂「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中國革命的特點，便是指當時的北伐戰爭，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北伐戰爭，雖然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及中共黨的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沒有完成它的任務，可是北伐戰爭的整個發展過程及其勝利，完全證明這種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革命行

動是完全必要與正確的，因為這是當時中國革命戰勝帝國主義與軍閥反革命力量的唯一的方法和出路，當時其他一切革命鬥爭的形式都感環繞着這一武裝鬥爭，而爲着這一武裝鬥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爲了保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爲了承繼大革命未完成的事業，爲保衛自己及廣大的農工羣衆使之不受國民黨的屠殺，白色恐怖的摧殘，因此便於大革命失敗以後在南方各省的農村中進行土地革命游擊戰爭，武裝了部分的民衆，組織了革命的軍隊——工農紅軍，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行武裝的鬥爭，以革命的戰爭的形式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這也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因爲在當時的環境之下，誰繼續革命，誰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的屠殺，誰要決心在那些革命條件比較成熟的地區創立起革命根據地爭取和實現一省幾省革命首先勝利，以推動和實現全中國革命的勝利，誰就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行武裝的鬥爭，以革命戰爭的形式來發展革命運動，推翻反革命的統治。當時一切其他革命鬥爭的形式和方法，也都應該環繞着這一武裝鬥爭，並爲着這一武裝鬥爭的勝利。十年來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證明了當時反帝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形式，革命戰爭的形式，是完全正確與必要的，誰要否認這一武裝鬥爭的必要性正確性，誰就等於給國民黨當時反革命政策作辯護（如托派在當時便是如此）誰就等於承認中國共產黨及廣大的人民大眾應該被反革命屠殺，孫中山先生及大革命的傳統應該拋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日寇公開以它的武裝力量大規模侵略中國，企圖鎮壓日益高漲着的中國人民抗日革命運動，並使中國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之下的殖民地。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要挽救中華民族日益加深的危機，要完成中華民族及社會解放的任務，就必須與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行武裝鬥爭，以民族革命戰爭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出

中國去。在這種民族革命戰爭時期，其他一切鬥爭的形式方法也都應該環繞着這一武裝鬥爭，並爲着這一武裝鬥爭的勝利。三年的民族抗戰，證明了這武裝鬥爭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誰要否認這一鬥爭形式的必要和正確性，誰就等於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強寇政策作辯護，誰就等於承認中華民族應該淪亡，中國同胞應該被日本帝國主義屠殺、強姦、掠奪、壓迫（如漢奸汪精衛之流）。

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底基本特點之一正是武裝的革命與武裝的反革命作鬥爭，這一革命鬥爭的行動歸根結底是總以革命戰爭的形式出現（或者國內革命戰爭或者對外民族自衛戰爭）這不是奇怪的；而是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政治的環境底不可避免的產物。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曾經稱中國革命有着它的「特殊的軍事形式」（參照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四一頁）就是這個緣故。

（一）中國革命這一基本特點——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決定了革命的武裝力量對中國革命的特殊重要意義和作用，這是不言而喻的。誰要希望中國革命勝利，誰就要組織和訓練武裝力量；那一個階級要奪取政權，那一個階級便要有武裝力量。世界革命的領導者——列寧總結俄國革命全部經驗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政權特別是軍隊對革命的鬥爭有重要的決定意義，這一點對於中國革命來說更爲恰切。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斯大林同志遠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時曾經着重地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善現有的軍隊，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軍隊革命化，現時可以馬上定一個基礎，預料將受過土地革命訓練的革命農民和革命工人編成許多新的革命軍團，新的實際可靠的軍團，並把這種軍隊作爲武漢革命政府的柱石。這種軍團應是將來發展成中國紅軍的新軍隊的核心。不僅



是前綫的鬪爭上，尤其是後方反對一切反革命騷動的鬪爭中，都需要這種軍隊，如果沒有這種軍隊，就不能保障前綫和後方的崩散，不能保障叛變和倒戈」（參照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七年與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講話）。另外，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中間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文件中也經常地着重的提出這一根本問題。例如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執委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有論：「共產國際執委會更以爲改編軍隊的問題，編制絕對委員革命的隊伍，軍隊與工農組織間之聯絡，建立軍隊中之幹部，改編僱傭兵爲革命之常備軍，在目前特別需要。至於武漢政府的工農編成絕對可靠的隊伍，在軍隊內確立共產黨及堅強不拔的國民黨左派的影響，肅清軍隊反革命的份子，組織工團軍，尤須特別注意」。〔參照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四〇——四一頁〕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當時中共的領導者陳獨秀主義者沒有執行共產國際這一指示，沒有實行武裝工農群眾，建立共產黨直接影響下的革命可靠的武裝力量，結果大部分軍隊仍然落在地主資產階級手中，變成他們反對革命的有力武器。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南方各省進行蘇維埃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爭取和實現中國蘇維埃革命在一省幾省的地區勝利過程中，武裝的力量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中一切指示文件中，特別強調的說明這一點。例如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革新高漲時，共產國際執委七月會議上關於中國問題決議上說：

黨應當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指導而能够做這一政府的支柱的紅軍——。然後，這個政府才能够有相當的力量和意義。因此，必須集中注意去組織並且鞏固紅軍，以便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環境而能够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產黨應該明白建立完全有戰鬥力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有第一等的任務，解決這個任務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的開展。（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一〇九——一一〇頁）

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的來信又重複地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並且把「立刻團結鍛鍊出真正的工農紅軍」當作中共當前三個中心任務的第一個。又一九三一年七月共產國際主席團給中共的信中關於蘇區黨的主要任務一段，又把「鞏固與擴大紅軍，用各種方法提高紅軍的戰鬥力」提出來。所有這些不是偶然的，正是因為共產國際清楚地認識了中國革命這一特點，正確地估價了武裝力量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重大作用，所以他始終把建立與鞏固革命武裝的問題，提到中國革命問題中的第一位，要求中國共產黨以全力去解決，這是完全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曾經忠實地執行這一天才的馬列主義的指示。黨爲了建立和鞏固革命的工農武裝——工農紅軍——曾經採用了一切方法，如動員自己的最好的共產黨員及幹部到紅軍部隊中去，動員工人到紅軍中去，領導蘇維埃政府，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進行擴大紅軍的突擊運動，優待紅軍的家屬，加強紅軍的政治工作及提高紅軍的軍事技術等等。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運動時期頭一等的任務和工作，可以說就是爲了擴大和鞏固堅強的，有戰鬥力的，有廣大工農群眾擁護的鐵的工農紅軍，正是因爲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農紅軍，在蘇維埃運動及當時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軍閥的國內革命戰爭中起了特別偉大的作用。它不僅保衛了鞏固了蘇維埃政權，而且同時它又是蘇維埃革命種子的廣播者，蘇維埃政權組織者，它又打到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去，驅逐和消滅國民黨的軍隊，發動民衆，建立蘇維埃政權，消滅國民黨反動的政府，這樣來保障一省或幾省革命首先勝利底爭取和實現。正是因爲如此，中國蘇維埃革命發展重要特點之一，是它先有了紅軍武裝力量，然後才有了蘇維埃政府。紅

軍在國內革命戰爭中，一方面消滅敵人，保衛自己，擴大自己。另一方面擔負着發動群眾，幫助組織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光榮任務（過去紅軍政治部專設一政務處，其作用就在於此）。這一點與俄國發展的過程不同，在俄國是首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發動廣大的無產階級及農民主兵在蘇維埃彼得堡奪取了政權，打倒反動統治，建立了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然後才進行擴大軍隊，並不是先有了大批的工農武裝力量來奪取政權。例如十月革命以前，俄國共產黨並沒有自己直接創立和領導的武裝力量，當時有的只是過去沙皇政府的大量軍隊及少數武裝的工人赤衛軍。十月革命以後，停止了帝國主義戰爭，實現了和平，共產黨遂把原有沙皇的軍隊，宣佈了解員，而新的工農革命武裝，又沒有創立起來，所以到了一九一八年初德國帝國主義進攻的前面，而因為沒有軍隊以及其他的原因不能不與德國訂立布勒斯特和約得以取暫時的休息。從這時起，蘇維埃政府，才極力從事於紅軍的創立和擴大，到了後來由於這支武裝力量的創立，蘇俄在國內革命戰爭中遂取得全部勝利。中國則不同，先有了紅軍，然後才有蘇維埃政府，這不能不是中國特點之一。這一特點，也是由於中國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底特點而產生的。

同時正是因為中國革命有着這一重要的特點，所以中國革命過程中有着這一方面——即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許多豐富寶貴經驗，特別是十年來中國蘇維埃戰爭，有許多的貢獻。中國共產黨過去爲了實現蘇維埃革命的戰略方針，爲了爭取和實現一省或幾省革命首先勝利，也不能不直接領導武裝部隊去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行國內革命戰爭，在這種長期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受到了嚴重的鍛鍊，積累了許多管理掌握武裝部隊進行國內戰爭的經驗，創造革命戰爭的軍事理論，靈活的戰略戰術及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使中國共產黨成爲世界上一切共產黨中一個善於管理軍隊，領導革命戰

爭的布爾維維克政黨，使中國共產黨有着它的政治的領導者和天才將領品質俱優的領袖——毛澤東、朱德，有着出色的軍事家出色的將領，如彭德懷、賀龍、蕭克、林彪、劉伯承等，有着成千成萬的經過國內戰爭火線中考驗過鍛練過的黨的幹部，所有這些經驗及力量，對於現在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毫無疑義的有着莫大的意義。今天中國共產黨和它直接領導下的政權軍隊之所以能够成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及抗戰的核心力量，它之所以能够鍛練出瓦解敵人深入敵人的後方及敵人內部的藝術和技能，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過去長期艱苦鬥爭鍛練出來的結果。

(二) 因此，中國革命要獲得勝利，要戰勝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的軍隊，要消滅中國國內反革命的武力，就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只有偉大的革命武力，才能解決歷史偉大的任務」，這一句列寧的名言，對於中國革命，更加正確與恰切。同時，誰要成爲中國革命勝利光榮的領導政黨及領導者，誰就努力建立革命軍隊，並且要學會管理指揮革命的軍隊，進行革命戰爭；換句話說，誰要輕視武裝革命力量對中國重大意義，誰就不努力建立和鞏固革命軍隊，誰就沒有資格自稱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誰就等於對中國革命採取不莊重不負責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已經過去與對於這一問題不正確的傾向作過鬥爭，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時期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在這一中國革命重要問題上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他們在當時實際上只是注意了國民黨上層的外交，而完全忽視了當時赫爾斯人的權備性質的軍隊進行革命的改造工作的必要，武裝工農的必要，雖然共產國際曾經屢次的強調地指出了這一工作的重要與迫切，可是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始終不願意執行。不但如此，陳獨秀等甚至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最緊急關頭（武漢時期），不僅不想依靠革命的武裝，擴大革命的武裝，去軟化動搖者，去準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上層份子叛變

的打擊；而且自動地把武漢革命支柱之一勞動者武裝——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繳械，以適合反革命者變節者順利地屠殺革命叛賣革命的願望，幫助了反革命陰謀的實現，陳獨秀機會主義者，這種錯誤不是偶然的，它當然是由於陳獨秀等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採取了整個不正確路線的結果。可是無疑義的它的來源之一，正是陳獨秀等對於中國革命這一基本特點——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意義根本不了解或者不願了解，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當着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戰爭的開始，陳獨秀彭述之等竟在輿論報上公開發表反對北伐的言論（甚至違反當時中共中央的決定），認為北伐不適宜，不利於革命等等。而其實當時革命形勢繼續發展，廣大人民迫切的要求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條件下，北伐戰爭不僅是正確而且十分必要的。因為只有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才能推翻反革命的統治，才能開展全國形勢的新局面，直接掀動全中國革命的大風暴，後來整個北伐戰爭的經驗，鮮明地證明了這一真理。至於大革命失敗，並不是因為北伐戰爭的關係，而是因為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沒有能够在整個北伐戰爭中武裝廣大工農群眾，並改造國民革命軍的武裝部隊；反而對這一有關於整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武裝力量，採取消極的態度，結果大部分武裝力量，保留在反革命派手中，後來成為反革命的工具。

另外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又反對了另一偏向即以張國燾為代表的軍閥主義路線，這一路線的實質，是把武裝力量脫離了黨的領導，把它變成個人的工具，甚至作為反黨反革命的武器，不加強軍隊中黨的領導，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不建立軍隊與群眾的正確關係，不進行武裝鬥爭及其他革命鬥爭形式正確的配合……等等。張國燾這種軍閥主義和他的其他錯誤（機會主義土匪主義）曾經使他領導下的武裝部隊（過去紅四方面軍）受了很大的損失，如果沒有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布爾什

維克主義的頑強鬪爭精神和靈活的藝術，給以迅速的糾正克服，那無疑義的，它對於中國革命的損害將要來得更大。

對於中國革命的武裝力量及武裝鬪爭形式底意義和作用正確的認識及正確的靈活的掌握運用，以及和其他鬪爭力量鬪爭形式適當的配合這一問題是考驗中國先進革命政黨領導能力主要標準之一，也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主要先決條件和保障。

### (三) 中國革命的持久性：

(一)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一特點，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持久性，革命與反革命的鬪爭帶着比較長期的性質。中國革命這一特點也已經被過去和現在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經驗證明了的。例如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假如從辛亥革命算起的話，就已經有了將近三十年之久，如果從五四運動算起也有二十年以上，就是從第一次大革命算也已經有了近十五年之久，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仍然未曾完成，帝國主義強盜一個也沒有打倒，這比諸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那是要持久得多了，這是無庸否認的事實。

中國革命的持久性的根源，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然而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一切帝國主義——這無疑義地是中國革命基本困難及中國革命比較持久的主要原因。因為帝國主義是中國半殖民地最高的主人翁，它在經濟上壟斷了中國經濟命脈，支配着中國的經濟生活；在政治上操縱着中國的政府大權，它不僅有大量武裝到牙齒底海陸空軍，經常駐紮在中國各大城市，隨時可以派出來直接鎮壓中國革命運動，而且更重要的它在中國有着反動的封建勢力（地主、軍閥、官僚、高利貸者）。甚至買辦民族資產階級，（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作爲它的清道夫及統治中國的社會支柱，因此帝國

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最大死敵，是中華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主要的障礙。這一中國革命的死敵，不僅善於利用他們高度軍事技術武裝起來的軍隊向革命的民眾射擊，而且還善於運用「以華制華」的惡毒政策來分裂中國，削弱中華民族的力量，尤其是利用中國封建地主資產階級來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下的革命運動。過去和現在中國革命運動每一步的進展，都遭到帝國主義的直接間接的反對和鎮壓，遼的不說，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一開始就遭遇到帝國主義的屠殺和鎮壓，如五卅慘案，沙淞慘案。以後，帝國主義又組織了北洋軍閥及南方軍閥來反對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廣東政府及後來的北伐運動，一九二七年帝國主義看見了組織軍閥進攻和阻止革命運動發展的傳統方法失敗以後，遂採用分裂統一戰綫的政策，壓迫民族資產階級向它投降，和它們一同起來反對中國革命，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更加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憎惡，反對有名的蘇維埃紅軍的六次大規模圍剿的主要組織者和策動者正是國際帝國主義。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華北，引起了華北及全國人民抗日運動的高漲，日本帝國主義爲了鎮壓日益增長着的中國抗日革命運動，爲了滅亡中國，乃於一九三七年爆發對華的侵略戰爭。所有上述這些事實，無疑義的證明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最兇惡的死敵，是中國一切反革命的主謀者領導者。

中國革命的持久，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統治力量的強大，以及他們與中國內部一切反動勢力的結合，除此以外上面我們所說明的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點，也是組成中國革命持久性重要因素之一。因爲中國革命既已有了強大敵人——國際帝國主義和它在中國的爪牙，同時中國革命又由於種種原因而表現底發展不平衡，因此，毫無疑義地就會增加中國革命的困難，延長中國革命的發展速度，這也就要求中國革命要持久艱苦頑強的鬥爭，來準備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

的弱點，粉粹敵人的陰謀，以最後戰勝中國革命的國內外的敵人。

因此，根據上述的理由，中國革命要澈底的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必須有更持久堅苦的鬥爭，同時這一鬥爭最後的勝利不單要依靠中國民衆自己的力量，而且還要由國際的形勢來決定。三年來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最鮮明的證明了這一真理，即半殖民地中國的抗戰要獲得最後勝利，一定要經過持久的戰爭，因為只有在持久抗戰過程中才能克服自己的弱點，增加敵人的困難，轉變敵強我弱的形勢，準備好反攻的力量，驅逐日寇出中國。中國民族抗戰的持久性，是中國革命持久性特點底一柄最重要及最好的表現。

中國革命的持久性，不單表現於中國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帶着比較長期的性質，而且表現於中國革命從劣生長發展到勝利的進程中，將要遭遇到許多的困難挫折，許多的逃亡者叛變者，甚至比起俄國革命十月革命以後的蘇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表現得更不知要多多少。關於這一點，世界革命的率領者——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就已經天才地預見了這一點，例如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起草的中國革命綱領上在敘述了中國革命性質及其特點以後接着便說：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一般地是以統一戰綫進攻中國革命，現在（就是指第一次大革命時——如心註）帝國主義之間並沒有像那種俄國十月革命前削弱帝國主義勢力的破裂和戰爭，這些事實都告訴我們，在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上，將要遇到比俄國革命更大的困難，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將比蘇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不知更要多多少了」。

俄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偉大的發端，是世界歷史第一次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底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要達到他的目的，若不懂要和俄國沙皇制度



——最兇惡的封建軍事的帝國主義國家制度，不懂要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作殘酷的鬥爭，而且要與國際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戰鬥。這不懂因為俄國革命要推翻沙皇帝國主義——西歐帝國主義在東方的看門狗，而引起英法等帝國主義的反對，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俄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發端，是瓦解資本主義制度的開始，因此，不能不遭遇到各帝國主義起來堅決的破壞。例如十月革命以後，國內戰爭時期，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俄國革命便是最好的證明。因此，俄國革命要戰勝國內外的敵人，要達到它的戰略目標，它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去戰勝困難與逃亡者、背叛者，斯大林同志說中國革命在它的勝利的道路上還要遭受到比俄國革命更大的困難，更多的逃亡者、背叛者，這一句話，是一方面因為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還當然沒有像俄國十月革命前那種削弱帝國主義勢力的破裂和戰爭，（有了這種國際環境當然會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過程）；而另一方面主要的還是由於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有着它的頑強敵人——一切帝國主義列強——這基本的困難存在着，要克服這一基本困難，必須與帝國主義作持久的革命鬥爭，有了這一基本的原因，再加上帝國主義列強在第一次大革命前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特別是第一次大革命起到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事變，帝國主義列強雖然內部存在着矛盾衝突，然而基本上是一致的對付中國革命的），一般的是以統一戰線方式進攻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那無疑義的更增加了中國革命的困難，更增加了中國革命的持久性質。

中國革命的困難，尤其是戰勝帝國主義的困難表現在甚麼地方呢？這些困難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列強長期統治宰割之下形成了的國家不統一，不民主的困難中，中國民族革命的力量缺乏團結，民衆缺乏組織的困難，中國經濟的落後，軍事技術的落後的困難，交通不便的困難等，這些困難是可以逐漸克服的。因為中國革命，不懂有着許多困難，而且有着許多優良的條件（如上述的國際上資本

主義的總危機，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和鞏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及殖民地附屬國革命運動的生長，中國是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下的半殖民地，中國革命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衝突，削弱他們的陣線，中國革命是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兩大潮流的匯合，在正確領導之下，可以使中國革命的發展，有更巨大的力量，更廣泛的範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等等；這些許多優良條件，就可以幫助我們克服上述的困難。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些困難的克服須要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因此，中國革命的圖爭進程中，在遭遇到許多困難的時候，必然會有不少的政治上不堅定的缺乏氣節的人們，由於害怕困難，害怕挫折，而發生中途逃亡及叛變的現象，這是不可避免的。並且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時期，某些曾經參加革命的階級，脫離革命，投降敵人（如過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及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份子及今天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逃亡者背叛者），而且表現在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隊伍中個別少數份子，在嚴重困難關頭中的動搖逃亡及叛變。無疑義的這種革命發展過程中的「自然清洗」的現象，對於中國革命一般地整個地說來也有好處。誰要害怕困難挫折，誰要看見了某些可恥逃亡者、背叛者，脫離革命、叛變革命，而喪失自己對革命的勝利信心，誰就不配稱為真正的中國革命家，誰就不能堅持地參加光榮的持久的中國革命。

(二) 中國革命持久性底另一重要的表現，便是中國革命的曲折性，不斷螺旋式的向上發展。這本是一切革命，尤其是任何偉大革命運動發展的規律性，但這一特點在中國革命中表現得更加明顯與標本。斯大林同志論革命的曲折性及俄國革命這一特點時，曾經說過「革命普遍不是按筆直上升的路

綫，不斷的向上增長，而是經過曲綫的道路，進攻和退守的道路，高漲和低落的道路，在發展的行程中，鍛鍊革命的力量，準備它澈底的勝利」（參照斯大林選集第一卷中文版一〇二頁）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莫斯科黨的積極份子會議上會專門論及這一問題，他引證了俄國革命的例子說：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七年第一個戰略階段上，革命有時高漲，有時低落，有時進攻，有時退守，不是直綫式發展，而是曲綫式前進。如一九〇五年革命有高漲，到了一九〇六年又開始低落，這革命運動低落從一九〇七年延長到一九一二年，到了一九一二年林拿事件以後，革命又走上了新的高漲。到了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革命又來了一個新的低落，一九一七年二月又進入了革命新高潮，一直到大革命。第二個戰略階段——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止——也是如此。中國革命這一曲折性，螺旋式的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不僅表現在中國革命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時高漲，有時低落，有時進攻，有時退守；而且還表現於同一發展的階段中，有高漲與低落，有進攻與退守。表現於高漲與低落，替換得更為比較迅速，例如我們拿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來說，一九二五年夏天是革命廣濶地高漲的時期，這一時期中最主要的是上海有名的五卅運動，但是同時就在這一時期中有名的地區（如北方）革命運動還沒有上海那樣的高漲，一九二五年末到一九二六年初，在全國形勢來說是革命浪潮低落與反動勢力暫時勝力的時期，這時期反動勢力的表現就是工人運動的被破壞，國民黨的失敗，吳佩孚及張作霖軍閥的聯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事變，就是這種勢力暫時勝利的回聲。然而，就是這一時期中，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廣東一般的革命運動都表示向上高漲，革命的根據地的鞏固與擴大。一九二六年秋天的北伐戰爭的開始，又反映了革命運動的新高漲，千百萬群眾捲入革命鬥爭，給了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以嚴重的打擊。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暴動達到了它的高峰，於是乎造成

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四一二」叛變，又使中國革命部分的失敗，加強了反革命的聯合。然而另一方面，中國革命又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上。工農小資產階級更加革命的聯盟，代替了以前的全民的聯合戰綫，到了七月又開始低落等等，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蘇維埃運動又重複地證明了這一真理，當着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它的優勢的武裝力量，在各個大城市實行瘋狂的白色恐怖鎮壓工人運動時，而南方各省的工農群眾却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自己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行着殘酷的國內革命戰爭，一直到現在，中國革命這一特點還是存在着。這一特點無疑義的與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半殖民地的勢力範圍劃分的統治，以及中國軍閥的割據，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等相連系着。誰不懂得這一特點，誰就無法了解中國革命的規律性，誰也就無法指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

中國革命發展的曲折性，螺旋式的發展特點，更重要的表現於中國革命的先進政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必須採取更多的縱橫綽綽的轉變抹角地靈巧政策，去發展中國革命，使它能有持久耐戰的力量；另一方面，盡可能縮短持久性的過程，以保證革命能夠完全戰勝敵人，獲得最後的勝利。因為所謂革命發展的曲折性，實質上就是表現在這一基點上，關於這一問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曲折道路的關係，在實質上是對於妥協的關係。一切歷史的曲折變化是妥協，是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完全否定新的舊制度，及沒有足夠力量去完全推翻舊制度的新的方面之間的妥協」。（參照列寧論反對抵制一文）中國革命長期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政策的應用是完全必要的，我們要善於利用敵人的內部的各種矛盾與各種非無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去削弱敵人的力量，增強革命的陣地，善於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那怕它是動搖的一時的，未集中力量，對付當

前的主要敵人，決不能採取「簡單的」「直綫的」政策。

共產國際遠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就曾經指出中國革命這種政策的必要，例如一九二七年五月國際執委八次會議的決議上有說：

「中國共產黨站在極端複雜的任務前面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鬭爭與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鬭爭之並進。帝國主義大批軍隊之駐華，實際上，中國之分裂爲三部，經濟情況及政治情況之錯綜萬分，帝國主義統一戰綫內之衝突，中國各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極端參差……凡此種種都使得革命在進展中發生無數的困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武漢政府在現在的條件下，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縱橫捭闔的政策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共產國際反對那藉口國家政權既非無產階級的性質，根本上便不能用縱橫捭闔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意見，共產國際認爲這意見是建築在疏忽的理論和政治的錯誤上面……所以共產黨不能根本上反對縱橫捭闔的策略，負責武漢政府的共產黨，如果永遠而在一切條件之下反對妥協的策略，這就是說，共產黨要無條件的向各方作戰，這真是大愚特愚。」（參照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四二頁）

（三）這就是所謂中國革命持久性的特點，這一特點應該有正確的估計。過去中國革命隊伍中間，甚至中國共產黨內部曾經有過某些人們對於這一問題缺乏正確的了解及足夠的估計，結果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例如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重新高漲時，中國共產黨內一些同志以李立三爲代表產生了一種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路綫，這一路綫的實質，就是不了解中國革命這一特點，不了解中國革命是一個艱苦持久奮鬥的過程。因此在革命一開始高漲時，便想經過它的盲動冒險計劃，一下子完成中國革命，企圖離開中國革命許多困難及跳過中國革命持久性曲折性的發展過程中。這種「速勝論」的觀點。

在一九三八年中國抗戰過程中，也曾經以其種形式出現着，例如在台兒莊戰鬪以後，便有人主張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全線反攻決戰，完全否認中國抗戰的持久性，否認抗戰中中國各方面許多困難弱點，這種理論是已經被中國三年來的抗戰證明了它是錯誤的。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只看見中國革命的困難，特別是壞的一切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列強這一基本困難，因此，拚命誇大中國革命的弱點，沒有看見或不願看見中國革命的許多優良條件，沒有看見中國革命本身就包括着克服上述的條件和力量，因而對於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完全喪失勝利的信心，甚至得出亡國論的結論，這就是今天抗戰營壘中妥協投降派的理論基礎以及過去中國共產黨的某些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據。

中國共產黨指出中國革命的困難肯定中國革命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鬪爭過程；但另一方面指出中國革命有許多優良的國內外條件，這些條件，將會幫助我們逐漸克服困難，最後的戰勝帝國主義及中國封建勢力。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正確的認清中國革命這一特點，認清中國的優點弱點，並且能夠靈活的聰明的一切可能的力量，採用一切可能的鬪爭形式和方法，以便一方面使革命能有持久和耐戰的力量，另一方面，盡可能地縮短長期性的過程，以保證革命能夠戰勝國內外敵人，終於取得完全勝利。

## 第三講 中國革命的動力、領導、政權

### 及其前途

#### 第一節 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

革命動力的問題也就是指所謂革命力量的分佈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那些階級能够起革命的推動的作用，那些階級可以成爲革命的因素。關於這一問題，當我們在上面詳論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時，曾經一般的指示了一個輪廓。我們說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生長在新的國際環境中，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諸特點，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於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如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並且與特別形式的俄國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有重要的區別。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兩大潮流的匯合，它客觀上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組成部分之一（因爲它的新的國際環境及它本身反帝國主義的性質）。這一基本特點就預定了中國革命的社會力量的分佈，預定了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即中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聯合廣大農民勞苦群眾才能徹底的勝利。但是

上面只論及中國革命基本的特點，我們還沒有存細的分析到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力量，現在爲了對於這一問題更加明瞭化起見，茲分別地說明如下：

中國革命動力問題可以分爲下列幾方面來說：

(一) 首先說到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關於中國無產階級能够成爲中國革命動力甚至基本力量之一，這一點是無庸爭辯的。中國無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一樣，是有史以來最受剝削與壓迫的階級，尤其是中國，它受着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資產階級三重的剝削與壓迫。因此，它的革命反抗性，比任何一種力量更爲頑強堅決徹底。同時，中國無產階級一開始便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一開始便參加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走上正確的軌道；這一點更加使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自然，中國無產階級有它不可否認的弱點——例如它的數量比較少，它的組成部分比較複雜等等，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已經有了產業工人三百萬，此外還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的手藝工人，和同樣多的農業工人，合起來中國工人的數目字不少，至若數量比外國少及成分較爲複雜，這一弱點，可以以正確的思想及良好的組織性補償之，這一點在中國革命過去歷史發展上早已證明了的，所以中國革命有這一無產階級的戰鬥的頑強力量是它的重要特點之一，在這一點上不僅使與法國一七八九年及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有重要區別，就是廿世紀一切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如土耳其，也有極大的不同。

土耳其革命（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開始時還沒有强有力的無產階級，工人的總數不到十萬人，大企業的產業工人不過一萬人，無產階級的組織不是完全沒有便是近乎中世紀的性質。因此當時土耳其的無產階級不可能有强有力的共產主義的先鋒隊。不僅如此，就是這樣稀少的無產階級，當時



會集中在土耳其兩個中心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士麥拿，而這兩個城市恰好給英國和希臘軍隊佔領，所以土耳其的無產階級被外國軍隊俘獲起來，實際上沒有參加土耳其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果這一運動的領導權落在民族資產階級手中，使土耳其的革命停留在民族革命的階段上，並未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無產階級從數量上質量上都超過土耳其的無產階級，此外中國無產階級還有堅強的階級組織（工會）和共產主義的先鋒隊的領導，並且中國無產階級已經有着豐富的階級性的紀律，所有這些可以決定中國無產階級能夠團結聯合指導廣大的農民引導去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關於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大作用是有無數公認的事實足以證明，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每一次嚴重的鬥爭，每一精彩的一幕，都是與無產階級的光榮作用血肉不可分離的。關於這一問題，下面論及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特將加以說明。

(二) 其次說到農民。中國的農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經濟上日益破產，我們在上面中國經濟性質一講中就曾詳細的分析了中國農村，農民不懂受帝國主義直接的掠奪，使他們成爲財政資本的奴隸；而且受封建地主地租高利貸及重閹苛捐雜稅兵役的剝削，使他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所以中國的農民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變重的壓榨之下，不是餓死凍死，便是浸死打死炸死。這種社會經濟環境不能不使中國廣大的農民日益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爲中國革命的動力之一。這一點不論從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不論大革命失敗以後十年來蘇維埃運動中，不論從三年來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出。只有閉着眼睛不看事實的托洛斯基派才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污蔑農民是一個反革命的保守力量。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及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兩大潮流的滙合，中國

農民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的主力，民族革命沒有中國三萬萬以上的農民參加，沒有把這大批農民的力量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那最後戰勝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十年來蘇維埃戰爭的經驗，尤其是三年來抗日民族革命和他的經驗，十分鮮明的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真正把幾萬萬的農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武裝起來，就不懂要給農民以民主權利，使農民可以有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自由，而且要改善農民生活，這樣才能發揮他們的偉大力量。同時隨着廣大農民捲入民族革命的潮流，隨着他們組織性覺悟性的提高，必然會使中國革命逐漸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因為只有深入土地革命，才能發動更多的農民參加到反帝國國爭中來，造成雄厚的民族革命的力量，如一九二七年階級國爭中農民在兩湖就是這樣進行國爭的。中國農民堅決贊助土地革命的，因為土地革命摧毀封建勢力的基礎，使農民得到社會的解放，所以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上革命動力之一，而且是基本革命動力之一，自然我們也不能否認農民有它的弱點，如落後性、保守性、散漫性，這一弱點可以被反革命利用來反對革命勢力，來分裂農民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團結，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時代，河南的紅槍會（農民半武裝性的組織）曾被軍閥吳佩孚利用反對國民軍；蘇維埃運動時代，有好些地方農民落後的組織（如哥老會大刀會等）也會被地主資產階級動員了去反對蘇維埃紅軍，然而這些弱點並不妨礙農民仍然是革命動力之一，農民這些弱點也只有在革命過程中逐漸改正。因此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達到自己的解放，而同時無產階級也只有聯合農民才能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勝利的結局。所以無產階級與農民親密的結合就可以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了勝利的保證。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農村中還存在着強有力的封建殘餘和資本主義前期剝削關係的緣故，農民的階級分化過程還發生得比較遲緩；然而，中國農村經濟自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已

經到了這樣的程度，農民在階級關係上已不是清一色的了，現在中國農民的內部早已經分成爲各種不同的階層，如富農、中農、貧農、佃農。農民的上層份子（如富農）採用出租土地的方法，高利貸，僱傭勞動的方法，經商的方法來剝削貧農佃農，他與貧農佃農的矛盾逐漸尖銳化，不過一般的說來中國農村中主要的矛盾還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農民在對抗着封建地主關係上說來還是一個階級。因此俄國革命第一個階段中，列寧的聯合整個的農民的口號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整個的一般的說起來，還可以運用，特別是農民與地主鬭爭的第一個時期。但是在革命往前發展的過程中，富農份子必然會轉向反革命的營壘，尤其是中國的富農，帶有半地主的特性。因此當農民反地主鬭爭提高到土地革命時，富農必然會暴露出他的反革命的面目，無產階級爲了爭取和鞏固對基本農民的領導權，必然要進行反對富農的鬭爭，大革命失敗以後，蘇維埃土地革命長時期就是如此。

(三) 再其次說到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城市貧民；中國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包括着各種不同的階層，這些不同的階層在革命發展的各個時期中有着不同的作用，但大體上城市小資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特別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時期，有他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

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着的社會階層，首先是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一般的說來，是沒有多大出路的，因爲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大批商品的傾銷，經濟的侵略，使中國農村手工業無法存在，而日益破產消滅；另外一方面，中國手工業者還受軍閥苛捐雜稅的剝削，甚至大部分還是受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榨取，所以手工業者一般的說來，是仇視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制度的，他可以成爲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一種力量。但是中國手工業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是希望無限制的剝削自己的夥計和學徒。因此他們仇視有組織的覺悟的工人運動，同時手工業者有的上層份子有的在城

市中農村中也與高利貸及土地的封建剝削或多或少有連系的。因此，當着中國革命深入到土地革命時，這些上層小資產階級份子，必然會從動搖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城市和農村的小商人也是如此，這些小商人的一大部分也是反帝國主義反侵略及軍閥的壓迫和榨取的，他們可以參加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另一方面，小商人也與手工業者一樣，由於他們經濟上這種特殊的地位，產生出他們的動搖性，不穩定性，往往容易陷於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影響之下，特別是他們的少數上層份子還經過商業與高利貸而和農村中的封建剝削發生關係。所以這些人是敵視反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整個的過程證明上述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界學生等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中有他特殊的重要作用，這裡說的知識界學生是指他的基本的羣衆，因為中國學生知識份子中也有不少中國的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和資產階級出身的子弟，我們這裡所說的不是指這些人們，而是指學生知識界的基本羣衆，這些基本羣衆按着他們的經濟地位大體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他們多半是從城市、農村、小商人、手工業者、僱農、教師中出身的。這一批小資產階級的知識界學生，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受着三種壓迫及摧殘——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及舊社會的文化思想道德傳統——他們不僅在政治文化生活上沒有任何民主自由（如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信仰等自由權利），而且在工作與生活上也沒有任何的出路，過去中國的學生普遍的感覺「畢業就是失業」，這是他們沒有出路的最好證明。因此，小資產階級知識界學生，對民族的解放，對民主政治的要求異常迫切。在過去中國民族革命運動開始發展的時候，他們往往站在前綫上，在運動的先頭，成爲民族革命的發動者、先驅者。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不僅是小資產階級特殊利益的最堅決的代表，而且在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個時期常常是整個民族要求的表現者代理人

，這一點可以從一九一五年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及一二一六運動中看出，但是小資產階級知識界學生因為他們社會的出身以及舊社會傳統對他們的影響，因之他們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曾經表現出缺乏堅持性及帶有動搖性的特點，他們必須與廣大的工農羣衆及先進的政黨先進的革命思想結合起來，才能起真正的發動者及橋樑的作用，至於工人運動，他們在中國共產黨政治影響日益擴大及革命浪潮推動之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強有力的影響之下，有部分的參加的可能，過去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參加工人運動却常常把自己動搖未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或空想帶到工人運動中去，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學生按照一般的規律性，只有經過長期的鬥爭鍛鍊才能澈底改造他們的思想，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利益的積極擁護者，無產階級的戰士。

城市貧民是與上述小資產階級階層並列的極堪注意的一部分力量，這裡包括了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小手工業者，街上叫賣的小商人，失業的知識份子，尋找工作的破產流浪的農民以及很多大量的「苦力」階層——半無產者——沒有經過工廠生產的訓練而是靠偶然的工錢活命的農民以及很多大量的「苦力」及其他半殖民地殖民地國家中，數目字均很大，至少是在兩千萬以上。同時這些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地位，是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剝削和壓迫的。不僅如此，他們還遭受商業資本高利貸的榨取，因此他們的生活是無保障的，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所以這些人們的客觀社會經濟政治條件都推動他們參加到革命方面去，這一點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及十年來蘇維埃運動中到處可以看到許多具體的證例。不過這一階層的最大特點，就是缺乏組織性與團結性，如果革命政黨能够重視這一力量，並適當的把他們很好的組織起來的話，那末他們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

(四) 最後來說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個很複雜的

問題，他不像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對革命的態度那樣確定（如工人、農民）或比較容易確定（如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的複雜性是由於他的特性造成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特性在那裡呢？他與外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何區別呢？關於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清楚的認識，那是無法確定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的態度。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比較，基本的區別是在他是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因此他與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英、美、法、日、德……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就是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他們早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就經過了自己生長發展統一的過程，他們早已唱完了自己祖國民族的歌曲，完結了在自己歷史上進步的作用（即反對封建勢力反對民族壓迫的進步的作用），到了後來他們自己又轉過來侵略別的國家，他自己成爲了民族的壓迫者、侵略者，成爲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可是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却不同，例如許多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他們爲了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爲了自己民族的獨立統一起見，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內有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可能，例如過去土耳其及我們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如此。關於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這一特性我們應該有足够的估計，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及列寧關於這一問題的報告中也會經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這一特性，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聯共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報告上論及這一點也會經說：

「帝國主義國家中的革命是一回事，那裡資產階級是別的民族的壓迫者，那裡革命一切階段上他都是反革命的，那裡民族的要素作爲民族解放鬥爭的要素是不存在的；在殖民地與附屬國家就是另外

一個樣子，那裡別的國家的帝國主義壓迫是革命推動因素之一，那裡這種壓迫不得不甚至危害及民族資產階級，那裡民族的資產階級在一定的階段上，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贊助本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那裡民族的要素作爲解放而國爭的要素是革命推動的因素」。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如此，我們在中國經濟性質一講中已有詳細的分析，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的統治，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結合，由於中國軍閥制度的存在，政治制度的不統一、不獨立，給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以極大的阻礙，所以民族資產階級爲了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爲了擴張他的政治勢力，使他在一定的階段上，一定的時期中，有參加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運動的可能。在這一方面說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他的進步性革命性，他這一特性，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估計。

但是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不能僅僅限於這一方面，雖然這是很重要的方面；我們還要掌握他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他的不徹底性、妥協性、保守性，民族資產階級這一特性也不是偶然的。我們在本書中國經濟性質一章中，就曾經指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特性的經濟基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的特性是他的貧血性、買辦性、半封建性，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限制，使他在經濟上的力量異常薄弱貧乏（沒有重工業的基礎及中國民族輕工業也受到打擊限制而日益破產及非民族化），它對帝國主義財政上經濟上的依賴性，尤其是他的一大部分是由買辦轉化過來的，它不僅政治上經濟上都與帝國主義有姻屬的關係，此外，他許多在農村中自己兼出租土地放高利貸的封建剝削。由於民族資產階級上述的經濟特性，遂產生了他政治上的特性——不徹底性、妥協性、保守性，使他無法澈底擔負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政治上的特性，使他在政治上形成一種特別的動搖的傾向，妥協的派別，

這一派別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的六次大會稱之爲民族改良主義。例如共產國際六次大會通過的「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大綱」上有說：

「這些殖民地裡的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並不一致，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首先是商業資產階級，直接服務於帝國主義資本的利益（買辦），一般的和整個的說來，這一部分資產階級（即買辦及與外國資本密切勾結的大商人——編者）一貫到底的擁護反民族的帝國主義的觀點，反對整個民族運動。至於其他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代表本地工業利益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則是站在民族運動的立場上，但他同時是一種特別的動搖的傾向妥協的派別，這一派別可稱爲民族改良主義（或者根據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提綱上的說法，稱之爲資產階級民主派）。」

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規律大體是可以歸納如下：即他爲了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爲了擴展自己的政治力量，他願意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甚至反對軍閥官僚的革命鬥爭，或者想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帝國主義的勢力，限制軍閥官僚過分的猖獗爲目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害怕革命運動的開展，害怕民衆創造性積極性的提高，希望革命不要過於徹底，對於舊的制度不要破壞的過於乾淨，好留一部分的勢力（如舊的官僚政治機構，軍隊制度）束縛革命，對付工農大眾。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他一開始參加革命運動，即帶着動搖妥協的民族改良主義的傾向。到了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定的階段，廣大的下層工農大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爭取他應得的果實時，他便必然會從動搖走上叛變革命的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規律性，早已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得到鮮明的證實，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就不勝利，如果要徹底勝利的話，那末它不僅堅決要肅清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而且還要肅清與戰勝動搖妥協的最後叛變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真理，中國革命過去和現在



都已經證明過，將來也會繼續的證明着。

所以根據上面的分析，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應該反對兩種不正確的傾向，第一種是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進步性，把中國資產階級與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等量齊觀；另一種傾向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妥協性、保守性估計不足，過分誇大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進步性。前一種傾向是會造成關門主義或左傾空談的理論基礎，如第一次大革命開始時的張國燾及托洛斯基派，今天的某些關門主義者；後一種傾向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據，如第一次大革命時代的陳獨秀機會主義，及今天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時代，我們黨內某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從這一觀點發源起來的。不論前者及後者，那是違反馬列主義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正確的分析，都是有害於黨和中國革命事業的。

除了上述中國無產階級農民、城市貧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外，還應指出中國國內數千萬的少數民族，也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國對外來說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國家，對內來說它又是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國內有幾千萬的少數民族，如蒙、回、藏、苗、侗、黎、僮……等，他們散居西北、西南各地邊疆。這些少數民族一方面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宰割，另一方面又受國內漢族的官僚軍閥的剝削摧殘，他們迫切的要求解放，要求建立自己民族的國家。對於這些少數民族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應有足够的估計，中國革命的政黨應該指示適當的辦法去發展他們組織他們，使他們參加到反帝的民族革命的戰綫中來。

關於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大體上就是如此。這一問題要求我們同志具體的分析，具體的觀察問題，絕對不能抽象化公式化，特別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用的估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下面我們

還要提到的。至於上述各種力量以外其他如地主豪紳軍閥，一般在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整個階段上都是反動的力量，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支柱及屏障。然而要記到在半殖民地中國革命的發展某一時期中，在某種特殊情況之下，他們中間部分的力量，至少他的小部分也有暫時參加反帝民族革命的可能（如今天中國的抗戰中有部分的地主參加了的），雖然他們參加民族革命是帶着極大的動搖性、不徹底性，因此，對於這些力量正確の利用，是革命先進政黨戰略指導的任務之一。

## 第二節 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

(一) 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就是那一個階級力量能够勝任領導革命統率革命的問題。這一問題是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之一，對於這一問題的正確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無疑義的有重大的意義。

上面第二講當我們總論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時，就已經大體上給了這一問題一個輪廓式的說明，比如我們曾經說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於它的新國際環境，由於它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它成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潮流中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同時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徹底性，以及中國無產階級的強大和他在勞苦羣衆中的威信日益增長……等等，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徹底的勝利，這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基本特點之一。我們這一論斷，即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得到徹底勝利的根據是：(一)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薄弱，它對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依賴，它害怕革命運動的發展。(二) 中國無產階級比較民族資產階級強大，並且它的革命積極性和在勞苦羣衆中的威信日益增

長，它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鞏固與擴大。(三)中國革命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兩大潮流匯合的特點，它的新的國際環境——如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強大及中國和它的比鄰，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存在和發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等等。

上述的論斷早已爲過去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鐵一般的證明了，例如中國無產階級的出現於中國政治舞臺不久，即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面目，使中國革命的陣容更爲新穎及有力，鬪爭方式更爲革命。一九二三年的二七工人偉大鬪爭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極重要的環節，它在中國革命中展開了新紀元，一九二五——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一般的也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之下進行的。沒有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積極參加與推動，第一次的大革命那樣大規模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這不僅僅表現在第一次大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建立民主共和國等）影響下推動之下發動起來的，而且黨直接領導之下的無產階級，以自己的戰鬥積極的行動（五卅運動、香港大罷工、上海三次暴動等）；來吸引推動其他的各階級——特別是廣大農民小資產階級羣衆，參加到革命中來，開展革命的運動的局勢，此外共產黨以自己的幹部黨員的忠誠英勇及模範作用，來克服大革命中的各種困難，戰勝反革命的進攻。最好的例子是北伐戰爭，這一戰爭，中國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及英勇鬪爭起了最大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爲共產黨是積極的參加，而使北伐戰爭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擁護，而且更重要的是北伐戰爭中每一次最困難的戰鬥最緊急的時候，都以共產黨員佔多數的戰鬥部隊解決和克服的，例如有名的汀泗橋的血戰賀勝橋血戰都是共產黨員最多的第四軍番勇作戰獲勝的，克服武昌同樣是以第四軍共產黨員的最多部分爲先鋒。正是因爲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間起了這樣的先鋒隊突擊隊的作用，所以中國革命一切敵

人從帝國主義起到軍閥、地主、買辦、豪紳及叛賣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份子，都在仇視的反對他污蔑他，組織「反赤陣綫」來反對他，這也正是領導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和他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特色，絲毫也不足爲奇的。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共產黨，單獨的擔負起了繼續中國革命光榮的任務，繼續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領導了千百萬農民、城市貧民，與帝國主義和叛變革命的國民黨作堅決的鬥爭。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南方湘、贛、鄂、閩等省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工農大眾自己的革命的政權——蘇維埃政府，及工農的武裝——紅軍，實行了土地革命與民主政治。在十年蘇維埃戰爭中間，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光榮領導者，是中國人民及民族解放的唯一先鋒隊。

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中華民族危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無產階級和他的政黨又提出了挽救中華民族危機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及抗日救國最徹底綱領，提供了中華民族解放的具體道路。西安事變特別是盧溝橋事變以後，三年來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動之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動了組織了歷史從未有的偉大的全民族的對外抗日民族自衛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在敵後方收復了廣大的土地，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政權。在軍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給了日本帝國主義很大的打擊，組織了和教育了廣大的民衆，提高了他們政治覺悟程度及抗戰必勝的自信心，所有這些也是無庸爭辯的事實。也正是因爲這樣，所以一切中國革命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漢奸汪精衛、托派及地主資產階級中的投降派頑固派都在瘋狂的反對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仇視它、污蔑

它，組織「防共統一戰綫」來打壓它。

中國無產階級這種領導作用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爲：

(甲) 無產階級是最受壓迫的和最受剝削的階級，它沒有私有制度，它除了失掉它頸上的鎖鍊以外，什麼東西也不會失掉，尤其是中國無產階級受着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使它對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對舊的保守反動勢力的鬭爭更加頑強堅決不妥協。

(乙) 因爲無產階級是與先進的大生產方式聯系着的一個階級，它受到大生產過程的鍛鍊，它的集體生活工作鬭爭環境，使它養成了良好的組織性紀律性團結性，使他比任何其他階級（如民族資產階級、農民等）更易於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能夠創造出無產階級鐵的紀律。

(丙) 因爲他有最先進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有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及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國際的領導，因此無產階級有它最澈底的革命的綱領，正確和靈活的戰略戰術等。上述的幾個條件不僅使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比較起來有根本上的區別（如民族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它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薄弱性，它畏懼革命運動的發展等）；而且它與中國農民有重大的不同（如農民雖然在被壓迫被剝削的，然而農民有私有財產，農民與落後的生產方式結合着，它是散漫不集中的，它的生活環境使它缺乏組織性、無紀律性、團結性，同時農民思想有許多落後保守的成分，農民沒有革命的先進理論及先進的政黨等等。）

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歸根結底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是對於我們是無庸懷疑的，過去中國革命證明了，將來還會不斷的證明着。

(二) 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一

論點決不能解釋成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爲他的相對薄弱性，因而他會自願的和安心的把革命運動中的領導地位讓給無產階級。不是的，我們不能這樣簡單的去了解問題，因爲世界上這樣的「便宜的事」是不會有的。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一塊水豆腐，雖然它在經濟上是薄弱的，政治上比重不夠，可是我們決不能否認他是一個階級，是一種政治力量；不僅如此，應該看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遠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前，就已經組織起來，政治上早就出現於舞台上，國民黨的組織便是以民族資產階級爲中心的特殊的政黨，它有三民主義作爲它的政治上的旗幟，它有相對獨立的政治活動，同時還由於下列的幾種情況，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了。

(甲) 我們上面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一大部分比較進步的，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存在着矛盾和衝突，他們爲了發展民族工業，爲了增長自己的政治的勢力，他們在某種具體條件之下，有參加反帝及封建軍閥革命的可能，雖然這一參加是帶着動搖的妥協的傾向。可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即在羈縻的階級的革命危險，還沒有真正的成爲實在的劇烈的可怕的危險時，它的動搖不徹底性還不能解釋成爲民族資產階級整個的立即會投降或叛變。

(乙) 這些資產階級份子手裡還握有一大部分的軍事力量——軍隊，這種力量是他們隨時可以用來反對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革命的。

(丙) 這些民族資產階級份子還在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有着影響，這些小資產階級羣衆還沒有完全相信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這一方面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爲了加強自己的立場起見，總是時常採取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宣傳，來爭取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援助；另一方面當然也是由

於小資產階級的特點造成的。

因此，只要上述情形仍然保留効力的條件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爭取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的危險還是保存着。民族資產階級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目的是爲了把革命事業控制在他的直接支配之下，發展自己的實力，限制革命特別是共產黨及工農大眾運動的發展，取得帝國主義某些讓步，並在適當的時機之下，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進行妥協。因此，這無疑義的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一個嚴重的危險，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爲了真正貫徹革命的勝利，爲了使這一革命領導到向着對大多數人民大眾更有利的方面走，爲了使這一革命順利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去，它必須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種反人民的反無產階級的不澈底的保守的政治路線作鬥爭，因爲這一鬥爭是完成中國革命任務的主要先決條件。所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這問題順利的解決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有莫大的決定意義。

假使我們翻開過去的中國革命運動史來看，可以斷言，中國革命最近二十年的歷史也就是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爭取對民眾領導權的鬥爭歷史，這一鬥爭直到現在還沒有獲得基本上的解決。例如於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第一次大革命中，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鬥爭就表現非常之顯著及尖銳，當時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爲了要革命，發展自己的工業，不能不與共產黨聯合，不能不接近工農大眾；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發展與共產黨的勢力擴大，却又想了許多方法去限制革命的發展，限制共產黨影響的擴大，想把領導權控制在它手下，如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號的中山艦事件，五月十五號國民黨中央全會「黨務整理案」的調度，以及後來蔣南北伐戰爭中各方面的佈置等等都是爲了這一目的。由於當時大革命中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沒有能給民族資產階級這種陰謀詭計以及時

有力的打擊，結果反而幫助了民族資產階級控制革命，並把革命領導到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妥協的道路上去，使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損失和失敗。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成爲反民族革命的因素，它不僅不能繼續爲中國民族獨立而鬥爭；相反的，它已經成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清道夫，它卑鄙的出賣中國民族的利益給帝國主義列強，可是如果認爲民族資產階級在事實上放棄了民族利益而口頭上也拒絕了民族主義的武斷欺騙宣傳，那便是錯誤的。其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仍然繼續利用着民族改良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旗幟去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甚至在落後的工人中散佈它的影響，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下的真正的蘇維埃革命運動。同時，國民黨經過了它的全部政權軍隊及報紙言論機關的力量進行這一工作，雖然成效不大（因爲事實上與口頭上的宣傳發生矛盾），然而如果以爲國民黨這種宣傳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甚至在部分的工人羣衆中沒有絲毫的影響那是錯誤的。所以共產國際在大革命失敗以後特別指示，中國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民族主義欺騙宣傳做鬥爭，揭穿它的假面其，把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從它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所以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了，然而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爭取廣大勞苦羣衆，擴大自己政治影響的鬥爭，仍然是繼續着，不過鬥爭的形式與條件不同罷了。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民族資產階級由於日寇大規模的侵略進攻，由於中國共產黨及全國人民的推動，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等條件的影響，又轉而參加到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來，進行抗日自衛戰爭，於是民族資產階級爲了挽救自己的統治危機，爲了發展自己的工商業，不得不進行抗戰；但另一方面，却又害怕革命的發展，不贊成全面全民族的總動員，不願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大量的發



動他們組織他們，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發揮他們的偉大力量，相反的，對於落後的保守頑固的黑暗的甚至反動的勢力，則表示最大的容忍庇護與縱容，對於一切政治經濟上進步的改革則表示不堅決不徹底，對外力援助有過分的希望，對自力更生的信念極不堅定，同時積極進行「反共」，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八路軍、邊區，積極破壞攻擊一切進步勢力，以作投降妥協的準備，特別最近在日寇的誘降和英美的壓迫之下，這一「反共」的投降準備工作更加加緊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抗戰一開始，即提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動搖不定的路線的特點及其害處，堅決的從多方面去批評他督促他，特別和他那種反人民反無產階級的頑固保守理論作鬭爭。抗戰三年來，差不多在一切抗戰的重要問題（如抗戰中民族問題、民生問題、動員民衆問題、外交問題等）上都開展着無產階級的徹底路線與資產階級的不徹底路線的鬭爭，這一鬭爭徹底的進行與無產階級路線的勝利將是團結大多數人民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先決條件和保證。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薄弱，決不能解釋爲他們自願的把領導權交給無產階級。相反的，民族資產階級過去和現在都在企圖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奪取廣大小資產階級羣衆，把革命放在他的控制和支配下面，以達到他破壞革命的目的。因此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應有正確的恰當的估計。正如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六大會所指出的，在這問題上一方面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革命主義完全混淆起來，看不見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動搖性、保守性，結果會不能完全的明確的在政治上組織上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分別開來，就會採取右傾機會主義的政策，把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的尾巴，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時代陳獨秀等所犯的錯誤就是這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反對輕視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它所有的特別意義（它在半殖民地

地的中國的某種具體條件之下有參加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可能），反對輕視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對小資產階級的羣衆的影響。這些人不了解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營壘不同，因而在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一部分工人階級隊伍中都有影響——至少是在運動的第一個階段中——所以它有特別的意義，誰要輕視這種特別的意義，那麼結果就會採取關門主義的政策，就會使共產黨員脫離勞動羣衆而孤立等等。

所以無產階級對革命領導權，絕不會自治地輕易地取得的，相反的一定要經過一個不斷的艱苦卓絕的鬭爭過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首先是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改良主義，爭取對廣大小資產階級羣衆（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思想上政治上的領導的鬭爭。因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與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主要對手是民族資產階級，爭取的對象是農民小資產階級，因此把民族資產階級從領導的戰場上驅走並孤立起來，把農民小資產階級羣衆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主要條件和內容。

（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也不能解釋成爲「天生的」或「天然的」現象，過去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陳獨秀彭述之便是這種「理論」的提倡者發揮者。這種理論曾經成爲大革命中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的一切錯誤的基礎。因爲這種理論實際上的結果，便是減弱了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鬭爭，鬆懈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警惕性，抹煞了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和獨立，結果使民族資產階級易於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爭得領導權。上面我們曾經指出了陳獨秀等機會主義的領導者曾經把民族改良主義的趨勢與民族革命的趨勢完全混淆起來，看不見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不堅決性，結果不能在政治上組織上與民族資產階級有明確的分開，反而使無產階

級成爲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我們所說的這兩方面觀察是聯絡在一起的，即不了解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實質，不了解民族資產階級實質，因此不了解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建立和鞏固，只有在堅決的反對了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鬥爭中才能勝利的完成。

上面我們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最後勝利」不能了解爲民族資產階級會自願的安心的把領導權送給無產階級，現在我們要從另一方面去說明這一問題，即無產階級要爭取領導權對無產階級本身說決不是「天生的」事情，這一點是很顯然的，因爲無產階級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是自覺的階級，無產階級開始是處在所謂「自在的階級」的階段，無產階級自己已經存在，然而無產階級自己尙未自覺自己是一個什麼階級及自己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之下無產階級不僅不能領導革命，而且自己還要受別的階級領導和影響。到了後來，無產階級在鬥爭中才逐漸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提高自己的組織性、紀律性，才逐漸轉變到「自爲的階級」的階段，成爲自覺的階級，在這一轉變中，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建立和領導有決定的作用。關於無產階級這種發展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共產黨宣言」中會有詳盡的描寫，英、法、德等國的無產階級發展大體上就是經過這樣的階段。所以馬克斯曾經告訴西歐各國的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不僅是爲了改變現有的社會關係，而且爲了改變你們自己能變成與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中國無產階級同樣是經過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國無產階級一開始也是經過「自在階級」的階段，到了後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才提高了無產階級的組織性、覺悟性，才使它從「自在階級」轉變成「自爲階級」，中國無產階級在他的先鋒隊的

組織未成立以前，他也參加過一些革命鬭爭，例如五四運動的政治鬭爭，中國的無產階級是以罷工的形式參加了的，可是它同時並未以覺悟的階級姿態出現的，當時上海主持工廠罷工的還是廠主出力較多，罷工多是隨罷市而來的，當時實際情形是如此，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爲了發展工業，它參加救國運動抵制日貨，給民族敵人一個打擾，它完全有可能吸取工人參加，把它放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所以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絕不是「天生的」或「天然的」，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成立以後，還要看到一政黨是否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善於把握這一理論，定出正確的革命綱領及靈活的戰略策略，能否孤立妥協派，能否團結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農民在自己的周圍等等，如果有了共產黨，而這共產黨還沒有學會領導革命，則無產階級領導權也還是沒有保障的，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痛苦經驗與教訓是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因此，要奪取和鞏固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就是要求這一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能夠絕對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善於把理論的根本原則與中國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結合起來，善於提出徹底革命綱領，並以靈活的戰略戰術去實現這一綱領，善於正確使用後備軍，使用戰鬭方式組織方式，團結廣大的群眾在自己的周圍，使之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善於不斷的在鬭爭的經驗教訓中學習鍛鍊，只有在這樣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够從希望變爲實際，從口號化爲行動。

所以我們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一真理，不應該了解成爲「天生的」現象或爲「自然而成」的結果；而應該了解爲無產階級的組織及覺悟程度提高的結果，爲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長期鬭爭的結果，了解爲無產階級的澈底的政治路線，

克服和戰勝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的政治路線的結果。只有這樣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建立和鞏固，才能保證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滿的勝利，並使這一革命順利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

### 第三節 中國革命的政權問題

(一)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世界的革命的率領者——列寧這一被俄國二次革命經驗的火炳考驗過了的天才論斷，對於中國革命更爲恰切與正確，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要戰勝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要完成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就一定要推翻舊的反革命政權，建立新的革命政權，不然中國革命就無法勝利，中國人民就無法從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宰割之下解放出來，因此有了政權，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就可以解決，中國革命就會勝利，沒有政權，中國革命就無法勝利。

這一真理過去中國革命全部歷史證明了它是絕對真理，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專制皇帝政治制度，推翻滿清在中國所建立的民族牢獄，開闢了中國和亞細亞洲的民主共和國的新曙光，奠定了中國革命後來爲民主政治而奮鬥的基礎，然而辛亥革命只是表面上換去了滿清皇帝，未曾進一步摧毀滿清封建勢力的基礎，因此民主共和國並未真正的建立。封建勢力殘餘的代表——袁世凱，在帝國主義援助之下，又重新掌握政權，把當時領導辛亥革命的政黨——同盟會排擠出去，辛亥革命以後代替滿清政府而統治中國的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殘餘結合而統治的軍閥制度，這一軍閥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官僚買辦，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統

制中國的工具，他對外妥協投降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對內實行軍閥專權，實行殘害人民的政策，因此辛亥革命由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政權問題未曾解決而流產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雖然形成了廣泛反日寇漢奸賣國賊的群眾運動，反封建的文化啓蒙運動，給予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及北洋軍閥政府無恥賣國的行動一個嚴重的打擊，然而五四運動由於當時主觀客觀條件的限制，並未實際的解決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政權問題，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後革命運動的發展，要求着這一個根本問題的解決，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便是企圖以革命的力量解決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政權問題的大規模的鬭爭，大革命在他的黃金時代曾經推翻了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在半個中國的統治，曾經過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式建立了廣東武漢的革命的民主政權，並進行了對原有軍隊的相當改革（國民革命軍），這些給了第一次大革命的發展以莫大的推動力，可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以及中共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並沒使大革命在這一革命根本問題的解決上走到完滿的解決，相反的大革命失敗了，辛亥革命以後形成的軍閥官僚政治機構仍然繼續着統治（雖然有些變化即滲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分使它形式上有現代化了），大部分的武裝力量仍然落在地主資產階級手中，成爲反對革命鎮壓革命的工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武裝起義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企圖糾正大革命的這一弱點，創造真正徹底革命的政權——蘇維埃政府，及真正的群眾武裝力量——工農紅軍，所以廣州起義決然有他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然而因爲當時主觀客觀原因又失敗了，因此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沒有澈底解決，中國革命這一根本問題——政權問題，而把這一任務移交給了將來。

大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投降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並和他們一起來進攻中國革命，此時帝國主

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更加加強和猖獗，中國民族危機和社會的危機比前更加嚴重，因為國民黨的統治不懂沒有解決中國主要的矛盾，而且反而把這些矛盾更加尖銳化了。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廣大的工農勞苦群眾繼續了大革命的事業，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作殘酷鬥爭，當時南方各省的廣大工農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這一政權徹底的實行了有利於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各種政策，吸收了廣大的工農群眾來積極參加政權的管理建設，使廣大的工農群眾真正的從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過着真正自由光明幸福的生活，但是中國共產黨這種經過蘇維埃革命的方法解決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政權問題的戰略計劃，雖然有了很大的有歷史意義的收穫（如長期國內戰爭中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特別是廣大工農群眾直接參加管理政權的經驗，土地革命經濟建設的經驗，堅強八路軍的創造等等）然而由於當時種種原因，這一戰略計劃並未實現，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特別是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以後，造成的新形勢，就要求我們以另一種新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即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戰略方針來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强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三年來中國共產黨是堅決的爲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而奮鬥，由於中國共產黨這一推動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和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曾經爭得了某些民主自由，曾經在敵後方各個抗日根據地中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政權，奠定了爲新民主主義新中國而奮鬥的基礎。可是因爲國民黨中地主資產階級頑固派保守守舊的阻礙，民主政治在全國的建立這一事業一直到今天來說還遠未曾解決，因此今後中共及全國人民的任務，仍然是爲新民主主義的新式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而鬥爭。

所以根據上面的分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辛亥革命以後一直到現在中國革命這一根本問題——政權問題還未曾獲得徹底的解決。今後的任務仍然是爲解決這一根本問題而奮鬥，這一根本問題如不獲得解決，則中國革命就無法徹底的勝利。

(二) 至若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解決這一根本問題？換句話說，中國革命應該建立怎樣的政權形式？那麼這一問題比較俄國革命及其他國革命更爲複雜。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他的許多特點及複雜性，因之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政權問題的解決也不能不與一般的國家有着不同之點，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政權問題怎樣解決的呢？它建立的政權形式應該是怎樣的呢？關於這一問題列寧在他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的著作中，曾經有過詳盡的說明，例如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曾經寫過：

「我們都說到爲爭奪共和制度，爲在事實上爭得共和起見，必須要我們「共同打擊」帝制——我們就是革命的國民——無產階級和農民但是這還不够，甚至「打擊帝制」就是完全推翻帝制政府，這裡還是不够，還須要「共同打退」將來必有拚命謀恢復已被推翻的帝制的企圖，這裡所謂「共同打退」適用在革命的時代就正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政府」（參照列寧全集第七卷三二五頁）

這就是說在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應該建立的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人農民兩個階級的專政，這一專政的形式是民主共和國制度（因爲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未曾確定蘇維埃制度成爲國家的形式，雖然蘇維埃制度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便萌芽了。只有到了二月革命以後，列寧根據俄國革命過去的經驗，確定蘇維埃制度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蘇維埃政權



產生了萌芽了，列寧認為這是革命政權的萌芽形式，然而未曾採用蘇維埃制度作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形式，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在特殊情況之下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以蘇維埃制度為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俄國這種政權形式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適合的，因為俄國資產階級自始至終是革命與反革命間的妥協力量，所以推翻沙皇制度消滅農奴制度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的結果，不能不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原則，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是不變的，中國革命則不完全相合，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民族特性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兩大潮流的滙合，尤其是反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最大特性，因此中國革命的動力，主要的雖然是工農群眾，然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這一特點，使它在某種條件之下有參加中國民族革命的可能，同時它到了中國革命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廣大的群眾起來爭取應得的果實時，它又仍然會轉向反革命的營壘，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妥協投降。因此，適應着中國革命這些特點，中國革命政權問題的解決，也不能不帶着某種民族的特殊性。

爲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現在把中國革命過去現在發展階段上，對於政權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的提法及其解決的方法扼要的加以說明。首先從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開始。一九二五——二七年第一次中國革命的政權問題怎樣解決的呢？當時建立的政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共產國際對當時中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示，是中國共產黨應該積極贊助擁護當時在大革命中生長發展着的廣東政府武漢政府，並積極的參加這一政府使之逐漸發展成爲徹底的民主政府，成爲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徹底完成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共產國際這一指示是根據着下列幾點論點：（一）根據着列寧的「一切革命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的天才論點。（二）根據着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

中兩個策略一書所提出的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天才論點。(三)根據當時中國革命的國內環境及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兩大潮流的滙合的特點，以及國民黨在中國的特殊作用，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等情況。

例如在大革命第一個階段時，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的「中國革命的責任及革命政府的性質」一節有下列的指示和說明：

「中國革命之黨綱及由此而產生的革命國家的結構實從這個總意義來決定。階級分化的過程，即隨着革命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個總意義，廣東政府雖然是資產階級民權性的，但其根據和客觀上則包含有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等聯合的民權獨裁制的萌芽。小資產階級民權運動在中國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應有此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為中國的革命及由革命而產生的革命政府均是反帝國主義的，故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條約與回收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國主義的地位，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這個意思就是革命政府應當逐漸沒收關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礦山工廠銀行企業等，如此做法才能即刻擴充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狹路，而走入到革命獨裁的過渡階段」(參照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十二頁)

在同一決議的另一節「共產黨與國民黨」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於廣東政府應採取的政策有說：「獲得影響於農民群眾的必要，也就決定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及廣東政府的關係，國民革命政府的機關，是接近農民很實際的道路，故共產黨必須用這一機關，在新得解放的省份中，必將建設如廣東政權的國家機關，共產黨及其革命同盟者的任務，是加入新政府的機關，使國民革命的農村政綱，有實際的表現，這就是利用國家機關，以沒收土地減租，並給予農民委員會以實力，如此在革命政綱的基礎上

逐漸進行改良」(同上十六頁)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應該參加廣東革命政府，並經過這一政府實現革命的綱領，並使這一政府發展成爲工農民主專政的機關，到了大革命第二個階段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關於武漢政府政策的指示便是這樣，例如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八次執委會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上說：

「共產國際認爲看輕武漢政府的意義，因此實際上否認他偉大的革命作用，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就其階級成分而言，不僅代表工農及手工業者，亦代表一部分中產階級，所以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的農民的專政，但他已經走到工農專政的路上，在階級圍爭中，如果無產階級獲得勝利，趕去了那些跟着資產階級跑的人們戰勝了無數的叛徒之後，則武漢政府便必然發展到這一專政的方向去。

「共產國際認爲中共積極參加武漢「臨時革命政府」的活動是必要的，那個不主張參加或對此問題抱一種不定的懷疑的態度，他形式上很是一激進革命」，但在實際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國少數黨的錯誤，俄國少數黨那時以爲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寧願組織「極端左派在野黨」，但是實際上跟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後，搖尾乞憐……參加武漢政府與歐洲資產階級社會黨的混合政府並無絲毫相同之處，因爲武漢政府的確用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制度，現在更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大部，因此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共產黨必須積極參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機關，同時對自己最親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堅決，也要更加以批評，並確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確路線」(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三七—三九頁)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應該積極的參加武漢革命政府，堅決實行土地革命的方針，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使之成爲武漢革命政府堅強的柱石，這樣來爭取武漢政府逐步的發展，成爲工農民

主專政的政權機關，共產國際這一指示無疑義的是絕對正確的，是當時中國革命唯一必要的走向勝利的途徑，假使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能够堅決執行共產國際這一指示，堅決的深入土地革命，使武漢政府變成爲中國農民土地革命的政府，同時，吸收土地革命中農民的領導到國民黨上層份子機關中，並動員廣大的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充實國民黨的下層組織，使國民黨轉變爲數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的組織，堅決實行武裝工農羣衆的方針等等，那末武漢政府就一定能够變成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政權機關。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在當時堅決反對了托洛斯基派關於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提議，因爲中國共產黨如果實行這一提議，在武漢革命政府領土中立刻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這就是等於形成兩個政權的對立，等於推翻武漢政府，直接把蘇維埃政權作爲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這在客觀上無疑義的帮助了反革命。關於托洛斯基這種錯誤，斯大林同志曾經在當時這樣的說過的：

「比方在武漢政府勢力的範圍之內，就在現在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那就是說造成兩重政權，提出推翻左派國民黨的口號，而建立新的蘇維埃的政權，工農代表蘇維埃是爲推翻現存政權而奮鬥的，是爲新的政權而奮鬥的機關，工農代表蘇維埃機關出現，便不能不造成兩重政權，而兩重政權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權應該屬誰的問題緊張起來，……反對派在這點上提議我們在中國從速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作爲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我們知道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不僅是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首要任務，就是反對現存政權的暴動機關，爲建立新的革命政權而鬥爭的機關……托洛斯基不明白，若現在即刻建立蘇維埃，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提出兩重政府的口號，推翻武漢政府這便是直接帮助蔣介石和張作霖。」（論反動派中文版二九一——二九二頁）

斯大林同志和共產國際這一論點，無疑義的是絕對正確的。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爲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陳獨秀彭述之等沒有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沒有積極參加廣東及武漢政府，並採取一切方法把武漢政府發展成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政權機關；相反的却犯了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甚至走上反對土地革命自動解除工農武裝的罪惡行爲，結果自然不能不幫助了右派的叛變與鎮壓革命，使大革命遭受失敗。

武漢政府的叛變使當時留在革命隊伍中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份子脫離了革命，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叛賣了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和鎮壓中國革命及中國共產黨，階級力量的互相關係起了新的變化，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之間的區別抹去了。現在革命的動力只有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同時革命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才能發展和勝利，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權問題如何解決呢？應該建立怎樣的政權形式呢？關於這一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共產國際執監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就已經明確的回答了這一問題，斯大林同志說：

「托洛斯基在此地說到廣東革命運動，說到賀龍葉挺的軍隊，污蔑我們似乎我們要組織新的國民黨來領導這一運動，我不想辯駁托洛斯基所幻想出來的這些可恥的謠傳，我只簡單的聲明南方革命運動賀龍葉挺軍隊之退出武漢向廣東進行以及他們與農民革命運動連結等，一切這些事件都是中國共產黨所發動起來的（按斯大林同志這裡所說的是指一九二七年中共領導下的「八一」南昌起義，起義以後，這些起義軍隊向廣州潮汕進攻——編者註）……假使這些運動有了勝利。新的革命高潮在中國已經成了事實，什麼人應該來領導呢？自然是蘇維埃，如果從前在國民黨發展的時代沒有馬上成立

蘇維埃的順利條件，那末現在國民黨自己已經破產與反革命聯合喪失了威信。在此時，在革命發展之下蘇維埃可以而且實際上必然成爲團結中國工農到自己周圍來的主要力量，什麼人來領導蘇維埃呢？自然是共產黨員（參照論反動派中文版三一五頁）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會議遂根據斯大林同志和共產國際這一天才指示，而正式的提出了打倒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斯大林同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因爲這一指示是根據着第一：國民黨整個的叛賣了革命，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聯合勾結在一起。因此，革命的動力只有工人農民，中國共產黨成爲了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革命的唯一領導者組織者等等，中國當時的客觀形勢，階級力量相互關係而決定的。第二：根據列寧認爲蘇維埃制度不僅可以成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而且可以成爲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的天才論點；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建設的寶貴的經驗而提出的。第三：還估計到中國社會環境及中國革命的諸特點，如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城市與鄉村的關係的特殊，武裝鬥爭是革命主要鬥爭形式。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依靠對農村廣大農民的領導，就可以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地區，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武漢時期，斯大林同志與共產國際之所以反對托洛斯基派在武漢政府統治之下組織蘇維埃政權的提議，並不是因爲蘇維埃的制度不好，蘇維埃制度不適宜於中國，不是的，而是因爲當時武漢政府是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中國共產黨可以而且應該積極贊助和擁護武漢革命政府，使之發展成爲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這一工農民主專政，不一定採取蘇維埃制度的形式，而也可以採取民主共和國制度作爲它的形式，正是因爲如此，斯大林同志當時說：只有在武漢政府已經鞏固以後，在土地革命已經發展以後，在土地革命由資產階

級德謨克拉西革命轉到無產階級的時候，是需要組織蘇維埃的。（參照論反對派中文版二九六頁）後來情況變化了，階級力量相互關係比前有了突變，經過武漢政府把它發展成爲工農民主專政的計劃沒有實現，國民黨整個的已經叛變了革命，中國共產黨爲了繼續大革命的事業，爲了組織和領導千百萬工農群眾，進行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及革命統治的鬭爭，因此必須採用以蘇維埃制度爲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政權，這也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只是具體的」——列寧這一偉大名言，在這裡得到證明。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於南方各省組織了工農群眾，推翻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以蘇維埃制度爲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中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他在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就最顯明的證明了列寧斯大林偉大的天才的論點——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可以實現蘇維埃制度」，「蘇維埃制度不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而且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最好形式」。

大革命失敗以後，建立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在它的性質上說來，雖然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可是由於中國革命許多特點，以及當時中國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不能不使這一中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與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所預定的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實現的有重大的區別，中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特點是什麼呢？扼要的說來，中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它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的兩大革命潮流匯合的結晶體，它是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殊條件之下建立鞏固和擴大的，它是在中國革命唯一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獨佔領導之下，又是在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殘酷國內革命戰爭火

類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由於上述的諸特點，使中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帶着更加純粹的性質，並且還存着某種社會主義的成分。所有這些特點使它大大的異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所實現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關於這一問題共產國際一九三〇年在宅中國問題決議案上這樣寫着：

「中國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比較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決定的民權獨裁，將要有很大的不同，這裡的分別首先是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現在有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蘇聯存在，它在順利的發展着社會主義的建設；別一方面，中國的情形，可以預料在革命政府之中的共產黨員佔多數，因此無產階級不但對於農民能夠實現思想上的領導，而且能夠實現國家組織上的領導，同時必須還要注意到中國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實行殘酷的鬥爭，而且要和外國資本家及中國資本家實行殘酷的鬥爭，中國的民權獨裁，將要有澈底沒收外國資本主義及中國資本主義的必要，將要不能不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社會主義成分的存在，就是中國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特點。」（參照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一一八——一九頁）

中國共產黨十年來經過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來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計劃，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實現。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由於日寇大規模的侵略，中國民族的危機發展到了新的階段，中國國內外環境及階級力量相互關係起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內部逐漸動搖分化，最後轉向抗日民族革命。在這新的形勢之下中國共產黨中央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政治決議案上決定把工農的蘇維埃改變為人民的蘇維埃，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中及九月「關於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中又進一步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表示中共願意駕統一全中國的民主



共和國政治制度而奮鬥，同時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之時，蘇區即成爲它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在九月的中央政治決議上說：

「中共中央認爲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爲他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保障中華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綫口號，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球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的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展與澈底勝利，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够使全中國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寫着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自由活動的舞台。因此中共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並且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的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成爲他的一部分，蘇區人民得選代表參加國會，並將在蘇區內完全實行同樣的民主制度。」（參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指南』第一冊四六——四七頁）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國民黨開始轉變到抗日民族革命陣綫方面來，中共爲了貫徹統一戰綫的方針，爲了爭取國共兩黨合作，遂於一九三七年二月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上更進一步的宣佈取消蘇維埃制度，這樣，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遂成爲中國共產黨現階段上奮鬥的戰略口號。中國共產黨中央這一決定是絕對正確的，因爲這一決定的根據是：第一：中國從一九三五年後，特別是一九三七年的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民族矛盾提高到首要地位，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份子甚至部分的地主階層轉向革命，國民黨向着抗日方向變化，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下的蘇維埃紅軍政治影響的增長及其不容忽視的弱點等等客觀形勢及階級力量的對比和相互關係的變

化綜合的分析。第二：根據着「民主共和國制度比諸軍閥、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有莫大進步」的馬列主義真理，以及「在大部分地區上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國制度，較之在小部分地區上，建立蘇維埃制度對革命更爲有利」（中共一九三六年九月政治決議）的真理。第三：中共所主張的民主共和國是新式的民主主義，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舊式民主主義大大不同；它與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也有區別，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政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這一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適合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許多特點，是完成中國民主革命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去的民主共和國制度。第四：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統一民主共和國的三民主義基本口號的基本內容，和本黨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基本上相符合，因此它可以成爲以國共合作爲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或政治奮鬥目標。

因此中國共產黨提出爲新民主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口號而鬥爭的方針，是完全正確與必要的，因爲這一民主共和國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戰爭最好的政權形式，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爲了組織群眾教育群眾並爲着將來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最好活動的舞台，中國共產黨爲了這一口號而奮鬥經過了三年，這三年的奮鬥中間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成爲團結組織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擴大抗日民族自衛戰爭驅逐日寇出中國去的戰略目標，成爲孤立一切民族妥協派民族改良派底最好鬥爭武器，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政治理論上提出和擁護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口號，而且在行動上實踐上爲這一共和國的實現而鬥爭，現在中共領導下敵後各方個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就是最好的例證。

根據上述的分析，中國革命的政權問題，在過去中國革命的發展的各個時期中，由於客觀形式階

級力量的相互關係的變化，因此解決的方式與方法也有不同，這些不同之點也是根據着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而來的；同時不管各個時期的變化，然而總的目的都是爲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爭取中華民族的及社會的解放而鬥爭。

#### 第四節 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

(一) 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來發展道路的問題，發展方向的問題，究竟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以後，中國革命到那裡去，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呢？或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革命前途問題的人們不能不想到及提出的。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本書第二章論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時，就已經順便的提出這一問題。我們曾經說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於他的新的國際環境，由於他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他成爲現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流中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同時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徹底性，中國無產階級的強大及其積極性的增長。因此，使這一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徹底的完成；而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便不得不開闢着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換句話說，必然將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然而這僅僅是一個輪廓式的說明，現在我們來比較仔細的詳盡的把這一問題檢討一下。

我們知道並不是任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能够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上去的，過去許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便停止了，如英國一六四〇——一六六〇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法國一七八九年

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土耳其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並沒有生長成爲社會主義革命，只有一九一七年勝利的俄國二月革命才成功的轉變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因爲不是任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能生長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要完成這轉變必須具備一定條件，這些條件一般的說來至少要有下列幾點：

(甲) 要有相當強大的有組織的先進的產業無產階級。

(乙) 要有堅強有力的布爾什維克政黨的領導，這一政黨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他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有靈活的戰略策略，他在全國人民中有高度的威信。

(丙) 無產階級與廣大勞苦群眾（特別是農民）的結合，這一結合經過了鬥爭的考驗。

(丁) 要有比較順利的國際環境。

沒有這些條件一般的說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前途的實現是不可能的，過去一切勝利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所以沒有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而成爲斬斷的革命，就是因爲他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否上述諸條件呢？我們現在分別的來說。首先來說「相當強大的有組織的先進的產業無產階級」這一條件，說到中國無產階級，我們上面「中國革命的動力」一節已有扼要的提到，它的數量雖然比較少（三百萬左右產業工人）。可是他的質量卻相當的強大，這是說它由於受着三重的壓迫與剝削，因而富於堅決頑強的鬥爭精神，它一開始鬥爭不久即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走上了正確的軌道，它一開始鬥爭不久即參加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隊伍，可以得到世界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指導，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經歷了中國革命近二十年來殘酷鬥爭火燄的鍛鍊，學習了養成自己的良好的組織性、紀律性、團結性，大大的提高了自己的覺悟程度及戰鬥力，並在勞苦群眾中

特別是農民群眾中有高度的威信和影響。所以在這一條件上，中國革命無疑義的是在存在着生長着。

其次說到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問題。那末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佔着光榮的先進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在它的十九年來的奮鬥中，鍛鍊成爲了一個與群眾有血肉聯系的政黨，有相當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特別是組織政權軍隊領導革命戰爭的寶貴經驗的政黨，它學習靈活的戰略戰術，它鍛鍊出了天才的英明的領袖——如毛澤東、洛甫、王明等，及成千成萬的堅強有力的幹部。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長，它武裝了廣大的群眾，它直接領導之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日益擴大和鞏固起來。

再次說到無產階級與廣大勞苦群眾的結合，在這一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成績，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開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結合便已經開始了。以後，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後，十年的蘇維埃土地革命中，中國無產階級經過它的先鋒隊，組織了領導了南方各省的廣大農民勞苦群眾，建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沒收了地主階級的 land 分給廣大的貧苦農民，進行經濟建設，改善他們的生活……所有這些無疑義的太大的提高了農民勞苦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團結性組織性，建立了和鞏固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以及這一聯盟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一九三七年抗戰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在華北組織了和武裝了廣大的農民勞苦群眾，並經過了他直接領導之下的民主政權及軍隊，與廣大的農民取得聯系，中國共產黨在農民勞苦群眾中的威信日益增長，影響日益擴大。

最後在國際環境來說中國革命也具備有比較順利的條件，並且現在比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代大大的不同了，例如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存在，鞏固和發展，它正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步前

進，它的國防威力極大加強，它對世界人民特別是在中國人民中威信和影響的增大，又例如資本主義總危機存在和尖銳化，特別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面帝國主義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帝國主義世界第二次大戰日益擴大。又例如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各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強大，第二國際在各個工人中威信減弱，近東遠東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特別是印度和印度支那的革命鬥爭，並且這些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將因中國革命繼續發展及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而更加發展起來，這些國際條件對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無疑義的有重大的意義，特別是和中國地理上靠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蘇聯的鞏固發展，更將給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以重要的幫助和保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過去都認為國外的因素，對於比較落後的國家底非資本主義發展事業上，有特別偉大的意義，因為這些國家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按照一般的通例，祇有在先進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幫助之下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革命所有這些國內外條件無疑義的有重大的意義，記得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名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中總結俄國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經驗教訓時，他列舉了會使俄國十月革命比較容易的勝利的國外的及國內的條件，在國外的條件是下列的三種：（一）十月革命開始於兩個基本的帝國主義集團作拚命鬥爭的時期，因此使十月革命當時能夠利用帝國主義內部劇烈的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力量。（二）十月革命開始於帝國主義的戰爭進程中，廣大的群眾渴望着和平，這使十月革命更容易的把蘇維埃革命與結束可恨的戰爭的事業聯繫起來，並因此給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民衆當中造成了廣泛的同情。（三）當時歐洲有強大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因為長期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機，這使十月革命在國外獲得可靠的同盟者。國內的條件是：（

(一) 十月革命當時有俄國工人階級中絕大多數的最積極的擁護。(二) 有正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的士兵的擁護。(三) 有久經鍛鍊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政黨及其領導者。(四) 當時十月革命所遭遇着的是比較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弄得氣勢完全頹喪的地主階級，以及在戰爭過程中完全破產的妥協政黨——少數派社會革命黨。(五) 有廣大疆域，能夠自由隨機應變，能够在環境要求退守時退守，能夠暫時休息，能夠保存鬭爭的力量，以圖再舉等等。(六) 國內具有充分的食糧的燃料的及原料的富源(參照斯大林選集一卷中文版一四七——一四九頁)。上述的條件中，特別是外國條件的第一及第二條及國內條件的第二第四第五條更有特殊的意義。世界革命的導師——列寧曾經鄭重的指出過，要重復這些條件或與此類似的條件是不很容易的(參照列寧全集二五卷二〇五頁——二〇七頁)。但是中國現階段的革命却在生長着或日益具備着和俄國十月革命類似的條件，甚至比十月革命更爲順利的某種條件，列寧所謂「不很容易的」事情在中國革命出現了，這樣的條件在國外環境上說起來是(一) 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與鞏固。(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存在與發展，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擴大，使中國革命同樣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衝突來組織和鞏固自己的力量，特別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矛盾，可能給我們利用。(三) 歐洲強大的工人運動以及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這些革命運動比較十月革命時大不相同。國內條件是：(一) 中國有相當強大的無產階級。(二) 無產階級與廣大農民羣衆有相當密切的聯系與結合，特別在大革命以後，十年來的蘇維埃革命時期。(三) 中國革命有堅強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政黨在世界共產黨的隊伍中，佔着先進的光榮的地位。(四) 中國革命同樣擁有廣大的疆域，便利於中國革命的機動。(五) 中國同樣具有充足的食糧的燃料的原料的富源，並且中國農村與城市的相互關係有異於

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革命在持久戰中依靠着農村，可以包圍戰勝城市，上述的條件中特別是國外環境的第一條，是中國革命的莫大優點，而同時正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弱點，因為十月革命曾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因為在它的鄰近未曾有一個可做他的依靠的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以斯大林同志說，將來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毫無疑義的會處於比較便利的地位，因為在他的鄰近存在有我們蘇聯這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同上—文斯大林選集一卷一四〇頁）而中國革命正是這樣的國家，他的鄰近生長鞏固着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它正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進，這對於中國革命及其前途毫無疑義的有極重大的作用。

關於中國革命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發展的問題，如果我們估計到國內的經濟條件中國經濟崩潰破壞的情況。那末這已是客觀促成的一個條件之一，因為中國國內經濟——工業農業方面的危機的圖畫清楚的向我們指出中國的面前或者完全是殖民地式的奴隸化，而廣大人民更加破產，工業生產更加遭受破壞，或者是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再明顯沒有的告訴中國人民，只有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醫治中國社會經濟創痕，挽救中國經濟危機，使中國國民經濟得到復興發展，因此中國革命的政黨在將來如果採取趨向於社會主義的過渡性質的辦法（如沒收外國資本的工廠、企業、銀行、鐵路……等）將毫無疑義的會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

所以我們說：不論從中國革命國內外環境及中國國內經濟條件的本身需要來說，都有利於而且促進中國革命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

在這一問題上，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與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與二十世紀一切半殖民地國家的民主革命如土耳其革命，也有極重要的區別。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土耳其的革命雖然生長在世界大戰及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可是由於土耳其國內沒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組織，沒有無產階級與廣大農民群眾的親密的結合，因此土耳其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落在民族資產階級手中，土耳其革命停留在民族革命的階段上，而沒有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中國現階段資產階級革命與土耳其革命有很大的不同，不僅在國外環境上說來，中國民主革命比諸土耳其革命有着更多的優良的條件，主要的是在國內條件上中國有相當強大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組織，這一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與廣大的農民群眾有相當親密的結合，他能指導他們的鬥爭，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土耳其革命完全不同。

關於這一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代有過下列一段極精彩的說明。

「我認爲基瑪爾革命（即土耳其式的革命——編者）在中國是不可靠同時也是不可能的，基瑪爾的革命只有在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而且沒有偉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各國（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才有可能，基瑪爾革命是上層的民族商業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革命是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鬥爭中發展起來的，他們發展下去的傾向，實際上是反對工農反對土地革命之發生，基瑪爾革命在中國沒有可能，因爲第一：中國已有某種最低限度的積極的戰爭的工業無產階級，他們在農民中間享有偉大的威信。第二：中國已有發展着的土耳其革命，土地革命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將肅清封建殘餘，中國千百萬農民群眾在許多省份已經起來奪取土地，而且他們在鬥爭中都是爲中國無產階級所領導——這就是不容許發生中國基瑪爾革命的主因。」（參考論反對派一書二二一——二二二頁）

這還是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所說的一段話。至若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土耳其革命當時的情形更加大大不同了，今天中國革命的國內外環境比諸第一次大革命時代更加有利得多，因此基瑪

爾革命的前途在中國更加不可能了。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不利條件，這些不利的條件是（一）中國革命有他的極頑強的主要敵人——一切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正全力的向中國進攻，企圖把中國變成他的殖民地，中國革命必須戰勝這一頑強敵人，才能保證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但是要戰勝這一敵人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鬭爭，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有論及，這是中國革命基本困難與不利的地方，這一點與俄國十月革命比較便不同了。（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雖然比較弱，特別是他由於大革命後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政策，使他在廣大群眾中的影響日益削弱，但是應該估計到民族資產階級一直到現在仍然擁有大量的軍隊，在部分的群眾中仍然有着大的影響，並且他在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正用一切辦法來維持和加強他們日益削弱的權力和地位，它正聯合一切保守反動的勢力來向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進攻，不戰勝民族資產階級這一進攻中國革命就無法勝利，非資本主義前途也無保證。（三）其次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少，無產階級內部尚未很好統一起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親密結合還未普遍和足夠鞏固，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共產黨的影響日益增長，可是他還未領導一切的革命鬭爭。他在國民黨的直接統治下的某部分的群眾及武裝部隊中的影響還比較薄弱，它本身的鞏固還不够等等，所有這些無疑義的是中國革命的弱點和困難。這些弱點和困難必須迅速補救，必須很好克服，只有以布爾什維克的頑強性堅定性來克服戰勝這些弱點困難，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前途才能够勝利的保證。

所以要爭取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要使勝利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爲走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必須用一切力量去克服我們革命中存在着弱點，澈底的完成我們當前的一切革命

任務，這裡最主要的是爭取和鞏固無產階級對全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因為只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爭取和鞏固，才能保證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並順利的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上去。要爭取和鞏固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最主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鞏固中國共產黨，鞏固和擴大它領導下的政權和軍隊，並依靠黨的正確路線堅定的階級策略靈活的組織形式鬥爭形式和堅苦深入的作風和毅力，去加強黨對全中國更多的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的工作，領導他們的日常鬥爭，爭取他們，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及團結力量，把他們徹底的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及一切錯誤思想影響上解放出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這就是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順利的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去的主要先決條件。

至若中國革命將來如何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去的具體形式，速度，現在我們無法來預料，因為一切都是由鬥爭來決定的。只有鬥爭，只有力量，只有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團結力組織力，只有階級力量的對比，能夠決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要到什麼時候完成，它將要怎樣的經過那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參照一九二八中共六大大會的政治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一三二頁）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一切先進的革命的人們底光榮責任，就是要用全力來為爭取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也就是社會主義前途的實現而奮鬥。

（二）當我們提出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時，我們必須清楚的指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問題的提法及奮鬥方針與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以及國民黨的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中國托洛斯基派曾經以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左」的空談，在某些小資產階級青年中散佈着他的毒惡的影響。這種說法，完全是根據着他們的老祖宗——托洛斯基、拉狄克關於中國經濟

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中國封建勢力不存在，中國農民是反革命等「理論」而得出來的結論。同時，這實際上是他們反革命的烟幕彈，因為托洛斯基派早就已經背叛了工人階級，投降了帝國主義，甚至直接與日德意法西斯蒂勾結，在中國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公開表演着最無恥的民族奸細漢奸作用，明眼人士已經看透了托洛斯基派這種有背於「中國人爲人道德」底卑鄙真面目。國民黨的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反對馬列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幻想以和平的改良的方法——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來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緩和階級矛盾與鬥爭，企圖和平的建設社會主義——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它的客觀社會實質仍然是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列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也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二十三年的豐富經驗，最具體的告訴了全中國的人民，只有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方法（而不是按照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才能夠實現社會主義，走到共產主義，換句話說只有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人類最好的理想變爲事實。

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一切優秀進步的革命的人們，一切願意追求光明的理想社會的人們團結在它的周圍，爲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因爲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最後的最徹底的把中國人民從一切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只有它才能根本消滅人們一切的貧困痛苦和不幸。

用校學習補化文

行總行銀北東

C  
3.09  
 $\frac{1}{2}$